

道统文统并传 家世突出优异

上溯至宋代，范伯子的先祖为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范仲淹。他出将入相，革新政治，镇守边关，抗击西夏，兴修水利，兴办教育，文治武功卓著。孔平仲《谈苑》中记载：“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其《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言。他品德高尚，爱民如子。《宋史·范仲淹传》中说：“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说：“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



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高潮。”又说：“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伯子为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的后裔。《宋史·范纯仁传》中说：“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没之日，幼子、五孙犹未官。尝曰：‘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

范伯子具有关心民瘼、重视教育、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珍惜友情等优秀品德和喜爱文学、大量创作诗文的习惯，正是承传于这两位先祖。

后来，范氏有一支迁居通州，通州始祖为范盛甫，传至七代孙为范应龙。他是范伯子的九世祖。邵潜《州乘资》卷四中记载：“范应龙，字士见。少有文名，为学者所宗。诸生出门下者可二百许。所入束脩（收入的学费），以奉其两尊人，而斥其羡与两兄共之。兄歿，母严其嫂，子抚其孤（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嫂嫂，像抚育儿子一样抚养他哥哥留下的孤儿），终厥身如一日也。顾数奇（但命运不好），竟不得一第。繇里选起家为庆云令，俸入，悉捐以赈孤独、奖节孝，筐中至不名一钱甫五阅月（袋中连一文钱都没有竟达五个月之

久)。会公仲子凤翼，推择为吏部稽勋，拜公如其官。遂归里中。暇则端居课子若孙，或检岐黄书市药为剂，以施病者；又捐镵匠人，悬木国门（又捐助纸钱木匠，将做棺材的木料放在城门口），有骸不能掩者，恣其取（有尸体不能掩埋的，听凭他取用）。所遇虽后生末学，必恂恂致恭有礼。年八十，冥然月余而逝。”《〈通州范氏诗钞〉序》说他“拜庆云令，一岁而庆云大治。忽不乐，解组归，筑尊腰馆啸咏其中”。

范应龙的儿子为明代著名诗人范凤翼，字异羽，号真隐先生。他是范伯子的八世祖。早年曾做过官，后来退隐。钱谦益《初学集》卷三十六《范太公八十序》中写道：“盖自神庙（称明神宗朱翊钧）之末年，天子深居，小人用事，唱为甘陵、雒、蜀之议，公然以钩党为名。海内士大夫，凡负名节、持议论者，靡不以一网锢之。而异羽为吏部郎，汲汲以辨论官邪、登用正直为能事，此所谓芳兰当门，不得不锄者也。异羽慨然移病归侍太公，太公笑谓曰：‘吾为庆云令，不五月而趣归。岂愿若久据要津哉？’……”《〈通州范氏诗钞〉序》说：“勋卿公万历二十六年进士，观政已，除滦州知州，闻都下有银滦州之目，耻之，疏改顺天儒学教授，颇昌言时事，为执政所忌，十年不迁。三十六年，转户部主事，管京仓，骤有奇绩。三十八年，调吏部文选司主事，首推顾宪成、高攀龙，迁稽司勋员外郎，先后在吏部不及一年，而构者众，遂请告以归。自是至于弘光元年，五起京卿，皆不就。坐东林党为民，追夺诰命。然公故怀道幽默，不为朋党，小人无以罪之，罪之以据清卿之席引高不出而已。崇祯三年，海上乱民焚掠州里，公乃挺身上疏讨贼，而温体仁欲因此杀之，坐以激变，赖都御史廷争乃免。十六年，伤国事日非，谓士大夫此时不宜复计家有无，尽鬻其产七千五百金输之官。国变时，年七十三矣，逃禅八年乃卒，天下称为真隐先生，而史公可法慕其为人，尝为之著《范公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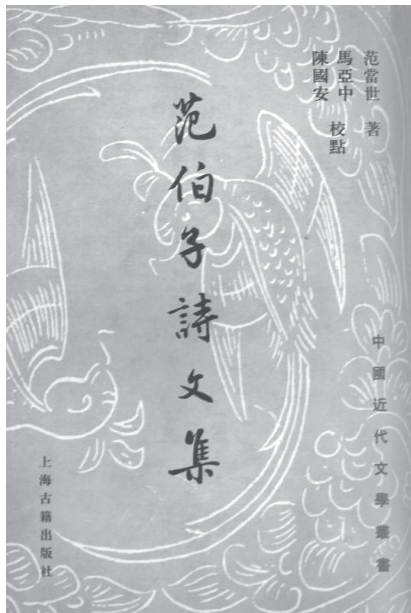
范伯子淡于功名，从三十五岁后便绝意科举，不正是与这两位先祖一脉相承吗？

范国禄为范凤翼之子，一生布衣，没有做过官。他是范伯子的七世祖。《〈通州范氏诗钞〉序》说：“勋卿公之子讳国禄，字汝受，所居曰十山楼，子孙称之为十山公。十山公生于天启四年，崇祯末为诸生，入国朝不应举。长老言，十山公尝修州志，构奇祸，破家逃亡于外，顾不知其祸所因。今读其诗，则自国变三十余年不履金陵，有《渡江》及《丙辰元日》诸作，而送陈其年入都应召，则曰‘生平不识京华路’，此其能自全也信矣。酬蕉园主人则曰‘望门投止何如俭’，又曰‘悔为著书时一吐’，盖勋卿公与十山公皆不汲汲于当时之名，故其得祸亦不烈，而亦未能竟免于祸也。”他有诗三十三卷，文九卷，数量为《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现存作品之冠，质量也很高。这对于范伯子诗文的创作和淡泊情怀的形成显然具有更深刻的影响。

《〈通州范氏诗钞〉序》说：“嗟乎！以吾先人诗之至精者，与夫当时之盛名者校，或且过之，而名顾不显，谓其为之不以自喜不得也。或有所畏避而不居，冀以保身全节，是有之矣，而其实亦不尽然也。善乎十山公之诗曰：‘傲睨长安声价易，少年无赖碎胡琴。’名者，盖众人之为之，惊众人而取之，志士有所不屑矣。然则需之后世耶，后世之名若将可凭，顾常论定于一二人之手而众随以服，则亦有不遇者，身之往矣，名亦焉用？学者归于有以怡其心，而又能保有不尽以贻其子孙，为人子孙转相贻以不没其祖，人事莫大于此，则吾斯集之撰也，岂但以授吾徒友，明吾先人有是学而已，亦俾范氏之子孙简而易诵，知昔人之藪如此其精，而名声利禄之际乃有如彼其澹然者也。不怨不惧，前修之从，则吾范氏之泽未艾乎？”他又在《与袁生书》中说：“文人者，穷达二者而已。贵盛富厚不足谓达，己所学而人必知之之谓达；

贫贱枯槁亦不足谓穷，己所学而人不知之谓穷。二者亦适然之遇耳，均之可以成就文章则一也。故适然而人知之，一善必有述，一奇必有赏，声色之交遍于海内，令闻广誉，鲜可伦比。此之所患，将使名浮而实不至，驰骛于外而荒于内，伸于一时游扬之口而屈于千古择议之目，贸然自信，曾不能毕世，而向之隆隆者固已尽矣。若夫豪杰之士当之，则因而集益，以奖为劝，名盛乃惧，终其身欷然若不足，固未有以人知而自病者也。至于己所学而人不知，则语焉莫听，倡焉莫和，日抱数卷之书，著述于蓬蒿之中，无过而问者。当此之际，鲜有能忍，或乘其愤激之气举足出门，执途人语之，伧父俗子，一言之合，大喜鼓掌，以为知己，颓然不觉志气之坐丧。纵复久而厌弃，自通于当世之杰，而生质之美、学力之所得消磨之余，又或不必能倾倒一世，一不得当，更无可望，终身

自毁，此可为太息流涕者也。若夫豪杰之士当之，则又不然，以为人不知焉能病我，我无自病焉耳矣，于是志益奋，气益锐，殫精竭神于亿兆耳目之外，用有不赡而古人饷之，思有不格而鬼神通之，才有不逮而造物益之，彼其沉郁坚苦之力，有非当时盛名士所敢望者，故其所为文章，或十年或数十年而见于世，亦有过的无不及，诚哉乎其不足病也。”从这封信中可



上海古籍出版社《范伯子诗文集》书影



以看到范伯子抱负之不同凡响。这更是范伯子自己直接说明他对祖上道统与文统的双双承传。

范曾在《〈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中说：“中国术业恒以宗族为传承，其传至二三代者，殆不胜数，然后易姓以弟子传。能以诗世家薪承火继延至十一二代者，不惟中国文学史之所仅见，亦世界文学史所未闻。四百年中，名人相望，大师辈出，陶钧鼓铸，滂沛成气，兀为中国文化史之奇迹。”范伯子正是这个诗文世家薪火承传中的佼佼者！

为母分忧买卖 从师交友勤学

范伯子于清咸丰四年（1854）七月初四寅时，出生于通州四步井老宅。

伯子出生之时，祖父范持信（静斋）六十二岁，祖母金氏、继祖母徐氏均已去世，父亲范如松（荫堂）二十八岁，母亲成氏二十五岁。

范伯子的父母亲对长辈极孝敬，因而在孝敬长辈方面，范伯子从小就受到极好的教育。十一岁时，范伯子曾侍立在祖父身边，听他讲过孝悌家风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通州范氏诗钞〉序》中写道：“曾祖晚年，贫不可以言，独特吾祖教授为生。吾祖每夕归，必得曾祖欢而后止。一夕，久之若不欢。问家人曰：‘岂有事耶？’曰：‘无之，独丁氏送蟹，辞耳。’曰：‘故嗜此者，奚不言？’遂驰出门，脱中衣质钱，冥走数市，竟得大螯以归，熟而徐进之。曾祖愕曰：‘丁氏物哉？’曰：‘非也，固将烹矣。’乃喜而歌诗以尽兴。当世盖十一岁时，立于祖父之侧，父刚退，祖父谓曰：‘顷汝父之欲吾笑也，与吾同矣！’因追道此。”

范伯子少年时期家境仍极清贫，他母亲每天纺纱卖钱



以供他祖父生活。《先母述略》写道：“吾父……惧里居养不赡，则举所入悉以奉大父，而独特吾母纺纱之所得而养私室焉。凡吾母既成纱，则令不孝至西门市尽处卖之，买棉以归。其日必令不孝觅晨餐归进大父，日中则为大父具一肉，如是数年。”他弟弟范铠在《敬录〈贞孝君六十述怀〉稿》中也写道：“寒窗纺读一灯前，襄助辛勤仗内贤。怀饼哀中呈大父，十龄儿子易纱棉。”从十一岁起，范伯子就跟王兆榛读书。王兆榛，字景周，诸生，以教授生徒出名，居住在城内，四方来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因为每次考试，他的弟子都能名列前茅，连知州孙云锦都十分敬重他。据民国《南通县志》载：“王授制举业最盛有声，及门甚众，独爱重当世。当世上学，必先及曙为母卖所纺纱于市，归啜粥而后至学。”又载当世“幼即能对偶，工敏惊其长老”。

范伯子十三岁时，祖父去世。十四岁，参加童子试，合格，跟从当地著名学者冯运昌（开父）参加文会，又跟从顾金标学习。顾金标，字京詹，一字韵芳，岁贡生，曾担任海州、高邮二州训导。顾金标曾与其兄顾金楠一起教授于乡里，弟子著籍者各数百人，是当时的著名学者。

同治七年（1868），范伯子十五岁。这一年四月，他参加州试，取第二名。十月，参加院试，落榜。

同治八年，范伯子十六岁，州试第一。与顾锡爵、顾锡祥、陈国璋等为友。结识顾曾焕、顾曾灿兄弟与张謇。

顾锡爵（1848—1917），字延卿，如皋人。同治七年与张謇同榜秀才。光绪五年（1879），应两广总督张树声之邀为幕僚。后从张裕钊学古文。光绪十六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光绪十九年回国，积极投入维新变法运动。顾延卿是范伯子先生挚友之一。

顾锡祥，字仁卿，锡爵之弟。

陈国璋，子紫珊，光绪七年岁贡，如皋人，著有《遗诗》

六卷、《香草词》二卷。

这一年，范伯子与同乡顾曾焕、顾曾灿兄弟交往。

范伯子《顾绮岚先生哀辞序》：“余年十六，识先生兄弟。先生长于吾父且一岁，顾以余方问业于先生季父，折辈行交余，余初未敢当，既益亲则益忘之矣。”（此文《范伯子文集》不载，见于曹文麟《范伯子联语注》）

顾曾焕，字诵芬，号绮岚，通州人，顾金标从子，副贡生。为人渊懿有守，上承诸德，长养诸弟，文行并著于世。咸丰、同治间以高淳学正兼权六合教谕，与弟曾烜共撰《光绪通州志》。有《双梧诗集》四卷。

顾曾灿，字裘英，号樾双，顾金标少子，光绪九年（1883）贡士，光绪十二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与范伯子相交最密。

同治八年（1869），张謇十七岁，范伯子十六岁，两人在西亭求学时认识。

同治九年七月，范伯子参加江南乡试，不中。



城北坐馆教书 谒见著名学者

同治十二年（1873）范伯子二十岁时，顾延卿告诉他兴化刘熙载是一位极著名的学者，范伯子急于去拜见，遭到顾延卿的劝阻。《哀祭刘先生文》曰：“当世年二十而知有先生，盖闻之锡爵。锡爵初不欲当世之骤见也，以为退一乡一国而友天下，必其识足以观天下之善士，苟尚非其人，则宁姑舍是。”

这一年，范伯子开始发愤攻读书史。《题〈去影图〉燕京并簪》中写道：“二十丛书史，发愤忘飧饔。”

这年七月二十五日，长子范罕（彦殊、莲儿）生。

十月，参加岁试，被列为三等。

这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与张謇往来频繁，关系极为密切。

这年八月，曾参加本年恩科乡试，不中。

这一年，范伯子曾去顾锡爵家中饮酒赋诗。《延卿将之广东，招同诸子集于其家，次〈何氏山林〉十首》：

望望蒲塘路，维舟第二桥。故人期陇亩，好会接云霄。作合前时问，朋游隔日招。惟应就芳草，百里未嫌遥。

竟与红尘隔，村居事事清。秋田逢旅雁，春树
息流莺。一姓多羊酒，千家足豆羹。闲时问耕斂，都
吏不须行。

一亩中庄宅，当门老树支。放闲牛掩路，争浴
鸭嬉池。阴屋寒蛛下，深堂晚犬知。主人垢衣出，奇
气忽离披。

覆瓦千梢竹，根墙四面花。屋庐巢翡翠，泥壁
草龙蛇。荷芰风长好，藤萝月正赊。怜君好文彩，未
改野人家。

今上初元日，田间好事开。惟时携绿酒，及尔问
红梅。觴佩忽忽换，巾车岁岁来。中庭吾倚遍，欲问
向时苔。

此日接欢喜，壶觞拥似泉。诸公词落落，十日雨
绵绵。寒菜兼鱼味，新禾得酒钱。不宜问归路，泥泞
隔前川。

帘子秋风起，宵焚百和香。与人同不睡，先我
独惊凉。积架书谁问，横腰剑可藏。梦中好山水，拔
发弄青苍。

有美双双鲤，经年在一池。何人忽临水，对此
更横罟。堂上拜慈母，庭前看好儿。平时暂离别，声
息故相随。

每念山东友，惟看海上云。几人仍绿鬓，万里
寄回文。霜木垂垂下，风花故故分。直须连夜饮，莫
使百忧纷。

即欲东西去，其如对榻何。百年此间乐，一夕好
诗多。陈亮故豪举，马周犹放歌。要知掷时日，未算
客中过。

《何氏山林》是杜甫的一组著名的五言诗。范伯子这组五言



诗，生动具体地记录了当时他与友人聚会顾家饮酒赋诗的豪情逸兴，既是次韵杜甫，风格也极像杜甫。

这一年，范伯子通过张謇的介绍拜见了徐石渔。《上徐石渔先生书》中写道：“徐石渔先生，东方百里之望也，吾以乙亥过吾友张季直海门，季直为介绍以见先生。”

光绪三年（1877）二月，范伯子接受城北十里欧家坊（俗名十里坊）马次垣、江德纯两家聘请，教两家儿子。《寄仲弟欧家坊馆次》云：“昔我幽居地，三年病著书。”《报仁卿书》谈到当时坐馆教书情况：“至于郊居廓如，日夕气清，散步还席，调息数过，然后手一卷之书，究观大意，欣然有得，旷焉感念，居廓如，恒至夜半，区区自待之意曷尝稍敢菲薄哉？徒以精神不良，略不任劳苦，每怀远大，顾此七尺则不适于用，未尝不隐忍废书，屏弃遐想。”可见范伯子应聘到郊区去坐馆，同时也为了养病。

范伯子在欧家坊坐馆教书时虽然身体欠佳，可心情却极愉快。他在《欧家坊野望口号》中写道：“郭外十里烟村深，东家晴好西家阴。秧田如绣木棉长，苍然四顾来欢心。村农似颇解余乐，辍耕荷锄相向吟。夕阳满地各归去，榧子蒲桃香满林。”

九月八日，范伯子从欧家坊回家，正巧张謇来访，便一同去拜访顾绮岚。《顾绮岚先生哀辞序》中写道：“余馆于欧家坊，每一归省，则必与先生兄弟为数日欢。及先生居城南，余复移席于黄泥山，数相遇，谈必竟日。或无言，则相对默坐，倦或卧，亦不忍去。嗟乎！穷不得志，居里巷，而有同郡之好若吾两人者，相与同术业共甘苦，父兄子弟交相友善如家人，是亦天下之至乐也。”

这一年，范伯子发读并整理山茨藏本范氏历代先人诗稿。他在《韶亭公未定稿》中写道：“先公太蒙《勋卿诗》、先公汝受《十山楼诗》、先公濂夫《一陶园诗》，承承总总，

盖三世为海内大家，伟矣！迨先公君宰奋发投笔，有班定远封侯意，卒老于家，乃还使先公韶亭理家世业，遂以上承三世而下开我曾王父。设公之世弃而之他，先泽殆将坠乎！然则是卷虽寥寥数篇，盖吾家中流砥柱云。”

光绪四年（1878），范伯子二十五岁。正月与顾延卿乘船前往兴化拜谒刘熙载。

据《清史稿》卷四百八十记载：

刘熙载，字融斋，兴化人。十岁丧父，哭踊如礼。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命直上书房。与大学士倭仁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倭仁宗程、朱，熙载则兼取陆、王，以慎独主敬为宗，而不喜学葩通辨以下捭击已甚之谈。文宗尝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御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

以病乞假，巡抚胡林翼特疏荐。同治三年，征为国子监司业，迁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督学广东，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谓士学圣贤，当先从事于此。所至萧然如寒素，未满任乞归，襆被篋书而已。

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其论格物，兼取郑义……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

又曰：“才出于学，器出于养。”又曰：“学必尽人道而已。士人所处无论穷达，当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不可自待菲薄。”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二语自励。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著《持志塾言》



二卷，笃近切实，足为学者法程。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又有《艺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昨非集》四卷。

范伯子执弟子礼贽见刘熙载，呈上诗文数十篇。刘熙载招待他们吃饭，赠送《持志塾言》《艺概》《昨非集》等书。他们逗留了两天才回来。这次去拜访刘熙载，范伯子的心情很好，他在《兴化见刘融斋先生，还至欧家坊馆，次寄内弟吴肇嘉》中写道：“湖水连江绿，扁舟载梦归。病消杯在手，寒尽树更衣。樵牧各余契，弟昆惟汝违。松花开落处，应有彩云飞。”

二月九日，至欧家坊马氏馆开学。十二日，去白蒲吊唁沈镗。沈镗，字笠湖，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官兖州同知，主紫琅书院最久，学者都很敬仰他。曾与顾曾焕兄弟一同修撰《光绪通州志》。

同日，给顾延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埭上皋比之座，铸忽焉动念，拟即以吾仲弟当之，既为令族得一能师，更为吾兄得一学弟。吾仲弟固不好为师者，然闻此意颇首肯，有所大欣慕于中也。”范伯子举贤不避亲，推荐二弟仲林就任埭上顾姓塾师。

四月三十日，将诗集命名为《彦牖集》，这是范伯子诗歌的第一次结集。

春末夏初，范伯子携带弟弟范铠一起去黄泥山之新绿轩读书养病，直到初冬才回家。从此，新绿轩成为先生心中的一块圣地，他不仅在《留别新绿轩》诗中予以赞美：“篮舆侧放山门下，我作山人尽一餐。芳树如闻啼鸟怨，残花犹恋去人看。百年香火崇碑在，四海烟涛一剑寒。莫复殷勤为后约，还山古有万千难。”十二年后，还在《去影图·〈黄泥山读书〉》中写道：“十二年前，携吾弟秋门入黄泥山之新绿轩读书养病，寄食于僧家，日供一蔬，见山下有携鱼过者，辄呼

而指以所从人，人或不闻而去者亦多。”诗中写道：“儒者称名山，山以儒名耳。荒山与穷儒，千载谅不毁。早入名山中，其人可知矣。狼山非不高，名盛吾所耻。蔼蔼新绿轩，相望只数里。喧寂异仙凡，金焦尚难拟。南疆万车马，西去无一趾。山门到者稀，轩堂复谁履？萝石牵杂花，迷离夹松梓。秘绝通岩扉，辗转达轩址。而我来此间，洒扫布床几。塞窦断来踪，穿墙发远视。春深地不宽，世乱心长已。惟珍病后躯，自惜闲中晷。蔬饭充饥肠，呼鱼那可指。追维是时乐，真实亦无侈。谁令襦被归，长作远游子？”

十一月十四日，同王欣甫、杨子青一起去海门常乐镇，祝贺张謇母亲生日。与众人聚饮，“风雨潇晦”中，“管弦之声与不歇者凡七越夕”（《与延卿笺》），喝酒时范伯子大谈百姓富产之论，听的人都很振奋。

二十一日，先生与大家分别，送王欣甫河上。

又《与王欣甫笺》：“送子河上，日夕风紧，浮云荡天，败叶如雨。此时眼中之欣甫，非复青眼高歌之欣甫，直是薄宦可怜之欣甫；意中之欣甫，非复谈笑初温之欣甫，直是几年寤寐之欣甫。时，欣甫大悲泣数下。余慰之曰：‘后此六十日，吾母称五十觴，若来寿吾母，当复欢。’欣甫曰：‘自非余病大作或有故，当来，顾事未可知耳。’”范伯子真是性情中人，居然使对方如此感动！

这年冬天，为筹措双亲生辰，范伯子四处征文。

光绪五年（1879），范伯子二十六岁。这年正月，恰逢他母亲阴寿五十、父亲寿辰五十三。马毓鋈（勿庵）、顾曾烜、周源灏（少墀）等都至范家祝寿，一起在西山饮酒后，游马鞍山、狼山，直至白衣庵。

马勿庵，原名钊，更名毓鋈，字莲卿，因爱慕康熙间宣城学者梅文鼎（号勿庵），故又字勿庵。光绪三年进士，以庶常家居，经常与范伯子、张謇、朱铭盘等聚会为诗歌，往往



通宵达旦。

顾曾烜，字升初，一字晴谷，晚号方宦，通州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任宜君、醴泉知县，署耀州、郃阳二县事。为民平反冤狱，声名卓异。大官们都很看重他的文章，往往派下属官走马索取，顾曾烜都能立即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后因足疾回故里，为乡亲所敬重。著有《方宦寿世文》《华原风土词》《光绪通州志》《方宦俚语》等。

正月二十九日，范伯子的同学达寿增的祖父达葆青（晓山）去世，范伯子写了《晓山达公墓志铭》。范、达两家三世交好，情意深厚。《晓山达公墓志铭》中写道：“自余为儿时，侍先大父左右，于乡先生过从者未尝不问，问即未尝不心识。一时巨人长德，指不胜屈。其恭俭若怯、循墙而走、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者，吾知为晓山达公。先大父尝指而谓余曰：‘是与交四十年并时补学官弟子者，今独吾两人矣！’因与公欢笑。其后数年，先大父卒，公哭甚哀。又数年，余复与公之孙少卿同补学官弟子，谒公。公喜曰：‘吾两家之好及三世矣！……若先大父与公固皆有古人之契，而家君与公子明经君又好以行谊节操相砥砺，少卿又慷慨好学问，爱余之兄弟，往往不耻为刍蕘之诤，宜吾两家之好独至也。’”

二月，顾延卿之母邀成夫人共游狼山，范伯子陪同。

《题〈去影图〉〈狼山观海〉》诗前小序云：“顾延卿之母邀吾母登狼山，大桥从焉，遂与之登大观台观海，指顾苍茫，大桥陨涕，哀恻之意不知所为，而十载夫妻犹以此为极乐。”

八月，参加本年乡试，不第。同月，去上海龙门书院谒刘熙载。《哀祭刘先生文》：“至于明年，先生在龙门，龙门弟子孙点以书来告曰：‘先生念子，子不能来，则先生就子矣。’于是，当世以秋八月往，先生穷日夜之力而与之言。”由此可见范刘师生情谊之深厚。

十一月十二日，因张謇母亲金太夫人病危，赴常乐镇探望，十四日回通。十八日，张母去世，二十一日，再去常乐吊孝。这年年底，范伯子与王欣甫、刘馥畴（逢吉）、黄君俭（世丰）、杨子青等到常乐张謇家作消寒会。张謇有《王欣父、刘馥畴、范肯堂、黄君俭、杨子青同在海门作消寒会，别后分寄诸君》诗，第三首写道：

兴尽悲来漫拍张，白狼小范最能狂。酒酣一唱
筵篴引，四座无言各断肠。（张诗自注：“‘白狼小
范’，铜士有此印。”）

由此可见，当时的范伯子是相当活跃的。

范伯子在《题〈去影图〉·水心亭宴集》小序中写道：“故乡朋友之乐，莫盛于光绪五六年间水心亭宴集，盖常事也。大抵晨夕共者，吾与马勿庵、顾晴谷、王云悔；时时至者，顾延卿、顾涤香、裘莢及吾弟仲林；二三至者，周彦升、张季直、朱曼君；若樵秋则一至而已。”

顾涤香，名曾沐，字述铭，通州人，从小落拓不羁，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因母亲年老不愿外出当官，主持江阴礼延书院。母亲去世后，曾去浙江当知县，被吏部议落罢职，忧愤而死。著有《希造适斋诗集》。

光绪六年（1880）正月，张謇家治母丧，范伯子与二弟范钟赴常乐吊唁。

二月，张家勘寻葬地，与范家互换田地。

三月十三日，张謇母亲棺柩安葬，范伯子冒大雨去送葬。《张謇日记》：“十三日，寅初开圻，辰初二刻扶柩归窆，时方大雨。宾客则马勿庵、顾次山、蒋月波、朱曼君、范世伯与铜士昆仲、张虎庭叔侄也。”

三月十八日，张謇回浦口军幕，过通州时会见范肯堂，范肯堂、朱铭盘就与张謇一起去浦口。（《张謇日记》）这次



同行，三人在舟中共做了《舟中连句倒押五物全韵》《诸葛忠武侯画像连句》《哀双凤诗连句》《仪征道中联句》等四首联句诗。

四月初一，范伯子与张謇、朱铭盘过江到江宁。

三日，吴长庆因有陛见之行，张謇等人随伴；张裕钊因事去山东，范伯子就跟他们同行。到了扬州后，范伯子拿出自己的诗文请张裕钊指教，张读后认为“其辞气诚盛昌不可御，深叹异，以为今之世所罕觐也”（《濂亭文集》卷一《赠范生当世序》）。这是范伯子初次向张裕钊请教为文之法，为范伯子列张裕钊门墙之始。

当时张裕钊主持江宁凤池书院。凤池书院，嘉庆间创建，专课童生。道光间改建于旧王府五亩园之东池，号舍讲堂整齐宽宏，馆桥亭台、花木草石擅一时之胜。这座书院在咸丰间曾一度被毁，同治间复建。

四日，范伯子、张謇、彭芾亭陪同张裕钊游平山堂。

入夏，范伯子从方浚颐（子箴）游宴，方浚颐为范伯子作文序一篇。

《酬方子箴廉访赠文序诗》写道：“昔闻邗上题襟处，今过高斋得见公。江左文章诸老尽，淮南钟鼓几人同？青天酒盏无弓影，夕照轩窗有绪风。一序深惭负滕谷，江关庾信尚西东。”

又《太守从容示图卷》诗前小序云：“旭庄示以通分司方君揖赵所藏《岭还七友图》，发之，则子箴方先生俨然在列，且即余庚辰夏闲日从先生游宴时之所为，读其遗文，观其风采，益叹先生之为吾作序于今已二十五年而吾衰病遂以至此也，感题一首，以复于旭庄，并贻揖赵。”诗云：“绿鬓少年成感旧，乌衣弟子喜能文。江关实有飘零恨，一序深惭负此君。”

方浚颐，字子箴，号梦园，安徽定远人。道光二十四年

(1844)进士，从编修升迁至四川按察使。同治八年(1869)出任两淮盐运使，因岁课开办淮南书局，聘请四方著名学者校勘群书。晚年以诗古文辞主讲于江苏安定书院。著有《二知轩诗文集》。

七月，与朱铭盘一起去凤池书院拜见张裕钊，向他请教为文之法。张裕钊作序赠送。

八月初七，少詹事浙江瑞安人黄体芳继任江苏学政。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同治二年进士，授编修，官至兵部左侍郎。与张之洞、张佩纶、于荫霖共称为“翰林四谏”，为同光间清流魁首。后以劾李鸿章治兵无效而降通政使。同治十七年因病乞归。

黄体芳任江苏学政期间，范伯子、仲林兄弟入其学幕，黄对二人极为看重。言敦源《〈范伯子先生遗墨〉跋》：“范肯堂先生当有清同光之际，为武昌张濂卿先生入室弟子，与其弟仲林、秋门皆负文章重名，瑞安黄侍郎体芳督学吴中时所目为南通三雄者也。”

冯开《夫须诗话》言浙江慈溪王定祥“晚年入瑞安黄侍郎江苏学政幕，颇与通州范肯堂当世、仲林钟兄弟，泰兴朱曼君铭盘诸名流相契合。至是诗学益駸駸日上”。

又王伯恭《螭庐随笔》：“张香涛（按：即张之洞）为湖北学政，刻试牍为《江汉炳灵集》，皆樊云门增祥一人所作，非庐山真面也。其文犀利新颖，最为当时称颂。比黄漱兰为江苏学政，仿其例，刻《江左校士录》，丐范肯堂为文，而加以朱曼君铭盘之诗赋，亦风行一时。”由此可见黄体芳对范伯子的推崇。而范伯子在《武昌张先生七十寿言》中说李鸿章、黄体芳、张裕钊三人为“知我、爱我、教诲我”者，又说：“以余所识天下之长者，乃独有相国、通政及先生三人”，可以看出黄体芳等在范伯子心中的位置。

八月初，再去浦口，病中作《送彭芾亭之官安庆序》：



……自彭君为秀才，固已有声矣，得地而君之，吾知其闻必远也。独今也往，大吏尚未有知彭君者，意者为众人之所为不足以见彭君之才乎？彭君亦坚其所自命者而已。吾与彭君交不过旬日，而有平生之欢，辄复为斯言。他日者幸复相见，握手极乐，更相与道之。

由此可见范伯子对彭芾亭的敬仰之情。

八月二十一日，从江浦回通州，听说受业师王兆榛母陈太孺人去世，第二天前去哭吊。十天后，作《王母陈太孺人哀辞》。

光绪七年（1881），范伯子二十八岁。这年二月，刘熙载在兴化家中逝世，享年六十九岁。三月，范伯子与顾延卿一起去奔丧哭吊，并各自写了祭文以寄托其哀思。范伯子《哀祭刘先生文》写道：“……当世年二十而知有先生，盖闻之爵锡，爵锡初不欲当世之骤见也，以为退一乡一国而友天下，必其识足以观天下之善士，苟尚非其人，则宁姑舍是。于是当世怀愿见之诚五年，然后乃见于先生之里，退而上所为文数十篇，则先生以为可喜也。至于明年，先生在龙门，龙门弟子孙点以书来告曰：‘先生念子，子不能来，则先生就子矣。’于是当世以秋八月往，先生穷日夜之力而与之言。于其将行也，而后定所谓亲炙记言者七纸。其时大风雨，夜过半，渴而思饮。当世执烛，先生挈茶具，之灶下而火之，饮而旨。先生喟然而叹曰：‘此乐岂易得乎？吾老矣。逾明年，将寓食于汝所谓黄泥山者，以邻于汝，以遂吾之志。’于是当世窃喜奉先生之日甚长，谨归而俟焉，孰谓当世之于先生乃从此而止乎？先生之学，独为乎程朱之难而深求乎孔孟之际，当世自度终身不敢望，而亦不敢自以为不智。先生之歿，天下皆叹息，以为德人。究其所以状先生者，或万言而不得其似。先

生之书，明明可观，意其更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显于世，而当世之于先生，则不能不以万一自任而求所谓继。呜呼，大道茫茫今哲人已死，成之弥艰兮废之可耻，吾安适归兮而大言若此，心结辞迫以抒一哀而已矣。呜呼，恻哉！”

六月，范伯子又去上海，祭刘熙载于龙门书院。《与同学者共祀兴化刘先生于龙门书院，哀感成诗》诗曰：

城郭三年别，门墙一恻深。池荷还炫日，堤柳尚成阴。游从斋房减，埃尘讲幄侵。黯然值诸子，相对忽沾襟。

亲炙无多日，师恩自觉偏。来时先目断，归路更心悬。待对空山榻，长休大海船。岂知临别语，遗恨已千年。

跋涉师怜我，连年更未休。风尘徒不肖，悲愤已堪羞。独夜一回首，当春那得秋。嗟哉览兹宇，麟凤去悠悠。

俎豆今来意，诸君兴慕思。师亡胡可倍，道大固应歧。白石犹能确，狂澜未可知。苍茫千载事，流涕向崇祠。

读了以上诗文，我们更加具体感受到范、刘之间深挚的师生情谊。

同时，范伯子认识了袁昶（爽秋）。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重黎，一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直隶布政使等职。1898年任总理衙门大臣，第二年改任光禄寺卿、太常寺卿。他主张兴学校、改官制、办洋务。著有《于湖文录》《浙西村人集》等。

范伯子《哀袁爽秋》诗写道：“昔我游龙门，言从兴化师。师曰及门中，隽者汝知谁？适来有袁生，灿烂多文辞。其



人亦静美，与汝能相资。已闻师谓彼，亦曰范生宜。猝然不可并，各逐风尘驰。维岁辛巳春，木坏吁可悲。四月临殡所，六月龙门祠。于时一见君，戚痛胡能怡？相向哭而散，各复之天涯。”由此可见，他们原来是志气相投的同学。

这年七月，范伯子在凤池书院拜见张裕钊，认识武昌同宗范志熙（月槎），作《范月槎先生仕隐图序》：

当世在武昌张先生书院，观察月槎范公闻而好之，既枉过不遇，则召之饮。问家世，乃知其先并出文正公，始迁之代并由江西。自文正公至于迁其间，又并皆有所缺失，而通州视公武昌稍有绪，于是略为公言苏州大宗谱所载别子流寓江西在有宋之季。谱，吾先世手钞者也。又先勋卿公之时，沈阳文肃公集录范氏谱，尝使人求通州支而考其世次，将并载焉。文肃公之先，亦自江西迁沈阳者也。于是公以为前所缺失，求之沈阳当有闻，于大宗谱又能得数世，则大喜。出所谓武昌谱与观览其年代系属，指陈其先德，又益示以生平所为诗，与官国子助教时所绘仕隐图，以道其夙昔之志。当世感公之所谓仕隐云者，乃慨乎念我勋卿公之盛烈亦若，可以广斯图之说。于是复进于公曰：“先勋卿公之成进士，不欲为吏，改教授顺天，转为助教十年而后迁部郎，谏不用而归，归四十年，五起京卿皆不出，天下号为真隐。当是时，文肃公佐圣清，建伊吕之业，而吴桥文忠公劲孤忠于明，功名之盛，无若范氏。而史忠正之论先公，则曰：“范公以气节为天下倡，其功甚鉅，其不仕固贤于仕也。”由此观之，道之行不行，命耳！衷乎圣贤者之意，则显晦之际，岂有殊哉？

公之为斯图，岂亦不域乎其所处而有类于昔之

人者与？公谢曰：“是何敢望。然幸从吾子多闻范氏之盛美，请载之笔而俾余观焉。”乃退而序其先后之言如此。光绪七年七月。

同宗相认，谈论祖先忠于明朝的事迹，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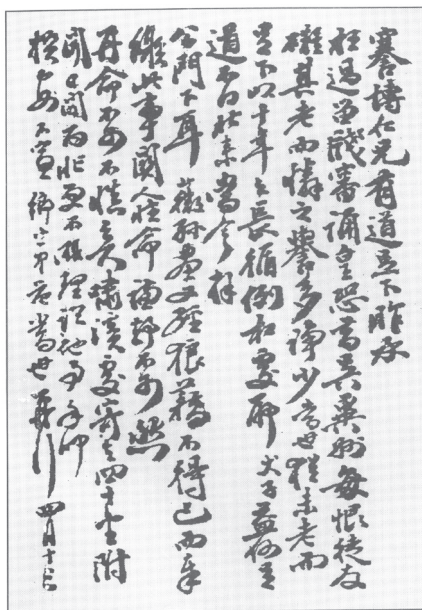
光绪八年（1882），范伯子二十九岁。正月与二弟仲林跟从学政黄体芳巡省科试随棚阅卷。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每日过老师船上吃饭，早饭谈至午、未二时，晚饭自酉正谈至子初，唯恐男兄弟之欲去也。钟或以头痛从船后逸去，则惘然不乐。至今犹延此例，故来此旬日只有谈天工夫，或开考之后能以晚半天做事耳。老师相待固无所不优，而近来相知亦极深。昨日一席呕心之谈为百年之约，乃知此老胸有成算而目无余子，迥非从前意料所及，安得非第一流乎？去年钟归后，毁钟之人殆无所不至，老师愤极而逐之，今一一相告，或气极不能成辞，则令邵季生代述，总之无毫末之动于中者。钟之为学为人，老师所谓广大作用不及男者，然其信重之若此，真可感激……老师前夜云：‘试至通州，必有闲话。我则一秉大公，并不记名，要之有才气，有功夫，我自赏识，可写书勉之也。’弟此数月在家，当专力于时文、律赋、小楷，余者皆缓，更无他属。”从这封家书中，可见学政黄体芳为人的正直以及对范伯子兄弟二人的看重。

本月，王树楠（晋卿）由保定莲池书院《畿辅通志》局赴冀州出任信都书院山长。

三月，张謇向冀州知州吴汝纶推荐范伯子。王树楠中第之前，在冀州与伯子先生唱酬甚多。

四五月间，范伯子去上海，遇同乡友人张攀桂（樵秋），流连十昼夜。张攀桂，字樵秋，同治二年（1863）二甲进士，曾任当涂知县。四十多岁时罢官，靠坐馆教书为生，非常敬



范伯子手迹

谈古文之事，遂深愿之，曰：“我能是，我老是间矣！”为序传碑志十余篇，多有矩法。其称述母行尤悲，穷而为此，终已不获。稍有所立，年不究而死，是可哀也。始吾授徒于乡间，若樵秋、勿庵之徒，皆游仕在外，未尝见知。既勿庵归，同吾游甚欢，诸公愿从者众，文酒之事不绝，而樵秋已解当涂印，尝一过其间。光绪八年，樵秋已去安徽，应闽抚岑公之聘，见余于上海，流连十昼夜，如不欲行。及余赴乡试，过其所居，则樵秋已反，即从余至金陵。余之兄弟皆好游喜朋，尝苦于乏绝无赀不得尽其意，得樵秋闽归百金，乃颇以时张饮治具及曩所契阔笑呼寓中，而所居为江宁伍氏之别墅，有竹木花石之娱……然樵秋自是之后而及余还里，遂与吾家益

仰范伯子的为人，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范伯子《樵秋哀辞》中写道：

樵秋盖起于通之僻乡，幼孤赤贫，至其为时文则绝慧，自为诸生至于成进士，未尝再试。为县令安徽，聪明亮达，所至有声。及知当涂县，与学政齟齬罢官，乃发愤于书卷。会以其时与余缔交，

亲。明年，余馆江夏，樵秋亦就馆芜湖，出则俱出，还则俱还。余所获数倍于樵秋，而樵秋所余常为我用。既来北方，绝远，樵秋益落莫，常居城闾。余独悲其外不得于时，而内无妻子之乐，区区获余而守之，卒以单独客死，而未尝有毫发之利也。

这年秋天，范伯子应乡试，不中。三十二岁应江南乡试，不中。三十五岁范伯子兄弟应江南乡试，皆不中。到这时，范伯子已九次参加乡试而不中，便绝意仕途，不再入场。《与张幼樵论不应举书》曰：“游谈十年而产不进，不以为贫；九试不得一科，不以为贱。唯独病几没身，不能不惧，而因此废试，亦不以为高。”由此可见范伯子的高尚情怀。



范吴伉俪情深 悲切悼念难忘

同治九年（1870）初秋，范伯子去通州吴菱庵家，下聘吴大桥为妻。吴大桥长他四岁。

同治十一年，范伯子十九岁，娶吴大桥，当时她二十三岁。《大桥遗照诗》小序云：“此所谓大桥，乃吾所居通州城郭之东偏十五里许有所谓新地者，有水桥一区，类如斯图，而亡妻实产于是，其父母因以桥名之。”

贺涛《贺先生文集》卷一《题大桥遗照》：“通州范君肯堂不忍死其妻，图其母家所居曰‘大桥遗照’。大桥者，所居之里有桥而其妻取以为名者也。”

婚后两情相悦，夫妇生活极为和谐，两人恩爱地生活了十一年，生有两男一女。

光绪九年（1883）范伯子三十岁时，元配夫人吴大桥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这年四月，范伯子前往湖北通志局修志。二十二日至上海，二十八日由上海乘船去湖北。当时吴夫人大病方见起色，先生为稻粱谋不得已而赴湖北。想不到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

《湖北通志局闻妻丧，于时方修〈列女志〉，稍整齐而

后行，悲苦之余，犹翻故纸，停笔写哀，遂成四绝》之一自注云：“四月二十二日，余去家至上海附番船，二十八日成行，二十九日过狼山，而吾妇乃歿于斯时也。”从上海乘船去湖北，船仍需先经过狼山然后向西航去。范伯子的船在二十九日经过狼山时恰好是他的夫人去世之日。咫尺之间而生死异路，怎能不使范伯子悲痛欲绝呢？下列四首诗正表达了这种心情：

耗至惊看吾父笔，行行老泪写哀词。如何薄命无妻日，正是过门不入时。

一病新从九死还，分明给我去乡关。平生已种无边恨，此恨绵绵况可删。

入棺闻说彩衣鲜，费尽亲心总枉然。十载宵晨有饥饱，不曾销我卖文钱。

迢迢江汉泪滂沱，秉烛修书且奈何。读罢五千嫠妇传，可知男子负心多。

范伯子居然痛骂自己是负心男子，可见他心痛到何等程度！

范伯子接到噩耗回通州后又写有挽联：

又不是新婚、垂老、无家，如何利重离轻，万古苍茫为此别；

且休谈过去、未来、现在，但愿魂凝魄固，一朝欢喜博同归。

范伯子与吴夫人恩爱地生活了十一年，生有两男一女，长子范罕（乳名莲儿），长女范鞠（乳名菊儿，后名孝嫦），次子范况（乳名襦儿）。当时，三个孩子都还幼小，范罕十岁，范鞠八岁，范况只有四岁。

吴夫人虽然出身于商贾家庭，但由于受他哥哥吴肇嘉的影响，多才多艺，通书法，兼能吟诗，尽管比范伯子大了四



岁，夫妇间感情仍极深挚。

《题大桥影子》题下有注：“选于《百美图》而得其似者，写悬于斋，无可奈何之事也。于时挚父先生实始为之媒，是以又有《大桥遗照诗》之作。”诗云：

斋阁焚香对画裙，神魂相接若为群。烟霄鸾鹤浑无似，莫向人间索虎贲。

《大桥遗照诗并序》云：

此所谓大桥，乃吾所居通州城郭之东偏十五里许有所谓新地者，有水桥一区，类如斯图，而亡妻实产于是，其父母因以桥名之。桥之歿而余不获诀念，欲图其貌而无从为画工言也。文君右泉游楚不得意，吾携以归，而右泉善画，吾因与之擢舟至新地，观亡妻之故居，而属为之图斯桥，并图其地，以谓此所以存我亡妻云尔。呜呼！地则恒是耳，桥亦不可以百年，而此之薈如著烟雾于纸上者，果何物也哉？而我又能长玩乎此哉？系以诗曰：

若人一徂逝，杨柳三枯荣。荣枯劫未已，何如人去不复生。君魂匿吾心，君貌悬吾睛。若为相对复愁苦，达者胡为不自宁。大桥莽烟水，从此无君形。亦欲出君魂，持之当风飏。柔胞复几何，凌暴吁可伤。待吾精力消磨尽，及尔同归何有乡。

吴大桥没有留下遗像，范伯子只好从《百美图》中选一仿佛妻子的美女，叫人画下来当作妻子的遗像，请友人到妻子出生地画下那座大桥，象征妻子的遗像，真亏范伯子能想得出来！由此可见范伯子对于妻子真是难忘啊！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范伯子从冀州回通后又到妻子墓前去祭奠，写有《大桥墓下》：

草草征夫往月归，今来墓下一沾衣。百年土穴何须共，三载秋坟且汝违。树木有生还自长，草根无泪不能肥。泱泱河水东城暮，伫与何人守落晖。

诗人面对着泱泱的河水、苍茫的落晖，伫立于妻子墓前，禁不住泪下沾衣。此诗写得情景交融，读来真能催人泪下！

范伯子这种情怀还直接影响到后妻姚倚云，他在与姚倚云新婚之后居然能与后妻一起观看前妻遗像，并共同写诗怀念。《与蕴素联吟乐甚，因而感怀前室，诵其遗诗，忽复与之流涕，蕴素用前韵，余复次之》：

墙外群山拥髻来，墙隅花萼接莓苔。鸟啼清脆蜂声暖，龙井香甜蚁瓮开。好事只今疑过分，悲歌对子不能才。一篇残稿嗟何吝，十七年间事可哀。

这真是旷世稀有的情怀啊！而姚倚云也写有《题大桥遗照》诗：

初生月魄挂庭木，窗外莎鸡噪深绿。卷帘风定妙香来，使我清绝忘荣辱。堂高室净多天籁，灯火青荧秋肃肃。清夜沉沉诵楚辞，慷慨悲歌忘检束。停杯掩卷起徘徊，聊尔披图豁双目。嗟哉此画所绘谁？万柳凄迷涂其幅。人间结境有许哀，从来此事伤心目。纸上传心不传真，大桥魂魄今何属？义为一体不相亲，蘋蘩自愧为君续。甘贫乐贱非我谋，不期富贵从君淑（遗诗有“惟应作贤者，富贵不相期”之语）。天意并许归斯人，纷华安得移素欲。揽图援笔百感并，写我凄凉致我情。人生泡影安足瞬，徒尔哀哀清泪横。他日黄泉会相见，眼前人事归吾营。会须凭吊苍烟处，慰尔穷愁老父兄。

吴大桥生前不图丈夫富贵，只希望丈夫能成为贤者。而如今



姚倚云也是“不期富贵从君淑”，对丈夫的前妻不仅没有丝毫醋意，而是充满敬意，充满忆念真情，真是难能可贵啊！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初四，范伯子与姚倚云设位祭奠前妻吴大桥，祝她四十冥寿。

《吴孺人四十诞辰祭文》写道：“光绪十五年（原作十四年，为误刻——引者注）正月四日，范当世与继妻姚氏谨就安福甥馆为先室吴孺人之位而祭之以文曰：子年三十，吾是时贫甚，犹竭力而致客。客散，子怜其劳，以为何必作此无益耶？吾笑曰：‘是不足言，待我十年而富贵，将惟子之所择焉。’子亦笑曰：‘君不闻吾厄运在癸，若一木之浮于大泽乎？待至四十之年，吾墓树积矣。至于其时，子与新夫人奠我一觞，是亦不忘畴昔也。’”范伯子这次祭奠，是践约前妻生前之山盟海誓，真令人感佩啊！

三年冀州执教 培养无数英才

吴汝纶早在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就已去直隶冀州（今河北冀州市）任知州，一直想聘请范伯子执教于冀州。

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吴汝纶有《答张廉卿》书说：“铜士明年当望北来，兹有书币奉迎，即求转达为荷。”在给范伯子的信中说：“前岁接奉惠书，三年不报，非敢故为疏阔，缘数年以来，处心积虑，必欲一枉高轩，而时会所值，至不能自决进退，用此含意未伸。及廉卿先生北来，则又私心自喜，以为铜士在吾术中矣，不谓人事牵系，尚复沉吟至今。踪迹之合并以不，信有主之者耶！朋友道衰久矣，悠悠者追趣逐嗜以相取益，卯亲酉疏，甚者争为朋党，私立标帜，倾动时人，究乃人各一心。虽日与连榻而居，抵掌而谈，而腹有山河，咫尺千里。若吾二人之南北睽隔，言论不一接于耳，风采不一接于目，而声气相感，兴往情来，盖不必足音蛩然，而已若胶膝之不可离别，斯已奇矣。来岁倘能北来，过访濂亭，幸以鄙州为北道主人，俾某获遂数年夙愿，私心快慰，岂有量耶？奉上白金五十，为执事膏秣之资，迟速惟命。万一鄂事未了，固亦不必亟亟北行，需之数年，不难更缓数月，幸勿因志稿未竣，掷还往物为望。孤城寂寥，无与晤



语，官事羈屑，都已废书。濂卿近在三百里内，而不能请益。执事闻所闻而来，仍恐见所见而去耳。”（《桐城吴先生尺牋》）由此可见范伯子在吴汝纶心中的地位。

十二月十三日，吴汝纶有《答张濂卿》的书信，信中说：“前接长至日手书并寄示范函，敬悉一一。某于此君梦想三年，迄未合并，此次作书奉招，而范已决计北行，可谓神情契合。南有南皮而不往，就此，则老兄在北，使弟得如孟德挟天子归许下耳。”（《桐城吴先生尺牋补遗》）范伯子辞去张之洞请他当官之聘而答应吴汝纶北上冀州教书之聘，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范吴交谊之深厚，更可看出范伯子恬淡崇高的品德。

光绪十一年（1885），范伯子三十二岁，这年三月，他应吴汝纶的聘请去冀州。

过峯山（在今山东邹城东南）有《峯山夜吟》诗，诗中多怀念前妻吴大桥的内容：

凌晨发铜山，偃蹇四体轻。升车抱头卧，轧轧摧轮惊。微吟遣白日，倦眼无由醒。昏昏涉百里，日夕骏骅停。僻路稀人烟，店小无檐楹。土房二三尺，河水杯中盈。倚墙发半被，但睡无所营。忽闻呢喃语，在我头上鸣。举头见双燕，急泪当时倾。忽忽三年间，未尝闻此声。何因却遽此，待我哀平生。金窗绣户不足择，耦寄蒿下如蓬瀛。人生结发有真意，栖茅饮水何其荣。不然远道阻征役，相思万苦皆履情。而我作客客何梦，梦见故山枫树莹。雨淋雪压莹不扫，风欺露侵客不宁。积此两途恨，欲诉俱无灵。万一犹能化精魄，翩翩羽翼翱沧溟。而我未曾告所适，奋飞安得魂来并。南方有寡妇，白燕巢其楹。孀雌号故雄，哀哀不忍听。山鸡翟雉不敢劝，青灯白发来相萦。北方有老鰥，雉飞当前横。相看勇

气满，太息摇其精。少年自谓国风好，恶闻此操心弥贞。君不见北川之水天上月，处处流光相对明。黄河一沉沙，万古长冥冥。

闻双燕鸣叫而触景生悲，想象妻子的魂魄即使想来寻他也找不着，又用寡妇哀号、老嫠叹息来渲染气氛，最后以“黄河一沉沙，万古长冥冥”的哀词作结，令人不堪卒读！

范伯子到了冀州，张裕钊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高兴，在回复范伯子的信中说：“得手书，知己至冀州，喜慰无已。摯公才学识三者，十倍鄙人。足下得所依归，望益锐意精进以副鄙怀，幸甚！”又有给吴汝纶的信，信中说：“近所得海内英俊之士，惟肯堂及贺松坡。松坡深感阁下遗我奇宝，今肯堂又得亲承教益，尤为喜幸。伏望一铲去宾主形迹，勸励而教诲之，俾得有成，亦我公一大功德也。”（《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一）

吴汝纶聘请范伯子到冀州来，本想任命他当书院山长，但范伯子倜傥不羁，士人中颇有闲言碎语，因而未能任命他当山长，范伯子仅是执教其中。

吴汝纶《答范肯堂四首》之四云：“山川无新故，弹压要人文。不才食瘠土，岁久空纷纭。公来破其荒，龙虎生风云。莘莘媚学子，淳如苗怀新。道高辄惊众，耳语犹断断。岂知千载胸，岱岭看浮云。平揖呼乔松，并坐分中庭。下视悠悠人，杯水旋螺旋。我虽老不学，稍稍尝其皤。日对绝尘足，愧无十驾勤。昨日示新作，对案来杜韩。弱才哪能知，聊使诸生闻。”（《吴汝纶诗集》）似有劝慰之意，而范伯子对此事却并不介意。

不久，范伯子认识了信都书院山长王树楠，与之交往日深：既读其诗歌，论其骈文，又评校其所注《墨子》，叹其无所不能；王树楠亦读先生文章，并以先生《山海》（见《范伯子文集》卷二）之文所说为不典，乃博稽载籍，拟黄庭坚《演雅》给范伯子看。凡此种种，真可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



析”了。《演雅》是《山谷集》中一首颇为诡奇怪异的诗。何谓《演雅》？这得从我国最早的一部训诂专著《尔雅》谈起。

《尔雅》是汉初学者编纂的一部解释名物的专书，共分十九篇，其中有《释虫》《释鸟》各一篇，解释各种虫豸和鸟类。黄庭坚这首诗，写了四十余种虫和鸟的特性，似乎是演绎《尔雅》的，所以叫做《演雅》。但大家不要误解，以为这也是训诂专著；其实这是黄庭坚很巧妙地采用训诂形式写成的一首讽世杰作。此诗以虫鸟特性比喻世态人情，含有很强的讽刺性。如“桑蚕作茧自缠裹”比喻作茧自缚者，“蛛蝥结网工遮逻”比喻罗织罪状害人者，“燕无居舍经始忙”比喻为营建自己的安乐窝而奔忙者，“蝶为风光勾引破”比喻经不起外物的勾引而失节破身者……此诗共写了四十一种虫鸟，作者只是准确地概括了它们各自的特征，至于寓意，一字未写，但读完以后，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种种社会现象。这就是这首诗构思的巧妙处、诡谲处。现在王树楠拟黄庭坚《演雅》给范伯子看，可见他们真是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啊！

这年夏天，武邑知县郑襄来到冀州，范伯子陪他饮酒。

范伯子的受知老师江苏学政黄体芳之子黄绍箕（仲弢）出京赶赴四川任乡试副主考，范伯子在保定旅店中碰见他，将张裕钊的《濂亭文集》送给他，写有《保阳道中遇黄仲弢于逆旅，方知其奉命典试四川，忽忽不能多谈，赠以濂亭文集，口占二诗，以道其所欲言者》：

意外逢君驻使车，三年颜色若为臞。尊亲劳苦能加饭，舍弟忧伤待废书。首夏沛中余北向，先春淮上彼南图。飘零一聚师门下，南北相望更二吴。

君抚斯文讯武昌，冀州旗鼓亦相当。眼中意态今无右，天下人才诎可量。叔度此行真不易，相如几辈或相望。吾家门外江朝海，为我探源记数行。

黄绍箕，字仲弢，一作仲韬，号漫庵。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编修，擢侍读。与康有为有交往。戊戌政变后，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出为湖北提学使，东渡日本。深入研究东西方学制，编辑有《中国教育史长编》。光绪十一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四有传。

七月四日，范伯子三十二岁生日，写有《三十二岁自寿》诗，将自己比成颜渊、贾谊：

颜子当我时，怡然顺化理；贾生在我时，悲天哭
不已……戒哉令誉乘欢来，誉来汲汲思二子。

吴汝纶有《范无错生日次韵奉贺》诗勉励范伯子：“无错希二子，二子易与耳。”（《吴汝纶诗集》）

七月五日，范伯子带了吴汝纶为伯子父亲荫堂封翁所作寿序南归，因为第二年是封翁的六十大寿。

吴汝纶有《依韵送范肯堂南归》诗：“道适前无古，才横空所依。心知非力强，目接似君稀。巨海收清淑，幽灵饷苾醅。耸身蹈霄汉，落笔有天机。鬼物穷艰怪，烟云眩是非。一诗初北走，三载怅南睎。……望深才一聚，欢浅遽言归。覲省知何乐，康强那更祈。近怜文度返，久忘长公饥。轼辙家全有，丘轲后可几。青衫明日脱，为道欲抠衣。”（《吴汝纶诗集》）范伯子曾自比为苏轼，吴诗故有“轼辙家全有”句，连带说及其弟；又希望他能有孔子与孟子一样的成就，故又有“丘轲后可几”句。由此可见吴汝纶对范伯子的器重。

王树楠也有《赠无错》诗：“我年三十二，躬舄趋冀州。君年三十二，亦此来倾投。吴公府潭潭，临渊日敲钩。游鳞饕大饵，一钓鱼双头。我当君之年，细于蛤与蚶。君已变瑰怪，捷翔龙虬。君乃弗自伟，日日加鞭鞑。进退不旋踵，势如参逆流。况予顽钝质，翔泳寻常沟。斗水苟不资，败腐将谁收。吾闻达人语，生若风中沤。一朝忽浸浸，衮衮不可扠。中有不灭者，炳爚



箕奎姿。勛哉罔或辍，逐好相与勦。君生后一日，风雨摇归舟。主人为荐酒，倾杯写绸缪。祝君千万年，如此诗所酬。”（《文莫室诗集·信都集》）王树楠将自己与范伯子比喻成双游的鱼，并谦虚地说自己“我当君之年，细于蛤与蚌”，而赞扬范伯子“君已变瑰怪，捷猎翔龙虬”，由此可见王对范的倾倒。

范伯子与王树楠分别时也写有《余与晋卿往来数月，既尽读其诗歌、骈文、墨子之属，最后又得读其古文，益服其无所不能，携至保定视吾师，吾师叹嗟焉，七月，余将南还，晋卿别以诗，和之，得卅四韵》，诗写得情深意重，而诗的风格，则极像韩愈。

范伯子乘海船南下，在天津等船时，有日本人武藤百智慕名向范伯子请教诗艺。范伯子写了《日本武藤百智以诗问余于天津，余为言其国人冈千仞，使往见之，乞一言为先，遂赠二诗》：

郁郁龙堂接蜃楼，当时货殖比诸侯。如何马足风尘际，尚有虫吟草木秋。眉眼知为同命惜，文章须使盛年愁。篋中他日诗千首，过我江南扶海洲。

昔闻海上冈千仞，邈若神山不可望。谁识英英大邦杰，担簦来上我师堂。超闻合是卢行者，朴学犹为卜子商。念尔师资能近取，千秋名业定无疆。

第一首赞扬并祝贺武藤百智将来成为著名诗人，带上千首诗来我中华。第二首赞扬冈千仞像是南宗禅的创始人慧能（卢行者）与儒家长于文学的子夏（卜子商），希望武藤百智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冈千仞，字振衣，日本宫城人，光绪十年（1884）来游中国，曾到上海龙门书院向刘熙载请教过，故有“担簦来上我师堂”句。他著有《观光纪游》十卷。

十一月，范伯子再到冀州，武邑令郑骧正式聘请他担任观津书院山长。

范伯子《重修观津书院增建试院记》：“光绪十一年夏，署武邑县金溪郑君来见，吾亦与之饮。退而吴君谓我是有意教其人者，而惜乎不能久于斯也。及秋，吾还江南。冬，又来，则郑君已有钱六百万修复观津书院，聘吾为师，而大府亦以是留君。”

光绪十二年（1886），范伯子三十三岁，春季，到武邑观津书院就职。

四月州试，得南宫李刚己。范伯子与吴汝纶都对他十分欣赏，认为是奇才，并立即告知张裕钊。张裕钊回给吴汝纶的信中说云：“尊处州者乃得圣童，闻之喜忭无已。我公龙虎精神之所感召，固宜有是。”后来，李刚己果然成才，成为范伯子最杰出的学生。

赵衡《李刚己墓志铭》：“刚己年十几，以童子升应州试，时桐城吴先生为州，先后招延通州范肯堂先生客署中，武强贺松坡先生都讲信都书院，三先生同在试院，得刚己文，愕起环诵，大奇之，曰：‘此天才，吾辈所畏也。’拔置第一。”又说：“既补弟子员，因从三先生更学。三先生皆绝重刚己，撰语慰藉，方拟古贤，侪夷瞠后。”

姚永概《李刚己墓志铭》也写道：“年十三，应冀州试。州牧为吴先生汝纶，而贺先生涛长书院，范先生当世在幕中，方倡文学教士，得君文大惊曰：‘此天才也！’录冠其曹，召居署，从范先生游。”

《李刚己先生遗集》卷一有《冀州宅中用通州先生赠别桐城先生韵兼呈两先生》（作于丙戌）诗，诗后有范伯子评语说：

“此作惊人乃又当数倍于昨日之文。此子得道之猛，虽六祖之一夕顿悟，何以过之？而令我抚中自问平生所受师门笃训千言万语强半遗忘，可为痛心！我何足以范此子哉？摯甫先生非上智不传，而过意于我，尚非其人，愿以平生所得于文正公者壹付诸此子，而益非我之所敢忝然并居者也。”吴汝纶评语说：



“相此儿所诣，便以突过老夫，那得不诧为奇实。故知殊尤瑰玮之才率由超悟，不藉声闻证禅也。近日强留肯堂，自愧老荒不能相与上下追逐。得此儿相从问学，不负范公此行矣。”

范伯子又引用《论语·公冶长》中“子曰：‘吾未见刚者’”之意，为这个学生取字为“刚己”。范伯子在《刚己字辞》中说：“呜呼，刚己！吾取吾夫子难其人者而名汝字汝。”

七月初九立秋日，李刚己有诗作《立秋呈范先生》（丙戌作），诗云：“仰陪夫子下阶吟，呜咽鸣蝉向我喑。半月假城动凉色，一风入木作秋音。星云高灿还相媚，雾雨横凄忽见侵。应有列仙在空阔，徘徊不下暝烟深。”范伯子评曰：

“置之姚氏《今体诗钞》中，亦殊尤之作，真可喜也。”

十月，由冀州南归。

光绪十三年（1887），范伯子三十四岁。四月，范伯子第三次到冀州，主持武邑观津书院。此时书院增修完毕，先生有代县令郑襄武邑观津书院联云：

自来学校以书院辅之，如今比屋东西，稍有欢颜在风雨；

吾为父兄望子弟成耳，此合一官南北，还将老眼看云霄。

五月，又作《重修观津书院增建试院记》：

吾之来游冀州也，以州牧桐城吴君之招。吴君之为州，专务积产书院，以富其贤豪之人，而使之从容致力于学，益合其五县之子弟而大造之，五县令顾不自为也。光绪十一年夏，署武邑县金溪郑君来见，吾亦与之饮。退而吴君谓我是有意教其人者，而惜乎不能久于斯也。及秋，吾还江南，冬，又来，则郑君已有钱六百万修复观津书院，聘吾为师，而大

府亦以是留君，君益勤于兹事矣。去年春，吾来居院中，两月之后，诸生来试艺者益多，庭隅狎坐皆满，或至不容而露坐阶下。君益欲虚其旁舍廩高材如冀州，乃与吾行度院西地，谋建试院一区，遂增修书院。吾以谓财不贍者，即吾所居可以缓，君不欲也。秋九月，两工并兴，吾亦南归，四月重来，则门序东西垣墉赫然，堂室斋庑举非旧观。架阁之书，自群经诸史百家文辞总集都汇之编，罔不毕具。斯时郑君适考试学僮，扃锁西院，而高材肄业者先来见吾，吾笑谓之曰：“诸君学者亦法郑君矣。夫郑君乃要于其事之必成，而限以不久长之时，是以旁作不寐若此。诸君子之来学，亦不容不成矣。公家之养，官师之所具，父老之所勤苦，是乌可以泰然长居乎？天下之事，盖未有三年不成者。”其夕，郑君闻吾来，启两院中通之户相见。告以别后之所营，则自兴工买书积器所余尚有钱一千六百万，以是诸生膏火倍旧而三，乡试入都，并有赠送，又有岁修之资。因导观其所为试院，宽广可坐四百人，堂基有严，吏舍庖厨马廐有容。郑君益爱惜其所为，自以行当受代而去，就吾谋所以永长之者。吾笑曰：君之勤劳，其可谓至于斯极也已。天下之事，亦未有三十年而不败者，能保全于十年之间而成就数人焉，则幸矣。此人或不得为显仕，而犹能以其所学散被于其乡，俾一世之后，或承其流谈君之教泽，不得幸生当年，而君亦于是乎不朽矣。法者败之基，自古圣贤英人能建非常之功，不能立不敝之法，彼曷尝不思哉！彼其所以成事者，乃纯在乎其精神之间，一循于法，则不能有所为矣。功成立法以治众，乃其犹执乎盛衰之机，不听其与人俱息，而默持之使渐衰渐微。其法之尤善者，则至于衰微之后，而又可兴



焉。然此乃后贤之专美，而立法者不有其功也。凡吾与君与吴君之相遇于此，而蚤夜孳孳以求所谓作兴人才者，此独可以尽心为乐耳！究有裨于兹土者几何哉？惟君独后来而先去，而劳苦之意独君为多，余故备书其前后之迹，使来者得观焉。光绪十三年五月。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郑骧与范伯子多么重视人才的培育！十月，范伯子作《戏为舍人儿题〈百蟹图〉》：

冀州水浅鱼蟹稀，官庖索之民不祈。筐篮品类不能识，况可豪端争是非。舍人儿子善戏谑，要我文字生光辉。城郭书生亦不恶，图为百蟹能芳菲。惜哉未能刚以肥，螯边纸上无横威。不相蹂乱撑钩钏，蒲根荇脚犹可睇，细角纤毛不可讥。安知古人笔画众，纷纷藉藉穷单微。江南十月水涛厉，百介翻腾杀刚气。此物乘潮战网罗？飞鱼悍鳖欢相沸。有众魂魄体如车轮，亦有长身泛如觳。阴山寒洞秋沉沉，有伏如龟足如跬。嗟吾对蟹思横飞，但见霜露新澄澄。安得古之善画者，与君构此玄黄机。

范伯子在《稟父翁书》中解释作此诗的用意说：“男《百蟹诗》乃叹息人才之少，而目中所见阳刚之文不能多也，并无他意。”由此可见，培养人才问题始终是范伯子心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范伯子在《稟父翁书》中又谈到流言蜚语中伤他、挑拨他与吴汝纶关系的问题：“男在此与摯翁原是极乐，即明年贺同门来此，亦不得同于世俗之欢。惟本地无端之小人与从前在此之王公（指王树楠），不知以何故得罪于彼，飞谋钓谤，嘖有烦言。即此诗，亦有毁男于摯翁者，以为男之藐视摯翁。”

正好范钟从湖北有信来，劝范伯子要利方合众，范伯子

在《书与仲弟，以答来悵而言近事拉杂不休，遂得六十韵》中写道：

吾弟书由鄂中递，吾正思之一挥涕。感激平生未见人，肯为人兄养其弟。纸上斑斑吾弟痕，今吾拭之字如洗。弟谓李公彻骨贤，能教宾客病去体。室庐庖具多私恩，群子英英并高契。昔我修书在府旁，已闻说公似嘉醴。筋骨放散讎衣冠，未将此身著庭际。早知吾弟公能怜，百拜输公岂违礼。吾宗历世多贱贫，文组英华若深闭。十亩凋零作墓田，百年惨澹无生计。父祖唇焦不具餐，母妻手裂难供祭。岂谓轻将骨肉抛，遂有金银发沉殍。昔日秦家散客归，如纵虎黑入林噬。方今帝业万倍秦，亦有诸夷并称帝。岂不悬金争买才，嗟我与君非代厉。假使盘旋江海交，徒对洪流自饥毙。嗟尔后生才两年，僮游那知问其世。九世高文没草莱，辉辉饿节天闻誓。病树枝縲半死生，根馨上热还知岁。昔我曾王父幼孤，高妣曹君淑以慧。弟兄适戴为高门，赠之衣裘弗加币。亦有短衣持与孤，教儿慎言母手制。高妣令孤往谢姨，便著此衣拜姨惠。谓我茕茕寡妇身，他人寸缕焉能系。此时北风吹敝帋，薄炊米汁看儿啜。夜雪沉沉火不明，孤儿读书不可锐。高妣欣然发旧琴，吾今一奏儿寒霁。他日吾儿不悔穷，乃肯教兄学此艺。嗟尔何曾在祖旁，听闻旧德馨于桂。宗罗陶翟三世誉，各诵所生不能继。何况区区我与君，叩心扣夜将何媿。中人一家养一身，起坐眠兴叱奴隶。良恐他时人俭难，家人四十方如赘。此自皇天育物慈，故令贤宰相维系。闾巷迂儒不可量，焉能遍有私恩逮。勉尔怀忠府主前，嗇尔车裘致甘



脆。莫更身登黄鹤楼，哀吟汉江叹濡滞。轼辙当时怨谪居，或耻临江监酒税。柳州潮州并专城，视为戮辱相哀悵。人生愿欲真无穷，彼自为官犹侘傺。蛟龙掉尾捐大湖，鹏抴沧溟怒且悸。偃鼠恹恹伺在旁，偷沾余沥欢然逝。稟命分才各自知，吁嗟尔我真微细。尔听人言为我愁，教我利方却睥睨。此语流传亦有因，翻翻转变斯成讐。南方谓我三礼精，北方传我狎清丽。我取两言微讼之，北语何伤南语戾。离家去井谋稻粱，恨已虚华促根柢。更若违亲长盗声，茫茫江水吾何济。摯父为人尔自知，平生峣峣不可说。尔我事贤宜战兢，未来得失休猜谜。吾恨初心不自持，含愁更作他人壻。夫子怜我非登徒，强为导言索珍髭。一昔邨中得父书，秋门五月新丧俚。此子完完特过兄，周流相览谁当妻。乃知一妇关一家，莫更青天著阴翳。二人衰病逾冬春，炎日车船更未憩。吾限重洋不得归，涕零南望嗟谁替。冀尔身强不畏涛，秋风一鼓东归柁。

当时范钟任武昌知府李有棻西席，范伯子为弟弟能宾主相得到高兴，并蔑视用流言蜚语中伤自己的小人，认为吴汝纶为人刚强正直，别人的挑拨是无用的。希望兄弟俩各以真诚恳摯的态度对待贤者。“摯父为人尔自知，平生峣峣不可说。尔我事贤宜战兢，未来得失休猜谜。”几句乃是这封信中的脊梁句。

吴汝纶因流言不能任范伯子为山长，不得已乃力邀贺涛自大名至冀州，任信都书院山长。范伯子从这时开始与贺涛交往。贺涛《送范肯堂序》：“涛始学文于桐城吴先生，及武昌张先生北来，复命往受法。时吴先生为冀州，而张先生弟子通州范君肯堂以聘来，涛亦自大名教谕调守冀学，因主

其书院讲席，始与范君交。”贺涛（1849—1912），字松坡，河北武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大名教谕、冀州学正，主讲信都书院十八年。著有《贺先生文集》。贺涛先后拜吴汝纶、张裕钊为师，与范伯子为同学，后来又一起在冀州三年，交往密切。范伯子以诗出名，贺涛以文著称，当时有“南范北贺”之称。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自序》：“先大夫垂教北方三十余年，文章之传则武强贺先生，诗则通州范先生。二先生皆从先公最久，备闻道要，究极精微，当时有‘南范北贺’之目。”

光绪十四年，范伯子三十五岁，仍在冀州。

在冀州时，范伯子与吴汝纶、姚为霖（锡九）、张采南等经常唱和，极为相得。

姚锡九，名为霖，号漪园，桐城人。吴汝纶在天津时，姚锡九当过其幕客，是姚浚昌的兄弟辈，所以范伯子称他为姻丈。后来，范伯子旅居天津时，姚锡九任青县令，又往来唱和。

六月底，准备南归，冀州嘉客很多，范伯子跟他们“早夜为诗酒之欢”。范伯子有追和故友李佛笙的诗，一时唱和者很多。吴汝纶说：“范君大作，弟侄皆有和章，老夫亦不能再嘿。”并在和诗中高度称赞范伯子的诗艺。

七月，范伯子南归赴乡试。贺涛《送范肯堂序》：“七月初吉，君将南旋，次其道所由，自津沽浮海，南至沪，又并海而北绝江而抵通。既拜具亲、应试于金陵，迎妇于江右，闻张先生且南归，则又溯江而上谒师于武昌，不半载走江海万里。”这次南归，本想去江西迎娶姚夫人后，第二年春天便回冀州，却未料到，这一去竟然不能再回冀州了。

范伯子在冀州三载，培养、造就了许多英才，是他人生中一段辉煌的经历。其中李刚己是最出类拔萃的。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二日，顺天乡试揭榜，范伯子在冀州的两位学生刘乃晟、张其文中举。



范伯子曾在家信中提到此事：“昨北榜发，冀州属下中两人，皆男学生：一刘乃晟（在此见过三弟，其所中不过男之残膏剩馥耳），最是男所提拔取十七岁孤童而教育之者；一张其文（文自聪明，不过读书欠耳），稍为泛概学生，后令之从吴镗看文章。然冀州连年中得极多，而衡水、新河至今未开科，今独中此两人，一县一个，男真可告无罪于冀州矣。”

言敦源《〈范伯子先生遗墨〉跋》：“桐城吴先生挚甫牧冀州，延新城王晋卿树楠掌书院，教先生主讲武邑，而武强贺松坡涛更以吴先生之学设教于乡。数君子者，声气相应，宏奖后进，一时学风蔚然为畿辅冠。”

马其昶《赵超甫先生墓表》：“惟冀州自吾乡吴至父先生莅官，一以振起文化造士为急，延礼通儒王君晋卿、贺君松坡、范君肯堂专教事，一时瑰异之材得所矩范，人人皆知利病流别，旁衍及他郡邑。而武昌张濂卿先生暨吴先生，又先后主莲池讲席，师友渊源，同流共贯，徒党蔚兴。于是北方之博与东南侔矣，其高才尤异十余人，衡（赵超甫名衡）此论洵为确恰。书院专为造就人才，非同虚设。但惜光绪末年，仅有冀州信都、保定莲池二处，未能及于他省，为可惜耳。然仅有二书院，教授得人，成绩之伟大已如此。若合他省尽能如此，则文治之盛，不特侔于东南，直驾唐宋之上矣。”

续娶名门才女 夫妇连袂唱和

光绪十四年（1888），范伯子三十五岁。十月，去江西安福续娶名门才女姚倚云。姚倚云是桐城文派创始人姚鼐的第五世侄孙女，不是第四世侄曾孙女^{〔注〕}。前一年三月，姚浚昌分发江西吉安府安福县知县（《清代官员档案全编》），这时姚倚云跟随父亲在安福县。

范伯子在前妻吴大桥去世后，决意不再续娶，到这时已有六年了。

早在光绪十二年春季，范伯子三十三岁到武邑观津书院就职时，吴汝纶就开始游说他续娶了。但范伯子没有接受。

关于范伯子续娶姚倚云这件事，有诗媒之说。

顾公毅《〈蕴素轩诗集〉序》：“蕴素先生之偶范伯子先生也，吴冀州为之媒。蕴素先生亦若以诗媒者。先生尝录所为诗由其兄姚仲实先生呈冀州，冀州亟赏之。时伯子先生失偶已数年，意不更娶，而冀州毅然为介，伯子先生已既于冀州得诗读之，议始定……此义宁陈师曾衡恪语……秋初，起居先生，正曝书于庭，检一小册示公毅，上署《蕴素轩少时诗稿》。稿蝇头小楷，谛视之，先生之手笔也，而评者为吴冀州。就所识年月考之，则已越四十年，墨迹如新，粲然夺目。



因忆师曾所谓诗媒者以询，先生默应焉。”

徐昂《〈蕴素轩诗集〉序》：“范蕴素先生为先师无错夫子继室，其婚也，以诗为之介，春风帘幕，秋霜庭院，苦语唱酬，联绵稠叠。”又徐昂《范姚太夫人家传》：“先生……前夫人吴没，先生矢志不续室。挚甫既知太夫人贤，而又多先生之才，乃以诗介，力主婚议。先生得父命成婚于慕庭安福任所。”

曹文麟《范姚太夫人七十寿言》：“（先生）三十而丧偶，弗复娶，而吴冀州重蕴素先生之行与学，以诗册为介。蕴素先生者，今吾吴数千方里所传称兴学育才之范姚夫人也。太夫人承父兄之教，而诗册评点之墨至今淋漓，其惊异冀州实甚，则固亦豪杰之士，肯堂先生之次韵有曰‘悲歌对子不能才’，言其实尔。”

实事求是地说，范伯子的再婚，是他的老师吴汝纶极力促成的，其前后经过吴汝纶在《题范肯堂大桥遗照》中有详细记载：“异时范君当世既丧其前夫人，哀思之不聊，则命工图其父母所家曰大桥者，以寄其思，且誓不更娶。汝纶谋所以散其哀而败其誓也，见是图则深非之。又为书告濂亭翁，翁复书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吾助子破之。’已而，范君以其私白翁，翁竟止不言，而更为君题字图上。君归，矜语汝纶，殊自得也。当是时，吾县姚慕庭先生方邮寄其女公子所为诗示余，且属选婿。余曰：‘莫宜范君者。’于是以书径抵范君之尊甫平章婚事，词若劫持之以必从者。然复书果诺许余，然后喜吾谋之卒遂而笑濂亭之不足与计事也。范君既别余去赘姚氏，早暮与姚夫人为诗更唱迭和，闺闼间自为诗友。于是又命工图其生平所历事为《去影图》。与姚夫人淋漓题咏其上。”

实际上，吴汝纶为这桩婚事确实费过无数唇舌。光绪十二年（1886），吴汝纶在《答张濂卿书》中说：“肯堂不再

娶，若私有禁令，严不可破。得惠书，与共读之，乃曰吾师易与耳。吾言稍切，则谬曰得延卿为媒乃可。不知肯堂再娶，干延卿何事？而其私意，乃若与延卿有成言不可负背者。公为我问讯延卿，且诘究之，事之济否，在延卿一言耳。又闻肯堂尊人令延卿作书与阿郎，劝令更娶，延卿书乃阳劝而阴讽之，亦不解何谓也。近时肯堂归觐，退无以自娱，但致厚于故妻之党，母夫人调之曰：‘自大娘故后，外戚群从皆赐爵一级也。’其梗概如此。而肯堂方始兢兢以为得计，且其意尤忽我公，此愈可詫者。来书谓它日相与力破此惑，不患不听从，恐亦徒为大言耳。”

又同年七月十一日《答姚仲实》书云：“见委择婚一事，不佞知交殊少，惟通州范肯堂文学优长，前曾略为言及。渠坚持不续娶之说，兹拟作书问其尊人，且说明府廷家世及贵女弟才德，看其如何见复。尊大人来书，俟范氏有复音后再行裁答。”

又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廿九日《答张濂卿》书云：“范肯堂已为媒说姚慕庭之女，范府亦允诺矣，执事能不佩服我乎？”

又同年七月廿六日《与姚慕庭》书云：“所论范宅姻事，前因执事及仲实屡有书见托，并言不嫌远省，但计人才，故敢为之导言。今范公来书，虽立言婉转，要已允诺，其所以委曲之者，实缘肯堂故剑情多，誓不更娶。前时范公屡令更娶，并托肯堂深友从旁讽喻，肯堂坚持初见，自为前夫人墓文，仍以不更娶为词，其父不能夺也。某欲成此举，日夜说之万端，又挟张濂卿同说之，亦不能夺。及去冬肯堂南归，弟适奉到手教，念无以报命，因冒昧通书于肯堂尊甫，颇挟纵横之策，逞游说之能。范封翁踌躇数月，乃复书见允。今若忽然中变，某不佞诚无言以复范公。范叟盖一老儒，曾在福建抚院幕中。其父子兄弟间慈孝之谊迭见于诗文中……其先世



自明以来多达人，范文正之后裔也。其家清贫，然肯堂及其仲弟皆以文学知名公卿，其季弟文笔亦雅健，范公来书乃其季弟手笔也。其兄弟竞爽如此，殆非久贫者。目前虽窘，亦未必仰给前姻家。阁下见范公之信，种种致疑，窃谓上有公姑，下有前子，亦续弦之常事，且安得无公姑之家而与之议婚哉？范氏本无议婚之心，而某因执事淳属，驰书劝之，既有诺矣，而尊处又若不甚见信，使某无词以谢范，殊觉为难。执事及仲实前书专以此事见委，肯堂所知也，今若改议，亦苦难于置词。鄙意见婚专以择婿为主，其他皆在所轻，执事初见最是。若左顾右盼，长虑却步，则必至淑女愆期，交臂而失佳士。今海内文笔如范肯堂者，某实罕见其对，恃执事前书相委之专为之作合，自谓不负诤诤。执事阅人多矣，知人材之难得，尚望采纳鄙言，旁人忌才嫉能，或多诽议，不足听也。某前与薛宅议婚，系独断于己，其后传言亲家夫人至为严刻，亦引为私忧。及小女嫁后，其姑怜之乃过于己女，以此见传言之多妄，薛宅即其明征。今范氏昆弟文采奕奕，其老翁亦隐德君子，其可议者但坐一贫字耳。贫非士君子所忧也，必不得已则范公书中所云拜认前亲以存旧谊者，乃世俗之常例，贤者不必循之，此尚可从中缓颊，其他则实有某所难中变者，敬求亮鉴。仲实笔记因闻其秋间当来，故未即拜读；女公子大作亦未阅定，他人未令见也，后当续寄。本日有人赴天津，附便奉复，不及寄文卷矣。与执事交谊，不后于范氏。范公肯采鄙言，料尊宅不致待我不如范也。”

姚永朴《〈蕴素轩诗稿〉序》：“吴挚甫尝见妹诗于戚姻家，为之惊喜。会通州范当世丧其室，乃自冀州遗先考书曰：‘肯堂诗笔海内罕与俪者，君为贤女择对，宜莫如斯人。’先考以道远难之，吴先生一岁中申言至七八，妹由是字范氏。其后先考重莅故任，肯堂来就婚，夫妇相得甚，闺中唱和如鼓琴瑟。”

范伯子《书〈贻炜集〉后》写道：“往余悼其先室吴孺人，至无可奈何，而图其所生长之区曰‘大桥遗照’，为之诗若序，征题于人，人无应者，徒亦大义相绳，谓不可不更娶。而吾师张濂亭先生入吾说，独谓‘宜听所守’，欣然为之题其端，吾持以傲夫言当娶者。而吾挚父乃悍然必欲为之谋，且深讥濂亭。一旦为书劫吾父，而吾遂不得已变其六年所守，再娶于姚。”似乎范伯子续婚是完全迫于父命与师命，实际上爱才如命的范伯子怎能不为姚倚云杰出的诗才和深厚的家学渊源所动心呢？

去安福时，范伯子经过屏风山、南康城、南昌、庐陵，都写有诗。在庐陵途中，以点校王安石诗作为消遣。在南康城下，被大风所阻，不能行舟达六七日之久，写有《南康城下作》：

雪里乘舟出江渚，维舟忽被南风阻。日日登高望北风，北风夜至狂无主。似挟全湖扑我舟，更吹山石当空舞。微命区区在布衾，浮漂覆压皆由汝。连宵达昼无人声，卧中已失南康城。眯眼惊窥断缆处，惟余废塔犹峥嵘。老仆颠隤强为饭，慰我风微得远行。嗟尔何曾当大险，一风十日天无情。吾有光明十捆烛，瓮有残醪钵有肉。新硯能容一斗墨，兔毫蛮纸堆盈麓。为吾遍塞窗中明，早晚澄清煮糜粥。吾欲偷闲疾著书，谁能更待山中屋。

写大风景象十分生动，而诗人忐忑不安的心境也写得十分真切。

范伯子在去安福途中《入滩河易舟闻舟，人言往月安福使人迎探状，慚恐弥甚，心神益焦，辄复为诗十九韵》中写道：

顺康元老家，乾嘉大儒系。道咸名公孙，同光诗人子。蔼蔼敦诗媛，持以配当世。当时却不言，咄哉吴刺史。持我烟雾中，德我亦已诡。令今尚在途，吾独



望公耳。金陵逢诸昆，玉树得相倚。依依订后期，期在月建子。岂知岁寒累，隔月不能指。纷如败叶多，扫去复填委。江流入大湖，湖穷见滩水。一月四易舟，偃蹇莫能驶。已闻安福君，迎探日有使。人生重然诺，大诺矧可尔。感此宵寐淹，对烛弥惭已。韩公诗万篇，翱也数十纸。培螭附泰山，不尔将安恃。伐肝取新作，急索勿令徙。持为到门献，薄咎庶能理。

从中可看出范伯子对桐城姚氏的仰慕之情。而到了安福，还未过门的姚倚云竟写了一首长达三十多韵的诗给范伯子，表示婚后要去南通侍奉他父亲。范伯子很激动，写了《成婚有日，内子为诗三十韵，以道其相与为善之意与其迫欲侍舅姑之忱，余亦作三十韵答之》：

吾昔山中年，恐惧畏人识。一诗落人间，遂为吴公得。苦作珍奇收，过求美珠匹。辗转归丈人，逃藏更无术。文人气渊渊，诸郎势英特。或战或养之，吾意固低抑。谁令吾子来，咄咄更相逼。房有刃剑光，人我常懔懔。虽然惮尔才，岂不恋尔德。惜此兰蕙芳，不得在亲侧。吾亲天下慈，作妇百无值。身御必萧条，好妇美衣食。独耻家庭间，一体画数域。曩人非有奇，览此将身克。遂得亲堂欢，死去立为则。吾宁誓独深，滋恐后来忒。苟合岂不危，吾忍将卿失。丈夫贞则凶，物理静而吉。极冬放春回，冥灵始能茁。欢言告吾亲，不复惭其笔。子有怀归忱，能使我心恻。两尽无公私，在处必爱日。吾亲日中昃，子日在西北。不得事尊章，宜尽祖孙职。古人君父间，随分盖无愿。子有翱翔诗，我无奋飞翼。明星烂在天，鳬雁不可弋。与子今偕潜，静言抚琴瑟。琴瑟鸣悒悒，寒水流汨汨。服芬亦为君，与子花间逸。

“虽然憚尔才，岂不恋尔德。”这关键的两句写出了范伯子当时面对着这位德才兼备的女子，心情何等激动，他已经十分具体地感受到了婚后甜美幸福的生活了：“与子今偕潜，静言抚琴瑟。琴瑟鸣悒悒，寒水流汨汨。服芬亦为君，与子花间逸。”

新婚以后，姚倚云又写了《呈夫子》诗，从诗中可以看出，姚倚云对自己的婚姻极为满意，她找到了理想的、志同道合的另一半，设想将来能与丈夫一起安贫乐道，徜徉林泉，连袂吟唱，这是何等惬意的人生！

以后，的确是琴瑟谐和，频频联唱。

光绪十四年（1888），朱铭盘入旅顺张光前（仲明）军幕，写有《题肯堂照像寄肯堂诗》，抒写自己与范伯子的深厚情谊。

光绪十五年，范伯子三十六岁。

二月初五，姚浚昌生日，范伯子因辅助姚浚昌监考阅卷，姚倚云将酒菜送至试院中，范伯子便在试院中即席献诗祝寿，有很多朋友一起唱和，后形成《三釜斋唱酬小集》一卷。

姚永朴《蛻私轩集》卷五《斗影图记》：“通州范肯堂是冬就婚安福，肯堂才气锐发，老宿莫敢当其锋。既至，献五言古诗一篇，媵以旧作。府君览之大喜，自是吟咏无虚日。又明年，修莲社故事，所谓《三釜斋唱酬小集》是也。”

范伯子写有《就试院觞外舅生日，即席献诗，再次前韵》诗。后来，姚倚云也有和作，范伯子极为佩服，自愧弗如，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此人诗才极优。此韵作者且六人，人各二三首，未有能及之者。虽哥哥诗名为别派，其间亦岂能过之耶？”

三月，范伯子生病。姚倚云写诗安慰他，范伯子有《戏答蕴素见慰诗次其韵》：



醵夷腹大枉如壶，藏水盈怀滴酒无。久病焉知药良否，怀人经见草荣枯。春蚕漠漠初为茧，宵露浓浓渐有珠。早晚庭堂与歌笑，平生志事未全输。

尽管生病，因有爱妻在旁歌笑，仍然很乐观，感到“平生志事未全输”。

姚倚云有《次夫子韵》《再次韵》：

好鸟花间唤倒壶，绮窗清兴未能无。名山扫黛迎朝旭，沧海澄波隐夜珠。倦眼乍开疑是醉，回肠搜索岂为枯。怜君乡思听疏雨，拨闷哦诗兴不输。

风花尽入九华壶，近日春深景欲无。遥对山城歌慷慨，闲看草木惜荣枯。一宵蟾吐云如绮，十日鹃啼雨似珠。却病勉为灯下课，愿将绵力为君输。

姚倚云殷勤地侍候丈夫，“愿将绵力为君输”，而她除侍候药物食品外，主要是精神疗法：“拨闷哦诗兴不输。”

五月，范伯子病情加重。六月初，病剧，“十五年夏，吾大病而归，喑不能言，手不能作一字”（《顾师母王太恭人八十寿序》）。连医生都毫无办法，已停止用药，范伯子怀着狐死首丘的想法凄然孤身回归故乡。大概由于范伯子极力劝阻，姚倚云未能陪侍丈夫一起回通州。

姚倚云在临别时有《送别夫子》诗：“束装归路悦庭闱，独愧私恩妇识违……银河挂户星斜度，高柳当窗萤暗飞。”心境凄然。范伯子回通州后，她又写有《六月十五夜寄怀夫子》诗：“清辉万里抱城郭，白云缥缈天际薄。遐思迢迢欲飞翻，青灯焰焰慰寂寞。流萤低飞光入帟，蟋蟀凄鸣声绕阁。微风细浪漾池苹，冷露无声藕花落。空庭俯仰独萧条，忆君孤帆何处泊？”思念夫君的恳挚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七月，范伯子到家，养病于东邻天宁寺。《题〈去影图〉

塔院养病》小序中写道：“吾去年病甚矣，坐此间五六月，殆如泥木人，所患苦者，虽弟及吾儿不知也。然至困而暂解，则此时便最欢。是以从宵达晨，自午至暮，亦时时有至乐存焉。盖昔人云‘病中增道力，危处见天心’，诚有味乎其言之也。”

范伯子养病期间，金弼来拜他为师。全弼，字蘅意，江苏泰兴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当过江西湖口知县。著有《江山小阁集》。金弼《范肯堂先生事略》：“弼少诣州，应学院岁试，时先生养病天宁寺之塔院，命弟秋门来召，与语曰：‘孺子可教也。’由是执弟子礼。”

光绪十六年，范伯子三十七岁。春天，病还没好，精神太差，要想思考问题时，常神思恍惚，耳目眩晕，需步行至郊外努力排遣才能好些。范伯子自己说：“吾病不生于淫佚而困于读书，故其所以克治者亦异。春来自盘旋近郊，以及归而与朋侪相乐。”“病后不能遐思，诗文都废，间取《五史记事本末》观之，取其端委具在，不烦思前想后，而究亦觉其疲劳不堪，是以……颇复与于酒食征逐燕乐之游如十二年前病后之所为，以取释心气而平肝火。”（《范伯子文集》附《家书一》）由此可见，范伯子的病主要是读书写作太劳累而造成的。

这年春天，姚倚云写有《春日漫题有怀夫子，信笔书来，聊以拨闷》诗八首：

二月东风展物华，莺莺燕燕又烟花。春庭日午蜂声暖，帘卷炉香透碧纱。

曲栏杆下独徘徊，种得芳兰次第开。花鸟宜人无限意，十分春色待君来。

幽闺子夜怯春寒，遣兴挥毫强自宽。最是可怜天际月，不知此夕共谁看。

官斋镇日忆高堂，椿寿萱荣春兴长。怅望空惭



千里意，天涯遥祝海山康。

玉兰初放夜香寒，杏蕊将残长嫩蚕。万斛寒光
同此夕，心随明月到江南。

带雨山容秀绕城，闲愁触处总关情。空庭一片
婵娟月，凉透帘栊入梦清。

别来况味念相如，一种心情未忍书。春自无心
恋兰芷，芳香空绕绿庭除。

安得身如比翼禽，一为锦字问消沉。谁怜苏蕙
回文意，迢递空劳万里心。

情思之缠绵、真挚、深切，令人叹为观止！

四月，姚倚云有《安成孟夏寄怀夫子》诗三首。第二首
写道：“独坐芸窗未展颜，最怜消息阻江关。魂乘野鹤归千
里，思逐飞鹏越万山。蕉叶乍舒心仍卷，荷花初放气能娴。
悠悠别恨将经岁，又见官斋孟夏兰。”后半篇托物抒怀，手法
多么高超！

六月，张之洞邀请范伯子入幕，范伯子不愿接受张之洞
的邀请而专等北方吴汝纶的消息。范伯子在给姚倚云的信
中说：“前日仲弟来书，复理张香涛（按：即张之洞）罗致之
说，言苟非香翁于大哥确有饥渴之意，则弟亦岂有谗大哥轻
见大人？……而预期之香涛馆地，吾故十二分不就，盖徒然
劳顿，未足免穷，并非高傲。而此外亦不复别图，惟静待至
翁（按：指吴汝纶）之所以处我。”（《范伯子文集》附《家书
一》）

九月，范伯子拖着病体，强打起精神，去江西安福，想
迎接姚倚云回南通侍候父亲。《强病》诗写道：

强病支离出郭门，揽衣愁叹数烟村。不知眼底
家山好，且喜胸中老酒温。月被风霾微有晕，天连
水色更无痕。乘潮即去吾何奈，回望亲庭欲断魂。

在途中，范伯子写有《行过南昌，念且与内子相见，彼其怀我也，积诗成卷，吾岂可遂无一言，而茫茫昔意又何从阑取以为辞，乃借欧阳公赠其夫人“班班林间鸠”四十四韵谱而成之，呜呼，吴冀州之为吾两人作合也，则引欧公薛夫人之文辞相悦，白首相宾，以速吾之就，故吾亦得而效其诗也，而吾命穷矣》：

我之弗思子，以昨病艰日。孤篷野水间，生势飘忽。一哭皆弃捐，空躯使之没。方知平生心，犹是血气物。陷落肝脾间，孤提不能出。何但夫妻哉，一一皆已毕。当溃弗复攻，生机转来弼。俄延复至家，扶携跪亲膝。问故暗难陈，思危内自慄。弃捐谓之何，大罪不容劾。仰观亲傍徨，俯益自宽恤。庭堂弗可居，邻庙假一室。喘汗秋阳天，何由得萧瑟。畏见衰颜亲，只可弟兄侄。儿动则麾之，况也所深嫉。隔厅无履声，邻语变啾唧。尝修一日禅，图博半宵逸。欹枕云雷兴，合眼风涛颭。十宵成一寐，有梦在虚实。何堪当此时，见尔悲相失。无因而至前，此事真咄咄。严拒弗思之，怀藏亦已密。心神才一交，惊魂自奔佚。吾欲铲根株，寤寐苦不一。寐即听其然，寤乃从吾吉。久之为石人，混沌还吾质。嗟吾非子讎，深恐累斯疾。譬若昨无身，焉得为子匹。插足轮回边，归来可自怵。亲善几不终，吾罪当斧钺。伤哉一年情，乌能为子述。去书十二三，已恐子心郁。大义均悲愁，两地嗟何必。今春得素书，苦语调新律。吾作他人看，叠诵转欢溢。秋间病再深，不愿观卿笔。书来闭篋中，编在某甲乙。十月冒霜征，辛苦若鞭扶。瞬息同闺闱，念子何秩秩。白发扰青丝，吾当为君帚。



君亦聊相娱，珍髭自加髯。暂倚君堂嬉，从容返蓬
莘。吾从衰病余，不复望簪绂。所嗟惟别离，那得
便穷乞。

诗中诉说他病情再次反复，以至连姚倚云的来信都懒得拆开。全诗充满生离死别之情，真是“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借用古诗《孔雀东南飞》中语）啊！

第二年，范伯子已在天津李鸿章幕府，姚倚云也写有次韵他的长诗《夫子去岁孟冬复来甥馆，以欧公四十韵作诗相赠，历陈病中艰苦，雄文健句，字字酸辛，倚云览之涕下，不能和也，开岁随夫子归谒舅姑，而夫子橐笔北游，以应李相之聘，秋杪吾又随伯兄归宁，舟中小暇，追述别后情辞，次其元韵，语质无华，不自知其美恶，聊寄津门，一破客中之闷，亦因以道舅姑隐衷云》。

十月，范伯子过九江，碰到熊香海、蔡燕生，熊香海将《论诗杂咏》送给他，范伯子也将近作诗文赠送，同游甘棠湖之烟水亭，“论诗颇洽，而语及时事，乃必不能谐”。熊香海有《喜晤范肯堂于君斋邸，赐读大著，奉题即以志别》诗：“珠斗横杓左澥深，中宵读罢更沉吟。眼中人自期千古，天下才犹滞一衿。丽正文章元馥郁，华严楼阁孰窥临。翰林早达交仍旧，相与迢迢证此心。”由此可见他对范伯子的敬仰之情。

到达安福后，范伯子写有《余再来安福，专务嬉戏，不甚读书，外舅行野寄诗归，命和，遂缀此篇》诗：

三更笑乐听风雨，镫有雄光屋无鼠？经年苦事
成欢语，奕奕朝晖在我东。茶花洁白人面红，南方
未腊先春风。我先抱病如衰翁，跟前嬉戏还如童。
蓝田射猎诚多事，何必为人不下中。

看来范伯子这次重来安福，重在休闲养病，专务嬉戏，再也不

敢苦读了。而心情则比较愉快，没有在途中那种戚戚之悲了。

姚倚云写有《夫子之来也，病将痊可，喜而赋此》：

霜华满院夜徐徐，别恨能消一载余。千里道途
新病后，万重辛苦到来初。锦屏共话知何夕，银烛含
辉复此庐。药物渐除餐饭进，从今眉黛向君舒。

姚浚昌也写有《喜范甥病愈来安福，用其道中见忆诗韵》，第二首道：“即今稳趁安居便，身手明年好斗强。”（《五瑞斋诗续钞》卷一）为女婿身体逐渐好起来、能作诗参与比赛而高兴。

从冬至这一天开始，范伯子让冯小白画《平生快事图》，先画了八幅，后来增加到十二幅，分别是：“黄泥山读书”、“狼山观海”、“龙门夜雨”、“泛舟秦淮”、“水心亭宴集”、“芜湖附舟”、“琴台夜饮”、“燕南并轡”、“冀州城楼”、“塔院养病”、“安成玩月”、“航海北渡”，总名《去影图》。“兴会既集，疾痛复来，不能更端长怀一气成咏，每以灯前小睡，薄有神思，掇拾数言而成半稿，或间数日乃为一篇。”（《范伯子诗集》卷六）姚倚云也说：“夫子以《去影图》消闷，自冬至至腊尽殆将五旬，余时时具茶果饷于冯君之画室。既成，又治酒饌以劳之，承命缀和章于图后。”（《蕴素轩诗集》卷四）

姚永楷《远心轩遗诗·题斗影图》附录《图记》说：“予来安成四年，以有幽忧之疾，事亲读书之暇，辄觅可嬉戏之事以陶吾情。无错今年来，亦以病新愈未能专力诗文，乃相与求所以娱目骋怀者。冯君筱白嗜画，无错乃倩作十余图，题曰《去影》，而命其诗曰《回风集》，亦颇征题于予。予喜其善戏近雅，大异于酒食征逐，和诗二章，因亦取平生所历境乞筱白作图，课日而成，而戏题曰《斗影》。无错曰：‘斗影图之诗则亦可命之为《横风集》也。’”



光绪十七年(1891),范伯子三十八岁。正月上旬,范伯子与姚倚云一起回南通。

元宵节那天,船靠庐陵,姚永楷一直送到这里,范伯子有《舟中元宵叠韵再赠》诗。

途经南昌,范伯子与姚倚云同登滕王阁,都有诗。范伯子此前曾三过阁下没能上,这次才了此心愿。范伯子有《守风不行,而船得泊岸,蒲仙去之安福,内人触动悲怀,余无以慰之,乃携之游滕王阁,各为长歌一篇以取欢》:

我惭不至滕王阁,子说曾登太白楼。闻言使我渺愁绝,何得当前懒即休?北风一夜送南客,北客稍稍泊岸头。我今为子毁前作,子得不与我同游。江山城郭非异物,且复登阁览一周。阁上金书作何语,人人秋水长天句。阁下诸公尽有闻,不脱珠帘画栋文。可怜韩退之,澹语不成用。分明作者才,弃置无人诵。询吾云君谓不然,勃虽三尺已占先。谁令退之更疏懒,言语诙诡足不前。空藉文字与人斗,虽设百彩乌能传?君诗莫须为我毁,君之故步真当捐。嗟哉尔言岂不贤,吾今从谏如转圜。但当与尔遍揽名迹题山川,往至太白楼下一醉沉千年。

此诗写得很风趣。范伯子说,由于自己疏懒,至今还没有登过滕王阁,却写过滕王阁诗。韩愈也没有登过滕王阁,却写有《新修滕王阁记》,显示了作者的才华,可惜没有人去读他的文章。而姚倚云却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韩愈“更疏懒,言语诙诡足不前。空藉文字与人斗,虽设百彩乌能传?”姚希望范不要毁去前诗,应当去懒登阁。范说我接受你的意见,从此以后,“但当与尔遍揽名迹题山川,往至太白楼下一醉沉千年”,结果陪姚一起登阁吟诗。

于是,姚倚云的《随夫子登滕王阁》写道:

我离膝下悲不释，况复阻风三四日。章江门外阁腾空，乃是滕王古遗迹。夫子慰我携登临，快览凭高爽心目。春云渺渺压檐低，杨柳依依当户绿。临高下视尘寰小，万里苍茫入怀抱。朱颜绿鬓不常好，文彩风流乃为宝。当年胜事安能讨？只今寥落余文藻。离愁涤尽消烦恼，从君共返家山道。回舟酌酒但高歌，试听长江声浩浩。

她登阁吟唱，一扫愁绪，酌酒高歌，听江流浩浩，“回舟酌酒但高歌，试听长江声浩浩”。这真是夫唱妇随的一段佳话啊！

范伯子夫妇回通时真是盛况空前。据范子愚《伯子诗文选注》云：“先继祖母抵通后，照例第一次拜访亲朋，乃一大典。寺街徐姓乃通之首富，因有亲戚关系，又彼家慕范、姚两姓之名，遂具请帖相邀，大会宾客。及期，该长巷居户，家家门外伫立男女，如迎神会。盖先继祖母能诗之名久为南通人所钦佩；而美丽之名，众亦欲一睹为荣。彩舆抵徐家门，鞭炮万声，更为热闹。众谓百年来无此盛也。”

回通以后，范伯子带着姚倚云游览家乡风景名胜，屡有吟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插秧时节，范伯子与姚倚云登狼山，作《与内子登狼山游宴，极乐，内子先有诗而余次其韵》：

“越从戊子作重九，十年不履兹山颠。春初与人观野烧，宾从杂遄如流川。此间岂容尔我迹，辗转期待秧分田。山空人静杂花发，攀登一览心欢然。”《山中一去知几年》诗前小序说：“是日也，内子先归，余留与山僧海月为连夕之谈。”

姚倚云有《从夫子游琅山归而戏为长句》：

跳珠日月摧华年，薄游南北常更迁。自秋归来近一载，心烦思拙家之缘。陌上落花已如雪，可怜辜负春风天。又值阴阴夏木长，誓探幽兴登层巅。一塔孤耸出云际，一江回合如长川。临高下视众物



小，极目片片惟沙田。照眼云光畅磨洗，顿脱烦嚣觉浩然。嗟我微生惜其影，造物由来那得全。与君百年慎莫负，有如池水投青钱。天地清淑本自在，要能领取殊凡仙。君才讯我石钟势，较若此山谁后先。名山钟秀各异态，自有奇气何愚贤。兴阑思倦各归去，望海楼中稍憩延。我留不可乘輿返，君留小住权谈禅。布谷声声啼不竭，田蛙阁阁鸣相连。乔林飞集群鸟噪，平芜渐没朱轮悬。遥看灯火满城郭，娥眉新月方娟娟。

眼前景，写来历历如画；心中情，抒来娓娓如诉。情景偕和，水乳难分；语秀韵美，百读不厌！

以后，夫妇二人，或异地相思，或当面唱和，几无虚日。因数量太多，兹不赘述。如读者感兴趣，可以翻阅《范伯子诗集》和《蕴素轩诗集》。但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范伯子临终前二人的唱和诗以及范伯子去世后姚倚云所作的悼亡诗。

姚倚云《夫子肺疾渐愈，私心稍适，偶作短章以博一粲》：

寒风透幕才知劲，乔木萧疏叶脱林。杲杲日光人病起，鬢鬢素发老来侵。危机世局空成愤，厚味诗书独恋心。健饭祝君常勿药，江湖挈我共长吟。

姚倚云希望范伯子病好起来，能吃饭，不服药，带着她一起旅游，一起吟诗。

范伯子《次韵内子见慰之作》：

九秋晴日飞蝴蝶，一夜微霜枫满林。吾病初无毫发损，君愁坐向鬓毛侵。形骸不隔当前意，气候难回万古心。与子同牢至今日，差强短晷有长吟。

诗后自注：“内子读吾《自诔》，不语者久之，故五句云然。”范伯子曾写有《自诔》诗，诗中写到他不信仙，不信佛，认为“霞外珠宫那可得，云中鹤驾无由传。十洲三岛尽虚妄，徒见下有深深泉”，又说“人为万物灵，何术能绵绵”。所以才有五、六两句。由此可见，范伯子是以唯物的态度面对死亡的，但作为妻子，读了这样的诗，怎能不五内俱焚呢？所以范伯子在诗的结尾用庆幸自己一生能夫妇联唱来安慰她。

范伯子去上海看病时写有《况儿以伯严叔节皆在沪，请速就医，夜出江，口占示内子》：

一病艰危岁再迁，尚能携手到江边。帆樯出没沧桑地，星斗迷离上下天。岂有神方通绝域，但教死友值生年。明朝涕笑申江浦，应使陈姚有俊篇。

他希望能好起来，他的亲家陈三立和舅子姚永概都会用好诗来祝贺的。而姚倚云则写有《侍夫子就医沪上，候轮旅舍，酬其见示原韵》：

久病深愁那有边，求瘝愿速虑时迁。风号旷野抟高树，鸡唱寒宵渐曙天。已去韶华悲旧日，觅来灵药可长年。江干旅舍聊相慰，漫擘云笺和短篇。

用写诗来安慰丈夫，真是既恳挚又浪漫啊！

而当范伯子去世后，姚倚云所写《悼亡》诗的内容就更加惨不忍睹了。

《悼亡二十首并序》（选前七首）：

萧瑟金风，百感难消。今日凄凉，玉露千端。怯忆向时，援笔书来，写我哀思无已。引杯浇恨，哭君硕学徒宏。中正琴声，只许年华。十五和平，诗教那堪。历劫三千，已矣斯人。文墨于兹，运绝伤哉！



弃我余生，难待精消。痛至于斯，万难自己。聊写哀词，以志余悲。

医学中西熟劣优？卫生无术愧推求。免毫莫写吾心恻，此恻绵绵到死休。

情协金兰太可怜，回思去影泪如泉。唱随十五年间事，今日何期化作烟。

行年四十虽云暮，顾影茕茕悔独存。惟有梅花知此恨，冷香和月伴黄昏。

风雪归招爱国魂，雪光惨照泪光深。最怜第一伤心事，辜负生平教育心。

琴瑟因缘文字师，永怀真感寸心知。米盐毕竟能妨学，朽木难雕悔已迟。

庭院凄清秋鹤飞，可能夜月有魂归。闺中枉卜他生愿，不道今生愿已违。

最怜素志未能偿，知道泉台隐恨长。危世病驱徒弃我，自嗟云鬓亦成霜。

第一首写中西医都无术能起死回生，造成诗人此恨绵绵，至死方休。第二首写诗人结婚十五年来，“情协金兰”，可现在一切都化为烟雾了！第三首写自己茕茕独存之哀无人知晓，只有梅花和月亮陪伴她度过一个个难挨的黄昏！第四首痛惜范伯子办教育的爱国理想还未彻底实现，便英年早逝！第五首谦逊地表示自己因柴米油盐等生活琐事，耽误了她好好向范学诗的机会，深感可惜。第六首写她本希望来生再为夫妇，没想到今生这么早就分手了！第七首说丈夫在阴间因素志未偿而引恨绵长，自己在阳间因丈夫过早弃己而去而双鬓成霜。组诗哀感动人之情扑面而来，令人不忍卒读！

直到晚年，姚倚云重读范伯子的诗稿，仍会哀痛不已。

《夜读先外子遗诗有感，示次孙增厚》诗中写道：

夜读遗篇百感来，文章识度惜君才。丈夫不遇
寻常了，埋没荒邱太可哀。

她对着孙子说，可惜了，你爷爷那么有才华，却早已埋没在荒丘了。此情此景，将何以堪！

[注]孙建《伯子先生年谱》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论证。

谨按：徐昂《范姚太夫人家传》云：“范姚夫人蕴素，字倚云，桐城姬传先生侄曾孙女。祖石甫莹，著《中复堂集》。父浚昌，字慕庭，隐邑中挂车山，自号挂车山农，有《玉瑞斋遗文》《叩瓿琐语》传世。”

徐文有二误。其一，姚夫人本名倚云，字蕴素。荫堂封翁与先生及姚夫人书信皆谓“当世、倚云并览”，又姚夫人既随伯子先生回通侍舅姑，有诗别父浚昌曰：“云不得已当从夫子北归”，由此可知夫人本名倚云也。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九十二即称作“倚云”。

其二，姚夫人乃姚姬传（鼐）第五世侄孙女，非侄曾孙女。据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及姚浚昌《姚石甫先生年谱》，可知桐城姚氏入清后，姚文然生世基，世基生孔瑛，孔瑛生范、淑。姚范即姜坞先生，伯子先生诗中所云主天津问津书院者；姚淑即姚鼐之父。姚范生斟元，斟元生驎，驎生莹，即石甫，是为姚夫人之祖；莹生浚昌，是为姚夫人之父。浚昌生有五男三女，长姚永楷（闲伯）、次姚永朴（仲实）、次姚永概（叔节）、次永棠、次永穆；长女倚洁嫁同邑马其昶，次女即倚云，三女嫁怀宁陈氏。（姚永朴《蛺私轩集》卷一《闻仲妹将至皖作诗寄之》：“吾女兄弟三，伯姊适马氏。夫婿为儒宗，更喜同闾里。季字怀宁陈，遣嫁尚有俟。远行惟仲妹，家在狼山趾。”又姚浚昌《聿余求定稿》卷十二有



《寄女洁儿概书后漫题》诗，当时其三女尚未出生，故洁当为长女之名也。）

今《南通市志·人物传·范当世》条亦云：“原配夫人早逝，继配姚蕴素，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侄曾孙女。”正属以讹传讹。最可怪者，先生长子范罕《蜗牛舍诗四集》卷四《回顾十一章》之八云：“江声护龙眠，下有高人址。姬传之曾孙，曰继吾母氏。长我才十龄，圣善足千秭。毁妆纾赤贫，仁惠冠乡里。”亦作曾孙，殊不可解。

执教李相之幕 宾主关系和谐

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末，范伯子至天津，入李鸿章幕，教他的第二个儿子李经迈。李经迈，字季皋，一字季高。初出仕当工部员外郎，光绪三十一年出使奥地利，第二年授光禄寺卿，两年后回国。历任江苏、河南、浙江按察使及民政部右侍郎等职。民国以后，隐居于上海。

前一年十二月，吴汝纶曾拍电报约范伯子来年去天津为李鸿章当家庭教师教子。范伯子很高兴。

四月十日，吴汝纶有信给范伯子，信上说：“前接傅相书，深以得名师为幸。旋接来示，敬悉宾主款恰。傅相英雄人，最善待士，世人往往谬议，正坐未见事耳。吾为执事作合，乃自揣文学不足以阐扬傅相之业，将以千秋公议付之雄笔记载，以正后来秽史，不区区为目前计也。”（《桐城吴先生尺牋》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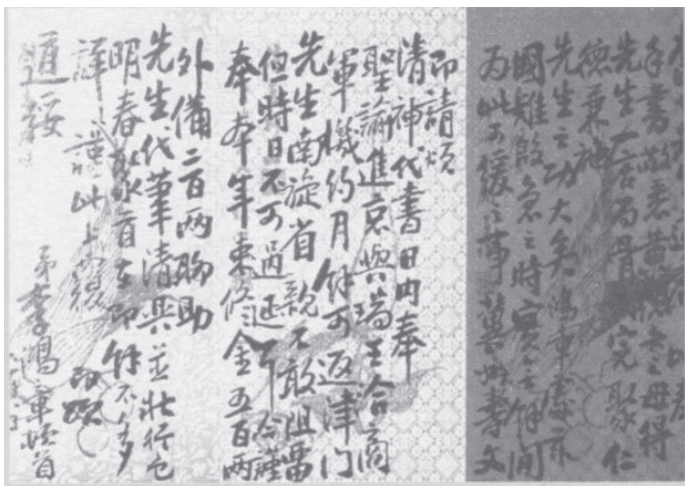
这时正是李鸿章深得恩宠、权势隆盛的时候，范伯子虽为家庭教师，实际上是幕僚上宾。

金弮《范肯堂先生事略》：“李文忠方为直隶总督，闻其名，介吴先生礼请宾之，授公子经迈季高学。然文忠日哺退食，恒过先生论政事，先生感其意，亦出己见，多所襄



助。”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范肯堂佐李文忠》载一轶事，可见先生当日之优游得意状。该书记载：“通州两名士，范肯堂其一也，德行文章，在人耳目。光绪初年，就李文忠公鸿章之聘。文忠尊师重道，朔望必衣冠候起居，每食，奉鱼翅一簋。范固甘菜根而薄膏粱者，却之，不获，文忠遂以干翅寄奉其二亲。时有以乡举劝者，范笑曰：‘谁不知我李公西席，中式何为！’故事，节幕得用居停舆马，文忠蒙赏紫缰，范尝假用之，访友于天津紫竹林。或告文忠，谓范乘紫缰舆作狭邪游，文忠曰：‘既用紫缰，不可缺拥卫。’立命戈什哈八员护之。”（孙建《伯子先生年谱》在此处有按语：“先生赴津在十七年，初年之说，显系误传。”）

范伯子在《禀父翁书》（十月十二日）中也说李鸿章对待他的态度：“若说此老待男之优，即现御寒之具亦花费数十金，穷侈极工，生平所创见也。其法出自西洋，署中唯中堂自用之，今为男布置如样，所谓‘无人知道外间寒’也……合肥并云：‘小儿不怕冷，单为先生病体耳！’”



李鴻章致范伯子書

这时范伯子如想做官，乃是唾手可得的，可是他却一心创作，视官场荣禄如粪土。

范伯子到天津后不久就生病，李鸿章请了西医给他看病，颇有疗效。他在写给岳父的信中说：“洋医之事，已屡稟大人，大人如许操心，岂有不遵之理？但婿自泄气病以后，又变为头晕，晕则目前深黑有万里之遥，独自惊恐，而告人则未有知者。与治西学者谈，方知为泄气太久，关键已松，脑气筋不能复固，因仍不治，恐必至于中风。婿为此惧，用其法，服其补脑药水，则曩时旬日一发者，今自四月至今未尝发过一次，殆将愈矣。曩时绝不能用心得细家书，屡作屡辍；今则一气十余纸，必殚必详。而前日遂为合肥代笔一篇，此尤两三年来绝无之事。明明有效无害，实难猝然改图，务请大人放心，不必牵挂。”（《上外舅书》）

这期间，范伯子曾写信告诉父亲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他父亲在回信中说：“知汝体气未痊，决志不秋试，吾深以为是。去年汝自九江稟我之讯，叹燕生频年奔走及去京窘状，想功名到手况味亦不过尔尔，不若得一盛馆为糊口计。虽此语不应出自少年人，然吾于前两科当李、王二公放差之时，可谓极大省之选。儿文虽劣，应不至出落，而竟不出房，嗣后决不作汝科第想也。况今病躯未痊，何堪吃此辛苦，留有用之身为将来计，保身全孝，吾甚欢喜。”

十月十二日，范伯子有《稟父翁书》。信中谈到李鸿章认为范伯子兄弟久考不中，是由于祖坟风水不好。范伯子驳斥说：“不然。谓老坟风水不佳，则寒家十余世举秀才，五六代有文集，亦复差强人意。通州境内，求此风水亦不多。且燕生之言曰天之爱福泽不敌其爱文章，此夸大文章之说也。愚见尤以为天之爱文章不敌其爱天伦之乐事，此亦燕生之所羡慕欣叹，至谓寒家为海内无双而属其撙节享之者也。由是观之，假令风水一改，而忽然使孝友风微、文章减色，但出



无数举人进士，而功业福泽之际并不能及中堂之毫厘，徒然闹饥荒，丧廉耻，其为一日二日惊愚炫俗之计则善矣，其奈百年何哉？故家大人平生绝不望儿辈以此事跨越祖宗，而但望其弗斫丧元气，愚兄弟安之有素，故不必有十分品德而已能杜绝营私也。合肥大笑曰：‘了不得！了不得！如此酿法，必酿出曾文正、李中堂矣！’”

光绪十八年（1891），范伯子仍在天津李鸿章幕执教。

二月，金弼来见。金弼《范肯堂先生事略》：“先生在天津，弼以公车北上投谒，慰问饥寒有若子弟。”

同月，同乡友人王尤（云悔）到天津参加考试，因急病突然死亡，范伯子与老乡戴祥元全力操办丧事，并设法将棺材运回南通。他在《上吴挚父先生书》中说：“理丧事，裴浩亭与彼有交，周子玉无交而相识，皆赴告以来，子玉则又为我拉戟门同办。浩亭慨然以病中所措棺木相借，附身之衣物，则诸公未到时我已措齐。子玉欲任此日之杂用，我力却之，一皆由我发放……既殓，停棺庙中，乃复告此四五公者，乞改赙为赙。”范伯子为了替王尤还债，提前向李鸿章支取家教酬金，“方往借束修时，相国谓我：‘此事一付天津道足矣！’我乃力辩子玉之并无交情，不得相扰累，所不告诉中堂者，亦以王君之未尝见过耳。因此相国送修金来时，别送四十番，题曰‘帮分’，此其于我，亦可谓多情。而子玉闻我之办于相国，故亦深感，慨然以百番相资……而张戟门劳顿一番，我往谢之，渠竟慨然任轮船之资，此尤得之意外。”

他又在《三萁云悔文》中写道：“呜呼云悔，吾既为子具以殡，而今也乃送子归矣。具以殡者，非我之力也，周、裴二公实分任之，而张戟门观察又子所不识也。护以归者，非我也。”

竭尽全力为友人经营丧事而又毫不居功，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五月，张謇参加会试落第后回通州时经过天津，范伯

子心胸宽广，不计前嫌，去张謇住处晤谈。《南通县图志》曾记载，张謇因范伯子入李鸿章幕不通书问者数年。不通书问者，其实是张謇因讨厌李鸿章其人而误解了范伯子不与他通书问，并不是范伯子的本意。大概后来张謇也明白范伯子入李鸿章幕仅仅是执教而已。

但中日甲午战争，翁同龢是主战派，张謇站在他这边，李鸿章是主和派，范伯子站在他那边。金强《范肯堂先生事略》中说：“会中日事起，京朝士大夫集矢和议，先生独违众论，以为未可轻开外衅。时论訾之，先生知交亦有腾书相抵者。先生怆然谢曰：‘是非听之，异日终当思吾言也。’文忠既罢总督，先生亦归通州，畸龢先生者犹不少息。”沈云龙《现代人物述评·通州三生——朱铭盘、张謇、范当世》中说：

“（张謇）……至光绪二十年甲午始以恩科会试中第六十名贡士，旋应殿试，阅卷大臣仍为翁尚书，乃以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时肯堂正客李合肥幕，合肥与常熟政见两歧，张、范遂亦异趋。未几，中东衅起，翁、李和战之争，世传二公阴主之，盖曾于家书中各露其微旨也。《范伯子文集》卷七有《祭季直封翁润之先生文》有云：‘嗟两家之兄弟，逐风尘之累迁；既酸咸之各异，亦升沉之各天。’又云：‘昔金恭人之歿也，余不憚百里而星奔，恨公丧之独否，属有故而羞陈。殆昔勤而今惰，岂今疏而昔亲。’……语意含蓄，亦耐人寻味。”在这件事上，两人政见不同，有些隔阂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毕竟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在少年时期结成的挚友，后来也就冰释了。

李鸿章夫人周氏卒，享年五十六。范伯子写有挽联：

上有宫中圣母定卅年元老之勋，下有夫人赞金
瓿相业；

昔为江左部民观百两于归之盛，今为幕士播彤
管徽音。



六月十一日，范伯子受业恩师顾修定的妻子王恭人在南通去世。范伯子写了祭文寄到南通，叫儿子范罕去祭奠。后来，又写有挽联：

贱子无似，德少而辞多，只与郎君同学同志得
母之矜怜，已矣平生，弗似遭丧犹下泪；

大兄有言，亲亡则身老，莫如人间何世何年于
我乎萧瑟，哀哉此语，孰能处变不伤心？

这期间，吴汝纶有信给范伯子，建议他辅助李鸿章的儿子李季皋纂修李鸿章年谱。信中说：“季皋待我至厚，尤可感。渠百日后当理旧业，吾意欲请其纂修师相年谱。前时名人暮年多有自为年谱者，师相公事少暇，故不能自撰，亦不肯沾沾自喜。然生平所办皆大事，关国家安危，他人传述失真则心迹易晦，莫若季皋于问业之暇，日记数则，由执事润色而呈之。于趋庭之时，以决定事理之是非。此在季皋为莫大之著述，而在吾辈亦有先睹为快之愿，异日国史不能得英雄深处也。请公裁酌，以为可行，则请即行之。”后来，范伯子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为李鸿章撰写年谱。

闰六月初，范铠护送姚倚云到天津。后来，范伯子在《稟父翁书》中说到姚倚云来天津的好处：“媳妇此来其实于男有益处，于用钱之事尤有潜移默改于无形者，就其小者论之……如昨有吴至甫亲眷过此，借大钱五千，男已应之。媳妇未免有难色，缘其人本不过三日盘费，无取乎太多，故男亦以为然，改送二千，而此事亦了。诸如此类甚多，大者可想也。”

这期间，吴汝纶曾写信给范伯子，劝他参加乡试。范伯子写了《挚父先生来书劝乡试，欲以诗答，会连日用山谷韵，乃复效其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连缀二篇，因示叔节》，表明“四十真当生死关，要从人海收身还。已读《南华》亦奚悔，可以容身雁木间。范子何为书十上，屠龙有技无人赏……老

与郊岛相娱嬉，此在风尘犹可喜”。他要像《庄子》中所说的那样，处于有才无才之间来保全自己，不愿像苏秦那样，十上书去求官，而愿像孟郊与贾岛那样，写诗以终老。

光绪十九年（1893），范伯子四十岁，仍在天津。

正月初五，李鸿章七十寿辰，两宫赏赐寿匾、寿字及无量寿佛等许多珍贵礼物。范伯子也写有祝贺寿联：

环瀛海大九州，钦相国异人，何待子瞻说威德；
登泰山小天下，藉通家上谒，方今文举足平生。

山西大旱，天津各界积极为山西灾民筹集赈款，津海道盛宣怀的弟弟盛薇孙组织书画义卖活动，范伯子夫妇也参加了义卖。他在《为盛氏子题画》中说：“山右饥，津海道盛杏孙既不惜巨万救之，其宾客言君谿博亦招合徒友炫鬻文字，一归于振，而其弟盛薇孙并为人篆刻竹石，勤勤恳恳，惟以活人，犹以为不足，益出其名书善画，征题于人，而出资以会于谿博。”

这期间，贺松坡来天津，与范伯子饮酒谈诗，相得甚欢，盘桓多日。

六月八日起，天津地区昼夜暴雨，海河下游泛滥，水涝成灾，民田一片汪洋。范伯子写了《寓庐临河，水暴涨，没阶尺许，而通永道张丈筱泉自大赵庄工次来，告以身自临筑河堤，厄于风雨，悲闵成诗，读之良动人，走笔奉和》诗，表达了对受灾农民的深切同情。

六月三十日，范伯子四十岁生日，写有《六月三十日，外舅以写怀六首示读，谨依韵次上，即以自寿其四十，而寄示莲儿，俾转呈大人一笑云》，第一首中有“四十又徂半，分年恰到中。吾生能几日，大概欲终穷”之句，颇有怀才不遇的悲愤。姚倚云也写有《和夫子四十自寿韵》：“寅子同初度，从君俱客中。举觞怜寂寞，对景伤无穷。”“四十飞腾日，凌云



笔不停。”颇为夫妇能诗而自豪。

这期间，范伯子开始阅读李慈铭的诗集。李慈铭（1830—1894），字爱伯，号莼客，晚署越缙老人，浙江绍兴人。清末著名学者，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山西道观察御史。为人耿直，屡屡上书言事，敢于冒犯权贵。他学识渊博，诗词古文造诣极高，名声显赫。他的《越缙堂日记》最著名，内容以读书心得及朝廷政事为主。

范伯子写有《从謇博借得李莼客侍御诗集，即夕读其七古二十余篇，不容不服，恨无由见之，观其自序，称后世谁能定吾文者，吾自定云尔，则又慨乎莫能禁也，独夜无聊，叠兵字韵题其端，以示謇博》：

东南一老更戎兵，四十五十澹得名。名在世间若遥瑟，诗到吾耳才轰霆。惜哉有言驷不及，平生不愿识帝京。何从众中拔此老，篮舆捧向西山行。山中之人气如虎，帝旁魁梧多好女。恹恹一世真有余，万岁千秋不爱渠。千秋万岁渺茫事，问渠政亦不汝须。我生之年君壮夫，君衰我亦形容枯。至宝原来还自定，有人掩口笑壶胡。

李慈铭自称淡于名利，可又自我评定诗文，岂不自相矛盾？

“千秋万岁渺茫事，问渠政亦不汝须”，所以范伯子感到这个人真有趣，真要叫人“掩口笑壶胡”了！

七月初二，范伯子有信给言謇博，并手抄两篇诗托謇博转呈李慈铭。信中说：“莼客先生处，吾本欲多缮诗文奉教。吾弟此行出乎意外，今于人客满堂时，秃笔枯墨写得二篇，必为我致此诚……”

言謇博带了范伯子的这两首诗交给李慈铭，李读后有《与言謇博手札》：“所携视诗，其姓名是否范当世？当世素不知其人，观其诗，甚有才气，然细按之，多未了语，此质美

未学之病也。”郑逸梅《艺林散叶》所说的“李越缦薄范当世”就是指的这件事。其实，李慈铭为人很傲慢，以漫骂时人著称，对范伯子如此评价，已经很不错了。

十一月十八日，朱铭盘积劳成疾，逝于旅顺张光前军幕，享年四十二岁。那时他的儿子朱骥之，还未满月。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张謇闻朱铭盘噩耗，心情极为凄惨，他在正月六日的日记中记道：“得曼君客死旅顺讯，凄惋无涯，名心益冷。”

光绪二十年正月，张裕钊在陕西逝世。范伯子闻讯极痛心。

在这期间，范伯子开始发愤整理范氏诗文集。他在《与三弟范铠书》中说：“我之所以闻讣（按：指张裕钊之噩耗）十日后即发愤论次家集日夜不辍以至于今者，固感于生死之无常。谢却而成此大事，亦俾早夜为此，则精神无所旁溢，而夫妇谐笑、朋友欢会之缘皆屏焉，庶足以稍称其哀情也。”在《〈通州范氏诗钞〉序》中又说：“自当世甫冠，大人则以此事相督勉，往往读不终卷，辄瞢然莫辨其微远所在、孰为高下，以此发愤游学。”到张裕钊去世后，姚倚云对范伯子说：“子不尝欲论次家集以问张、吴乎？张则远且没矣，吴幸而近在，而子又多病，人事何可知？与论古人，何如论家集乎？”范伯子听后大为震惊，连续六十多天，集中精力做这件事，到四月十六日，辑成《通州范氏诗钞》。但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国事、家事纷乱如麻，直到范伯子去世，《通州范氏诗钞》也没能刻印。直至1966年，曾克耑才以《诗钞》为蓝本，复益以伯子先生、范姚夫人、仲林、秋门、彦殊、彦矧、子愚诗，合成《通州范氏十二世诗略》于香港印行，风雅得以流传，功莫大焉。（《〈通州范氏十二世诗略〉跋》）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吴汝纶经过天津到阳信去探望他的弟弟吴汝绳（诒甫），住在范伯子家好几天。范伯子有《摯



父先生来止寓庐，欢燕屡日而后即其弟阳信，其行甚早，外舅不知，犹以《冬柳诗》来索和也》。

光绪二十六年，范伯子去上海拜见李鸿章，有《至沪谒李相》：

天津回首阵云屯，重向江头谒相门。天意尚能留硕果，人间何处起贞元。耆年往复乘衰运，老泪滂沱有笑言。一事告公时论定，八州生类赖公存。

从结句“八州生类赖公存”可以看出，范伯子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是很高的。

同年九月，范伯子在扬州，写有《闻李相至天津痛哭》：

相公实下人情泪，岂谓于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锤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境森严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亦如丝。

联姻江西陈氏 共同切磋诗文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江西义宁陈氏向通州范氏下聘范孝嫦礼成，两家互换庚帖。范伯子的父亲曾写信给范伯子，信中转述了陈宝箴评赞这门亲事的话：“陈公云：我已见君家四代诗文稿，为江南第一。旧家孝友相传，而尊公人品学问，绝非世俗。今我与对亲，真是喜极！我儿子品学，与君家兄弟相类；我孙子师曾又与彦殊略同；及内眷无不相似，真天假之姻，惟日望君（指仲林先生）来，欲责其避贤之罪，为有此贤侄女而不荐之故也……”又云：“我初愁此亲不就，以令侄女弱小失母，皆亲家母抚育成人。又闻姻嫂慈爱，携去天津，恐两慈亲不肯远嫁。今请转致，我即不做官，我儿子为江苏候补道，我住扬州必不归江西，而一水之地，往还甚易，请堂上及令嫂可无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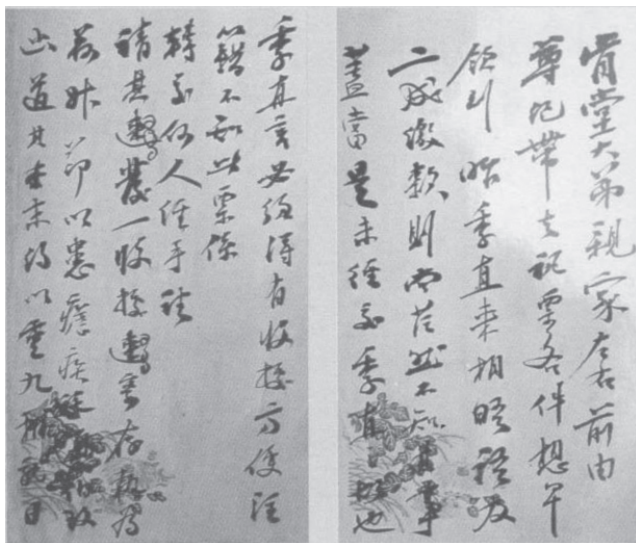
陈氏是江西著名的诗文世家。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曾在曾国藩幕府，后授河北道。创立致用精舍，聘请名师教授，培养了很多人才。光绪二十二年，由于荣禄的推荐，提升为湖南巡抚。他在湖南努力推行新政，跟按察使黄遵宪、候补知府谭嗣同等一起，创立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并推荐杨锐、刘光



第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陈宝箴之子。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吏部主事。戊戌变法期间,帮助父亲在湖南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辛亥革命后,自称遗老,隐居于杭州、庐山、金陵。晚年移居北平,日本人百般利诱,他坚守民族气节,不为所惑。有《散原精舍诗文集》。他是同光诗派大家,在当时影响极大。范伯子在《近代诸家诗评》中评论他说:“伯严文学本我之亚匹,加以戊戌后变法至痛,而身既废罢,一自放于文学间,襟抱洒然绝尘如柳子厚也,此其成就且大于苏戡矣。伯严诗已到雄伟精实、真力弥满之时,所欠者自然超脱之一境。”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范孝嫦与陈衡恪成婚于按察使署,当时范孝嫦与陈衡恪都是十九岁。陈师曾,名衡恪,号槐堂,又号朽者,是陈三立的第二个儿子。幼年时跟从祖父读书、练习书法,后来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及日本高等师范留学。



陈散原致范伯子书

回国后曾担任南通师范、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北京高等师范、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等职。善诗文、书法，尤擅长绘画、篆刻，曾得到美术大师吴昌硕的指点。

叶恭绰《陈师曾遗诗序》说：“师曾少好为诗，又工画……画竟，辄好题句，故君之诗与画恒相系属。君少承散原先生之训，又濡染于妇翁范肯堂先生之诗学者至深，第所作乃一易其雄杰倔强之概，而出以冲和萧澹。”

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中说：“义宁陈师曾诗学深造，曩读乃翁《散原精舍诗》，苦其奥涩，师曾却似简斋而不为后山，其工者虽其妇翁范伯子亦不能过，然往往为画名所掩。”

陈寅恪（1890—1969），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衡恪的弟弟。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曾三次游学欧美，先后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校、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文学、梵文及佛经。回国以后，历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理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等职。解放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2年由岭南大学调至中山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直到去世。他是近当代中国最有名的学者之一。著有《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陈三立与范伯子结成亲家以后，志同道合，经常讨论诗文，情意深厚。二人诗文集都提到对方的作品，评价极高。徐一士《一士类稿》中“谈陈三立”条说：“综览《散原精舍诗》，所最推许者，当属通州范当世肯堂，集中投赠独繁而挚。一作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群更不喧。’又曰：‘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此‘使君与操’之胜概也。”

两个诗文世家缔结婚姻后，在诗文创作中相互影响，大大提高了各自的艺术水平，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



话。请看范伯子写给他亲家陈三立的诗：

《余以岁暮，疾还里，濒发而为风浪所阻，乃又喜与伯严兄得稍聚也，抚事有赠》：

海内飘摇十数公，更能坚许两心同。独成一往
翻怜昨，乌有千秋果慰穷。醉把文章传作笑，谈将
身世渺浮空。淹留弗渡君真善，终恐岷江不再东。

“更能坚许两心同”，同就同在都将诗文当做终生最重要的事业，而将其他一切都看得飘渺空浮了。

《余既与伯严稍稍赠答，无几而决行矣，携大集以归，用韵而成，惜今日之作》：

余独何为惜今日，支离撼顿一逢兄。寒江照此
双心合，夜雨怜渠独角成。六籍死灰拼葬送，八方
兵气忽峥嵘。谈余低首乘流去，窃把君诗海上城。

范伯子得到了陈三立的诗集，比得到任何东西都高兴。

《九江迟船怅望伯严》：

壮日吟朋呼啸处，却扶衰病又经过。国闻家事
皆抛撇，离合悲欢一刹那。雨不入江秋水浅，楼刚
出市夕阳多。哀来独眺西山友，濡滞依然奈尔何。

因陈三立迟迟未到而怅然若失，可见两亲家之间的情谊是多么深厚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陈宝箴、陈三立被革职。光绪二十六年六月，陈宝箴卒于江西南昌。范伯子作了《西山靖庐吊伯严，悲思右铭姻伯，作伤秋五首，次韵杜甫伤春》诗，对其表示深切的同情，诗中有“麻衣相哭罢，余恨万千多……惻惻履霜操，凄凄薤露歌”之句，心情极为沉痛。

范伯子的《故湖南巡抚义宁陈公墓志铭》则对陈宝箴

在湖南全力推行新政作了极高的评价：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丙申，故湖南巡抚义宁陈公卒于南昌府城之西四十里曰靖庐者，其孙衡恪，吾甥也，抵书通州，曰：“父毁疾甚，不能亲告哀，惟泣言吾祖身后之文辞非外舅莫属，庶几不远千里而临恤焉。”于时西人方以联军破京师，两宫出走，州县皇皇日有警，不能遽行，至闰八月戊申，乃得走诣公殡，哭尽哀。已又持伯严而泣，伯严曰：“兹已略状先君行实矣，卜以十月辛卯葬于此，必吾子铭。”呜呼！公之所为，虽吾友若吴冀州犹不尽知之，则吾固不可以无述。先是二十一年，中东和议成，公以直隶布政使督湘军粮台，见马关和约而泣曰：“不国矣！”因大望相国李公，至其使还留天津，亦不往见。吴冀州方主莲池书院，颇为公言李公，公益愤其辞，而吾弟钟会试归过公有言，公并诘之，曰：“若兄弟皆主李者耶！”然吾后得其平心之言，则公尤望李公极知不堪战，不以死生去就回上意，而猥随俗塞谤取祸败空国至于斯也。其年八月，上擢公湖南巡抚，公益若茹痛而之官，以湖南号天下胜兵处，而民智尤塞，遏绝西法至不通电竿，于是举李公及湖南总督张公所已尝为及为之，而实不至或并不得为者，穷昕夕讨论，次第而毕行之。行之两年，而湖南风气盛开，吏治亦称最。至二十四年，上感于主事康有为之所称奏，益决意变法，而屡诏嘉公忠，公以上将大有为则无往而不须才，遂罄举平生所知京外官之能者与所属吏士之可用者三十余人，备上之采择。于时京官在京者，独杨锐、刘光第，而外官在京者，独候补道恽祖祁。上遂擢祖祁为厦门道，而用



杨锐、刘光第与谭嗣同、林旭者，并为新政章京。公疏言四章京虽有异才，然臣恐其资望轻而视事易，愿得大臣领之，复力荐张公之洞。疏上，而皇太后训政，四章京诛，公坐滥保匪人，废斥不用，然固不罪公所为也，而人遂汹汹，目公以康党。康亦当世之所尝识也，尝以其下第时，过当世天津，当世独许其才，不喜其学。已闻上召对康有为，时公疏言其长短所在，推其疵弊，请毁其所著书曰《孔子改制考》者，心独喜其与吾意同也。湖南既设时务学堂，其官绅并缘《时务报》。推梁启超为主讲，而公从之。及《湘报》与学堂所论有疵，公则为之遏其渐，剖析而更张之，吾未见其为谁氏党也。

自吾束发读书，慕思曾文正公之为人，而愿觐当时之亲炙者，若张廉卿先生，若吴冀州，既师友之矣。若公，若奉新许公，皆以其在位不往而通，然犹颇记光绪九年得公与学士张君佩纶互许之稿，壹皆不识，而心袒公也。其后公独尚余之文学而托以孙，而许公抚广东，亦介吴冀州必余往，许公不言维新者，方裁缺欲归，公论书督劝甚挚。许公曰：“岂须我耶？”余曰：“不然，此公义相取，陈公何必旧，公又何必新耶！”及公斥，三巡抚缺罢裁，而许公亦用谗废弗录，死而无人惜之。然则公虽不如往日之所为，又岂得全于兹世哉？

公讳宝箴，字右铭。按《状》，公曾祖讳腾达者，始由闽上杭迁义宁竹垞里。祖讳克绳，用孝义化服乡里，学者称为韶亭先生。父讳伟琳，母李氏，并有懿德高行，在郭侍郎嵩焘所著文中。公生而顾视落落然，七岁始宿外塾，则谓其师曰：“昨有不能寐者三人，我父，我母，及我是也。”年二十一举于

乡，从父治乡团，抵粤寇。父劳卒，哀昏得狂症，已仍战寇保其乡。咸丰十年，入都会试，留交其俊乂。文宗狩热河，颇有所建白于枢府。已而走湖南，就易公佩绅、罗公亨奎所谓果健营者，与俱拒寇来凤龙山间。石达开以十万众来犯，粮且尽，公乃风雪中著单絮衣，走永顺募粮，矢与营士冻饥，感动郡守，输银米济军，而守益坚。寇不逞，引去。骆文忠公督四川，遮果健营与俱，而公归省母，出就曾文正公安庆，文正公绝重之。李公鸿裔典幕职，且挟公代己，公乐亲战事，则之席公宝田江西军，言于沈文肃公，使席公大重，颇为席公设奇策歼群寇，禽洪福瑱。江西平，叙公官知府，再就曾文正公江宁。文正公改督直隶，公乃以养母就官湖南，始终调护席公平苗之军，俾不为谗构。而功以成，擢道员，经理苗疆善后事，惩治宁远豪族欧阳氏之械斗，皆有功绩可述。署辰永沅靖道也，其治曰镇筸（按：地名，在湖南凤凰县南），故苗疆，务和民苗安其习，忧其僻万山无以养教之，以植茶种竹树，招人制创，使创薯为粮，名之曰薯丝。及为巡抚，阅兵至镇筸，则倚薯丝佐粮者多矣。丁母忧，服阙，授河北道三年，河不为灾而盗敛迹，创致用精舍，遴三州之秀，延师教之。擢浙江按察使，数月，以前河南临刑呼冤狱免官，则与张君互讦时也，其语颇传于士大夫间。免归而护湖南巡抚庞公奏起公，辞以疾。彭刚直公防广东，旨交差遣，不赴。张公之洞方督两广，奏调公，公一行而河大决郑州。诏襄李文正公治河，文正公不即用公言，河不时塞。公归十五年秋。今相国王公抚河南，奏公爱惜羽毛，宜特用，遂召入都。十六年授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加头品顶戴，为治大



放胡文忠公，务饬吏清讼原而联以情，手书劝勉，人传其与总督张公廷诤至不怿而卒从之。十九年，再署布政使。二十年冬，中东战事亟，擢直隶布政使，入对。公见上忧劳，颜悴甚，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庶得变而不失其常之道。他所陈奏语尤多，恳恳流涕，上以是知公忠也。督粮台，命专折奏事。明年，遂擢湖南。盖公一生行事之大者在湖南，尤习于湖南，乐用其人，人亦乐之。思以一隅致富强为天下倡，而务分官权与民，故湘之人兴起者太半，其顽者一二，中立审势者裁二三而已。宁乡已革道员周汉者，积以张揭帖攻西教煽乱为总督所治，而时人多奖谓忠义，及是复刊帖布乡县。公闻，传毁其帖，汉复殴传吏，公怒，下之狱，而湘士之顽者乃造作蜚语谤公政变，而向之中立者亦人人挤公，必尽反其所为而后已。故公所施于湖南者独矿务局已获优利得不废，而保卫局民爱之，私沿其法，亦非其初矣。呜呼！事之对待也无终，由周汉事观之，则今日北方之团匪，又岂得谓之非义民者耶？而公濒死恋恋于两宫，孰料两宫颠沛至此耶？公为我言，咸丰十一年，京师酒楼见圆明园火，挝案大号，遂欲辍文学讨时事，奋其愚陋，庶几乎一日之强，而今不堪令公见矣！故余既哭公，又不能无幸于公之前歿为尤痛者也。公为人大口修颐，意量超然，无穷达于其心，吾独送女湖北时，从公语不及旬，公遂去之直隶。公于诗文果不多为，为则精粹有法。自吾女言之，公绝贫，在官不能请贷于婚友，则时时典其衣裘。今所谓靖庐者，即其配黄夫人葬处，营生圻而庐其旁，此外无一垆也。黄夫人，义宁老儒诤彩意女，有兄锡禧，官训导，年十八归公，孝事李太夫人数十年，公

自以为不及。而公廉实夫人助之，终身布衣襦。吾女言其嫁时衣夫人有不识者，故绝不取服。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公巡抚任所，享年六十有六。公享年七十，子男二人，长三立，即伯严，吏部主事，政变并革职。次三畏，出后叔父，前歿。女二人，长适席公宝田之子，袭骑都尉候选道曜衡。次殇。孙六人，曾孙二人。铭曰：

清有圣帝圣自躬，非彼眇末能加聪，有臣一人
为臣宗，吾见旧谊填心胸。万世之遇一世逢，运则
不至征罹凶，浩浩民劫方未终，臣不待矣年命穷，
濒危但祝安两宫。后人惟有公是崇，或由困辱思公
忠，遂凭吾文求其踪，青山之原西山东。

墓志铭详细地记载了陈宝箴的为人和主要业绩，写得情真意切，极为感人。后来，陈三立为了感谢他为父亲写墓志铭之情，送了一部影印宋版黄庭坚集给他，范伯子十分激动，写有《伯严以所影日本遗留之宋刻〈黄山谷集〉为中丞公墓铭润笔，且诒一诗，次韵奉答》诗：“小文论报吾滋愧，况以黄生内外篇。拙道回还只如此，高名前后一潸然。长啼燕市今何益，善价鸡林古所怜。欲把斯文待灰烬，凭何写恨向苍天。”诗中对陈三立送这样的厚礼作为写墓志铭的报酬十分感激，也感到十分惭愧。可想到如今文人的遭遇，又不禁要潸然下泪。日本人如此重视文艺，而中国则“欲把斯文待灰烬”，逼得文人只能“写恨向苍天”了！

光绪二十八年（1892）七月，范伯子又有《秣陵中秋，伯严以城间胜处在复成桥，约诸公棹小舟往会，至则风甚月不莹，不能望远，伯严遂欲出马路穷探，而陶公所携妓尼之，及反棹至四象桥，月色转莹彻，余与伯严徘徊良久，述以此诗》：



天高无云但有风，分明璧月纱来笼。凄凉柳路行无穷，纡回照暗灯微红。钟山只在城南东，高下一气青迷蒙。复成桥上烟景雄，到来指点殊难工。吾知陈生兴堕空，只欲疾走争冥鸿。藉非有妓哀疲癯，遂入深深灌莽丛。须臾回舟夜色融，歌管寂寞三更终。澄辉朗彻天当中，直鉴豪发无昏瞳。可怜四象桥边水，正照天涯两秃翁。

也是写得情景交融，感慨极深。

陈三立编有《金陵门存诗刻》，送给范伯子，范伯子写有《〈金陵门存诗刻〉中，余极赏陶宾南“欲穷沧海无涯量”及“似水楼台柝不喧”二首，兹来蒙以长篇见赠，罄意和之》：

伯严示我门存诗，惟陈惟姚颇自奇。如许过客纷陆离，或复老辈同娱嬉。浓妆淡抹皆相宜，就中陶生句读师。暂辍层吻雕肝脾，甫视若与诸公差。屡战方知故等夷，欲穷沧海愁无涯，似水楼台发静思。我读篇什从忘遗，此独深驻不复驰。耳旁亦闻人谤誉，久乃泐洽观其私。此人举场宁后期，只望得谷疗亲饥。小心事人良在兹，嗟哉此情我所知。恨我不得为鸱夷，遂能投汝千金贄。买汝百万琼瑶辞，汝亦深深好自维。令闻广誉非人为，内实磊落无人窥。堕地分天天自随，积气成华人群卑。变幻吐纳云烟垂，古之诗人有遗规。坦适岷嶽皆无危，汝盍急起前攀追。

范伯子对陶宾南所写的两首诗特别欣赏，由于此人不重科举考试，只重有钱养亲，因此范伯子希望自己能像古代的鸱夷子范蠡那样富有，赠钱给他养亲。从这里也可看出范伯子人品决定诗品的诗学观。

再看范伯子写给女婿的诗,《内人有诗别女,吾亦不可无以诒师曾也,遂次其韵》:

平生冰玉有余音,不觉推移望汝深。如此妇翁
应可意,向来儿女未关心。圣漠漠精犹粲,人海
茫茫血见忱。万事不如文尽写,几年燕楚对披吟。

从尾联可以看出范伯子对诗文的重视,并以今后能翁婿对吟为乐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范孝嫦(乳名菊儿)在江宁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五岁。范伯子写有《陈氏女墓碣铭》:

“女之歿,吾夫妇皆居父丧。逾月,其舅亦遭父丧,故虽其夫与其兄弟皆不得极哀,此尤可哀也。”又说:“女出前母吴而成于今母,适陈氏,人皆谓其有母风,然女从母天津诚学三年耳。年十九而嫁,遽不失令名于陈氏,其质性亦优也。”

陈师曾写有画菊为妻子遗照的题照诗,范伯子读后心情极为激动,有《阅女婿陈师曾诸近作,至其画菊为吾女遗照而题四诗,潜然有述》:

誉汝诗文至悼亡,人间无有此情伤。徒缘罔极
呼天痛,更为同怀引恨长。遂以鸿毛沦我爱,不图
麟角为兹狂。秋心不与秣春谢,从此东篱岁岁芳。

在东篱旁年年看到盛开的菊花就要想到女儿,真是“徒缘罔极呼天痛,更为同怀引恨长”啊!



通州三生结交 生死情谊永存

张謇、朱铭盘与范伯子，当时被称为“通州三生”或“通州三怪”。

朱铭盘（1852—1893），原字日新，改字叔简，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当时泰兴属通州。光绪三年（1877）至浦口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光绪八年中举人，跟张謇一起随吴长庆去朝鲜。光绪十年，又随庆军驻奉天金州。光绪十四年，在金州入张明光幕。光绪十九年客死于旅顺军幕。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一生著作很多，重要的有《晋会要》《南朝宋齐梁陈会要》《四裔朝献长编》《桂之华轩诗集》以及《桂之华轩骈文》等。

关于“通州三生”（或“通州三怪”）的称号，见于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铭》、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汪国垣《近代诗人小传稿》、郑逸梅《艺林散叶》等著作，如“伯子少负隼才，时武昌张裕钊有文章名，客江宁，伯子偕张謇、朱铭盘谒之，张大喜，自诧一日得通州三士，兹事有付托矣！”而孙建的《伯子先生年谱》（《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十九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认为“移花接木，合三为一，特饰词耳！”因为朱铭盘并没有跟范伯子、张謇一起去向张裕钊

请教为文之法。但这三个人在当时齐名，情谊特别深厚，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张謇与范伯子结交甚早，据《啬翁自订年谱》，同治八年（1869）张謇十七岁、范伯子十六岁时，两人在西亭求学时相识：“仍从学于西亭，颇苦藉事索酬之应付……识如皋顾延卿锡爵……通范铜士铸。铜士后更字肯堂更名当世。”以后往来频繁，关系极为密切。《张謇日记》在同治十三年正月中记载：

二十日 早起独坐，无可与言者。饭后王一山先生及铭勋、范肯堂来。灯下纵谈，座中惟肯堂最健于词辨，然失者不少。漏四下，与肯堂联床话雨。

二十一日 雨不止。晏起。顷之有成子完及某某来，皆偃蹇有学究气，惟肯堂时复抗手谈论。晚间啸叔置酒定堂奠礼折，是夕演礼。因雨不克行，与肯堂抵足睡至四鼓方寐。

二十五日 起谒梁筱师、王子师，并候穆如、肯堂、王时师、一山世丈、宋师母。于肯堂处饭，菜羹豆豉，大有山林风味。噫！世人相待不过酒食征逐耳，乃一见即如是相待，厚矣哉！晚于三叔谈，肯堂订游山之约。

从联床话雨、抗手谈论和以菜羹豆豉招待等友人记叙中可见他们相知之深、相交之厚。而从二十六日游山记录中，更可见二人当时倜傥风流、豪气盖世的风度：

日丈余起，方早餐，而肯堂来践约，铭勋继来，略坐，携数百青铜，偕肯堂步至南营，雇马两骑出市南缓辔行，望五峰翠秀扑眉宇，与肯堂有时叠骑清谈，有时着鞭争胜，至山下，步至川至庵小憩。推窗



见大江接天，征帆似鹭致，忽隐忽现。僧三省煮茶以待，出桔枣糕饼疗饥。见彭宫保、陈铁床诗字。继至准提庵，庵僧芥舟，都人士啧啧称能诗，访之则方拥敝帚扫地，窃许为雅，坐次索其著作，乃以和彭宫保四律见视，读未竟而气味齷齪，令人欲呕。东坡谓语带烟霞，味含蔬笋，若僧其犹愧焉。茶盏未寒即行。至支云塔，小沙弥初不为礼，及见风帽，细审而告伊师，遂得至雪峰僧处略坐，旋下山策马至黄泥。丛竹垂岩，枯藤络石，殿宇只数楹，而泉流涓细，短树婆娑，大非狼峰之绚烂矣。山僧映中朴甚，于新绿轩进茶，满引三数瓯乃行。而马后山光与野照饮烟相映成画，行里许，犹令人回首不置。昔人沈湎烟霞，正不知何修得此？肯堂先是因所骑甚驾，与余易之而行，诤意骅骝得路，奔轶绝尘。肯堂据鞍大号，呼道旁樵牧儿为之收取，竟无一敢应者。而余所骑虽霜蹄超逸，犹复闲闲然，按辔遥瞻已，肯堂已望尘不及。至曹公庙，则肯堂已下马而喘未定也。相与引马牧草水边，缓缓步行，马夫来乃执鞭从事。抵南郭，市人相视不止，盖以为书生而作武夫态耳。留肯堂晚饭，缓斋来，偕入城至肯堂家谈旧事，慷慨激昂，几于泪下，二鼓返。是日也游甚畅，尤好者，马夫解事，余来去必绕山行，不以为苦。世有拖青纁紫，遇山水犹铮铮作威福者，以彼视此不诚逊哉！马夫为谁？城南黄姓。

以后，或范伯子从通州至常乐镇张家，或张謇从常乐至通州范家，往返百余里，不嫌其劳。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喝茶，品评人物，讨论诗文创作，谈论读书心得。《张謇日记》在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记载：“二十四日……饭后，肯

堂自通来，迢迢百里而有相思命驾之情，是可与元伯、巨卿后先相映也。为之大快！以删成诗草嘱审定。灯下纵谈，夜深就寝。二十五日……起视肯堂日记及时艺，不屑为庸庸所为，不甘道琐琐所道。肯堂诚可；然言过其实，且多力劈前人之书，而无卓识定据，亦肯堂所短。而余所必规者，况肯堂能受言乎。”直率恳切，令人感动！

光绪二年（1876），范伯子二十三岁。张謇曾跟他论立身救穷之道。闰五月，张謇赴浦口，入浙江提督吴长庆军幕。七月，范伯子至江宁参加岁试，与张謇等友人相会。

光绪三年，范伯子二十四岁。正月九日，去海门常乐镇祝贺张謇父亲生日，并与顾延卿等人谈论诗歌，直到十三日才回通州。

张謇与朱铭盘也交往极早，据《张謇日记》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记载：“周小棠置酒，朱曼君铭盘来，有早萤诗。”而在同年四月一个月中，朱铭盘竟到张謇家去了十六次，或品味鲥鱼、螃蟹，或聊天闲谈，或讨论诗歌创作，关系极其密切。

光绪五年五月，张謇在科试中名列第一，范伯子“置酒魁楼，宴请张謇、顾延卿、周家禄、朱铭盘等友人，几于竟日”（《伯子先生年谱》）。可见范肯堂与朱铭盘早就是朋友了。

光绪六年，范伯子二十七岁。

正月十八日，张謇家治母丧，开吊。范伯子与二弟范钟赴常乐吊唁。

二月，张家勘寻葬地，最后看中通州城东小虹桥范伯子祖坟旁一块地。伯子父亲同意割墓原外四亩地，张家用海门田六亩交换。

范伯子代父撰写的《归田券》中说：“畊阳之田十二亩，先勋卿公墓西向，府君葬其北，而某营生圻其南。周以池，凡八亩，其亘乎池南不相属者四亩，在神道碑西。张君润之



夫人之丧方谋葬，而令子謇亟往军中，不可得地，谋诸某，为求亦弗得，乃割池南地与之。自勋卿公之葬二百有余年，当时形家谓重城作拱，五水归塘，后必大。不百年，新城废，水关圯，西南北水浩淼，势不抗，谈者谓家中落由此。由某观之，今日之形势，固犹一郡之雄胜也。某虽不敏，读书食藜藿，累代安之，亦复何望。方今天子有事于北边，幸托威福，吾与张君长为太平之民，儿辈稍稍涉四方而归，不至有马革之事，相率老于兹土焉。千秋万岁后，五山重水之间，父子朋友魂魄犹相依于此。张君藏此券诏世世子孙。光绪六年，某月日，范某署券，儿子当世奉命书。”

张謇代父亲所写的《大人命初易范氏地约》中说：“某以往岁内子颓丧，兆域须谋，丘垄莫治，山茨范君邈乎通感，割其先茔与君寿穴之余地若干亩，俾归葬焉……然而江东鲁肃，虽无卖地之标；赵国相如，敢袭易城之璧。海门东图故有薄田，分亩若干，用与抵直。嗟乎！百年旦莫，谁非陈人。一诺忼忼，公真健者。元白比邻之雅，以愧前休；张范生死之交，且从今始。子孙世世，长毋相忘。”

又张謇《易地约后记》中说：“先是先妣金恭人卒，先府君命依典礼三月而葬，而猝求地弗得，因即范丈所许割先茔之余地卜而葬焉，用海门田六亩，立约相易。既而先府君议偿地值，范丈执义甚高，延卿、曼君语再三返，始得请，乃更立后契。先府君以命謇兄弟曰：‘日月同明，有时而相妨；舌齿同体，有时而触抵。事但知常，不可以久。范君纾我之急可感，其委曲受值署券乃尤可感也。’”由此可见张、范两家情谊的深厚。

三月十三日，张謇母亲棺柩安葬，范伯子冒大雨去送葬。《张謇日记》：“十三日，寅初开圻，辰初二刻扶柩归窆，时方大雨。宾客则马勿庵、顾次山、蒋月波、朱曼君、范世伯与铜士昆仲、张虎庭叔侄也。”

更重要的是光绪六年（1880）三月十八日，张謇回浦口军幕，过通州时会见范伯子，范伯子、朱铭盘就与张謇一起去浦口（《张謇日记》）。这次同行，三人在舟中共作了《舟中连句倒押五物全韵》《诸葛忠武侯画像连句》《哀双凤诗连句》《仪征道中联句》等四首联句诗。

其中《哀双凤诗连句》描写的是一个婚姻悲剧，序文说：“双凤不知何县人，鬻为如皋倡女。（曼君）与许生识，遂订嫁娶。许既贫不能如鸩欲，往来稍稍闲，而凤终不妄接人。（季直）鸩患苦之，以忧死。濒危属曰：‘收我者许也。’吾侪固旧识，闻而哀之，作为此诗。（当世）”诗云：

二月江南柳，（曼）风条踈绿芜。枇杷门巷在，
（季）裙屐酒尊馑。无意逢花落，（当世）何缘救草
苏。为君数前事，（曼）怜我郁嘻吁。碧玉家原小，
（季）红儿貌不殊。凤饥梧粒瘦，（当世）虫蚀蕙根
枯。绛树雕栏出，（曼）青螺宝镜摹。弹筝愁浪子，
（季）扶酒倚香奴。鬼卦金钱卜，（当世）欢情斗帐
腴。缣云方共晓，（曼）瑤月莫难摹。含睇羞团扇，
（季）絨盟结绣襦。郎来鸚鵡觉，（当世）梦浅碧鸾
扶。半臂宵宁冷，（曼）双飞愿忽孤。缁绁穷赎蔡，
（季）玳瑁独栖庐。岂悔偷灵药，（当世）终难并鄂
柎。隔帘牛女怨，（曼）递筒角张迂。强笑成歌舞，
（季）华妆泫粉朱。纵摇雕玉佩，（当世）未剖黑心
符。宓枕惟遗植，（曼）苏台誓托吴。露莲秋后苦，
（季）霜菊影边臞。一病秦医拙，（当世）千行楚泪
俱。名驹犹惜骨，（曼）灵鸟竟辞笄。宛转卷菴拔，
（季）凄凉杜宇呼。命残留钿合，（当世）肌暖待襦
褕。谁道城南艳，（曼）能从陌上夫。百金豪客帽，
（季）九鼎美人躯。往者曾平视，（当世）今来失彼



姝。夫容慙晚堕，（曼）蘅芷际春徂。锦瑟驾弦尽，
（季）香泥燕垒无。欲铭罗袜冢，（当世）更涕博山
炉。沧海填精卫，（曼）穷阴种橐吾。天涯感沦落，
（季）回首共踟蹰。（当世）

诗中描写双凤姑娘被卖到如皋当妓女，受鸨母逼迫，无法跟情郎许生同结连理，终于忧愤而死。诗写得悱恻缠绵，哀怨动人，凄楚欲绝，读之令人泪下。虽为三人联句，但一气呵成，毫无拼凑痕迹，且用典贴切，词藻华丽，正如王庚《今传是楼诗话》所说：“通州张季直謇、范肯堂当世、朱曼君铭盘，均以朴学齐名，印距相依，艺林争羨。有《哀双凤》五言排律，流传一时，亦一段佳话也。哀感顽艳，荡气回肠，亦可见三君少年时才藻之盛也。”

而另一首《仪征道中联句》，则显示了通州三生当年的凌云壮志：

破晓南风出广陵，（曼）过江山色露微棱。西
征词赋悲潘岳，（季）东汉衣冠愧李膺。鱼美海乡
辞作客，（当世）花醲野馆漫呼朋。剧怜骨肉山中
梦，（曼）长路春寒思不胜。（季）新息从来忆少游，
（季）高平无那客荆州。田间已识羊牛好，（当世）江
上仍为雁鹜谋。臣朔侏儒有饥饱，（曼）中郎都尉各
兜鍪。吾侪三十年方壮，（季）裸壤龙章傥可休。（当
世）舳舻千里控堤防，（当世）三楚遗营迹未荒。屡
见番船通海国，（曼）愁闻岁币出云阳。将军陇右方
屯甲，（季）都督江东漫举觞。我欲绝裾怅风雨，（当
世）起看太白正横芒。（曼）父老犹闻说沈公，（曼）
桑麻遗爱满吴中。桐乡有庙酬朱邑，（季）鲁国何人
荐孔融。白日神鲸窥骇浪，（当世）青天大鸟咽悲
风。东南民力凋残甚，（曼）继政因循望小冯。（季）

身世苍茫泣五噫，(季)同舟尔我况将离。大河落日
重沽酒，(当世)席帽谈兵更赌诗。墓访屯田春家莫，
(曼)烟开棠邑树参差。往来岁岁江干路，(季)愁绝
风云黑鬓丝。(当世)

在那种国力日衰、国事日非、“东南民力凋残甚”的形势下，这三人都是正当“吾侪三十年方壮”意气风发的时期，应当是为国出力、大展宏图的时期，却是“江上仍为雁鹜谋”，为了糊口谋生，到处奔波，又将分手各奔前程去，心中贮积着多少感慨啊！这首联句诗写得慷慨激昂，充满凌云壮志。

这年十月，张謇为朱铭盘作《梅花诗》：“香海无端剪一枝，一花一萼费相思。不知月落参横后，缟素何人瘦似诗。”有所指也。

光绪八年(1882)七月，直隶总督(暂摄)张树声飞檄广东提督吴长庆率军乘船救援朝鲜。当时张謇、朱铭盘、袁世凯都在吴长庆军幕，随同一起前往。

光绪十年七月十日，张謇与朱铭盘、邱履平有《金州述别联句》：

西风吹送幕庭寒，(曼君)万里惊秋客袂单。
辽海无因悲远戍，(謇)燕云有梦促征鞍。清笳一
迸州门泪，(履平)苦酒难平壮士肝。出塞王师近
乘胜，(曼君)一时诸将自登坛。平津宾客几人存，
(謇)往事低回仆射恩。岂谓生平托簪履，(履平)
更烦涕泗到荃荪。凄凉丹旆横秋色，(曼君)零落
青袍惜故痕。杖策何如归隐好，(謇)迪维皇甫各山
村。(履平)

此诗写得豪壮、激昂，不仅写出了他们一起度过的一段军旅生活和依依惜别的心情，还表述了他们即将归隐的惨淡心境。



范伯子与朱铭盘情谊也极深厚。光绪十四年（1888），朱铭盘入旅顺张光前（仲明）军幕，写有《题肯堂照像寄肯堂诗》（《桂之华轩诗集》卷四）云：

肯翁寄我赫蹄形，贱子悬着瓜庐隅。审君貌肥肤革缓，料是病起毛髓枯。水心亭上二十四，目长眉远丹肌肤。黄鹤楼边政三十，气充骨劲耐歌呼。论文不眠僮仆怨，绝学锐讨门户孤。武昌白头财七品，冀州脱手空三都。君我尺牍互嘲弄，商量便服利走趋。季翁腹饱喜高论，彦叟病懒甘腐儒。余者群子各南北，有时一见在道途。吾党为学几途辙，丈人及我一冶炉。天津对酒电过眼，南苏望远月边湖。古时轼辙说麟凤，君家罕况真於菟。我无楚丘卜臣妾，安知方朔生龙猪。令人感激想年少，转眼老丑成颠胡。

此诗写得极为风趣，不仅生动地刻画了范当世的体貌特征与爱好秉性，抒写了朱与范的深厚情谊，还附带写了他们与张謇等友人会见时的情景，足以显示朱铭盘亦为诗坛能手。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朱铭盘积劳成疾，逝于旅顺张光前军幕，享年四十二。那时他的儿子朱骅之，还未满月。光绪二十年正月，张謇闻朱铭盘噩耗，心情极为凄惨，他在正月六日的日记中记道：“得曼君客死旅顺讯，凄惋无涯，名心益冷。”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范伯子写信给张謇，说朱铭盘之妾带着孤儿到通州，他们商定每年周济朱氏母子三十六千，除朱家从前在通州的企业中自有十千利息外，张謇承担十五千，而范伯子与顾延卿两人共承担十一千。（《张謇日记》）

金弢《范肯堂先生事略》：“先生笃念亲旧，故人泰兴朱铭盘客死，收养其寡妾孤子于家。”又金氏《江山小阁诗

文集·重编桂之华轩遗集序》：“（铭盘）歿后，其侧室赵孺人囊负以归。既而，孺人挈其孤子投依南通张季直、范肯堂两先生。”

张謇写了《祭亡友朱曼君文》：

乌乎！岁在丙子，从军江皋。后余一纪，君来为曹。洸洸庐江，风云干旄。伟余两人，河球赤刀。君气食牛，何有众豸。独余是亲，咏陶好喜。余之聪明，实非君匹。意量相资，磋磋切切。分笺写檄，昼几宵灯。同舟并轡，抵蹠揄肱。四年浦口，云龙腾腾。移军勃渚、之罘、蓬莱。弄潮宾日，三年去来。壬午东征，鲸螭撞突。君后余先，长纓短策。藩部大人，来觐揖客。谈笑方俄，旋临碣石。碣石之垠，陪京之门。将军大去，客散飘零。嗟君与余，涂轸始分。公车几年，京尘共蹋。握手伊何，载离载合。凡君相与，文场周旋。每憾而呼，莫能一先。余戏挑君，有命任焉。其闻余举，距跃斩辔。人谓君忌，岂然岂然。君雄文章，耻作常语。俾余扞弹，寸瘡必举。君或怒争，窳窳终许。其纠余文，亦若虓虎。嗟余禀赋，亦乖亦崖。君自逸宕，狎于辈侪。容相怨督，而无他怀。彼构间者，知余君哉。自尔日月，朋旧凋丧。书问往复，言之凄怆。谓宜持维，以固吾党。学道著书，梦梦天壤。方余四十，被放林丘。君寿以文，百岁绸缪。歌诗招隐，辽海东头。岂期别处，死生其休。君昔自语，少余一岁。抗颜赠君，以俶检字。比君赴来，乃生壬子。实长而下，吁嗟君只。不能疗贫，焉用奏官。著书不竟，摧肾绝肝。子呱弥月，洗以藿兰。造物之酷，何峻与顽。丧不与纪，哭不凭棺。探臆溯往，以告余酸。乌乎哀哉！尚飨！



祭文历叙朱铭盘的经历以及他与朱铭盘交往的过程，逼真地刻画了朱铭盘的性格，抒发了他与朱刻骨铭心的情谊，表述了因丧失这样的友人而锥心刺骨的苦痛。真可称得上是字字血、声声泪！

四年以后，范伯子翻检到老师送给朱铭盘的诗册时，不禁缅怀起以前的情景，写下了十分感伤的怀旧诗《题项晴轩所藏先师写与朱曼君诗册》：

一卷天人冷澹姿，摩挲重为昔言悲。薄冰未即
寒于水，已到人间彻骨时。是为吾友珍藏物，奚自
飘零到子庐。昨向长卿孤寡问，茂陵今日已无书。

张謇与范伯子，对于朱铭盘，真真体现了朋友之间生死的交谊、至高的情怀啊！

张謇与范伯子的交往，在范伯子进入李鸿章幕以后，略有疏远。但在范伯子晚年回通州后，两人仍和好如初，一起办教育，兴实业，甚至通海垦牧公司的兴办，都是出于范伯子的建议。

范伯子具有拯世济民的宏伟理想，他曾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至，与友人张謇等夜登狼山，面对浩瀚的长江，铺开他建设家乡的理想蓝图。他的《同何眉孙张季直夜登狼山宿海月处》诗写道：

江海既会声喧豗，双流竞地生民灾。狼山如閬
当江开，能喝海若惊涛回。引江入田灌万顷，此德万
古常崔嵬。何哉六籍功不纪，寻碑访碣无诗材。乃知
地亦以人重，老蚌千年珠未胎。可笑子瞻宦游懒，远
送不越金焦来。子之发源我收蓄，邈阅四姓重追陪。
何君弗谓惠泉好，持吾茗盞衔吾杯。毋言临江独私
有，从古据地争雄魁。张君吾以海东让，千岁斤卤兹

能培。一日和甘尽作稼，亦能消释胸中哀。丈夫弗假风云助，遂以白地明天才。吾皇释政后一岁，己亥冬至狼山隈。有吾三人夜秉烛，走访衲友寻初梅。会以兹山万万古，勿与五岳为陪台。

此诗竟是一份重要的近代经济史料，原来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的最初设想是诗人范伯子提出来的。此诗写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至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张謇便创建了通海垦牧公司。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张謇传》中记载道：“其通海垦牧公司，则创于庚子联军入京后。广植棉花，以供纱厂之用。场地濒海，潮汐涌决，民苦昏垫。謇先招人夫数千人，日夜赶筑长堤，一月而就。不久复为风浪所冲。深夜披衣，躬自抢救，狂风暴雨，几以身殉。其后缺口既堵，厂地才得垦植焉。由是一力经营，先后十年，田园人家，蔚成新村。”可惜范伯子早已去世，不及见此盛况。

范伯子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十病逝，初五那天，张謇在日记中写道：

闻肯堂昨吐血既许，大狼狈，亟视之，甚惫。执手附我耳语，气息仅属，始言倘不死若如何，医生言二日不更见血尚可支拄一二月，否则殆。继又言：“子长我一岁，望节劳，我可死，子不可死，幸记之。”闻之心楚……肯堂、彦升于学界皆可有协助之能力，而皆有危殆之病，故虽数十年之交，分毫不能得其助，可痛也！

闻肯堂此次自编诗文已成。论其诗文，非独吾州二百五十年来无此手笔，即与并世英杰相衡，亦未容多让……要其大段明白公理，尚非他文人所能及也。



由此可见张謇对范伯子感情之深，对其诗文评价之高，张謇诗文受范影响之深刻是显而易见的。此后范转到上海去治疗。张謇在初十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申刻闻肯堂以寅刻卒于上海，为之怆痛！是日散学。”

范伯子逝后，张謇曾写过不少悼念诗，而挽联写得尤其沉痛：

万方多难，侨札之分几人，折栋崩榱，今后谁同将压惧；

千载相关，张范之交再见，素车白马，死生重为永辞哀。

张謇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他的挚友，在《剑山规建文殊院感怀范伯子二首》之二中写道：

少年怜范大，骑马一同登。不作重泉友，还悲百岁僧。
徙江鼉跋扈，捐树隼凭陵。头白谁相慰，依山奉佛能。

由此可见范伯子在张謇心目中的地位。

支持变法新政 痛悼遇难英烈

范伯子具有维新思想，“颇主用泰西新学以强国阜民”（马其昶《〈范伯子文集〉序》）。陈三立《〈范伯子文集〉序》也说：“君虽若文士，好言经世，究中外之务。其后更甲午、戊戌、庚子之变，益慕泰西学说，愤生平所习无实用，昌言贱之，岁时会金陵，稍喜接乘时之彦及号尸新学者，下上其议论。余尝引梅圣俞‘谈兵究弊义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之句以谑之，君复抚掌为笑也。”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广东巡抚许振祿为了响应变法聘请范伯子入幕。去广东前，范伯子曾与知州汪树堂、张謇在水心亭宴集，写有《将之广东，与州牧汪君及季直宴集水心亭，用得谿观汪君之雅意，并有慨于席间所谈，赋赠三首》，第三首说：

海舶朝停午市哗，纷然时局已如麻。君犹欲稳
中流舵，我乃愁无下泽车。举足便应身似梗，当筵
犹喜藕能花。行吟坐啸皆无赖，且把无涯作有涯。

虽然感到时局如麻，“且把无涯作有涯”，范伯子仍然愿去广东一试身手。可是，当他到达广东时，变法已经失败，支



持新法的许仙屏已被罢官。范伯子相当失望，他在《余以许仙屏中丞促赴广东，至则渠以裁官去矣，初宴赋赠二首》中悲叹“翕合文章真欲涕，迷离家国更何言”。又在《七月三十日叠韵书怀》写道：

今日普天还旧政，先生所挟亦何之。平生为口无多望，逆旅惊心又一时。人去谁怜屋乌好，诗成愁有蜚龙知。无言百怪生南海，赤县神州遍陆离。

“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范伯子在《为庄秉瀚题其外祖张仲远先生道光戊戌〈海客琴樽图〉，因有感于时事，即以砭庄生之狂》之二二中写道：“卧闻燕市前宵雪，坐觉羊城八月霜。为爱迁书语杨幼，人间无地著哀伤。”以雪霜比喻慈禧的酷政。西汉杨恽，字子幼。司马迁《史记》：“杨恽自喜知人，居众人中常与人颜色……到五凤四年，作为妖言，大逆罪腰斩。”范伯子将康、梁比成杨恽，说六君子由于听信了康、梁的妖言，造成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哀。

重阳节，范伯子登上广州白云山最高处，与山僧能仁谈了很久，他在《九日登白云山最高处吊燕市诸人》诗中写道：

千里百里风，凄迷自成俗。只有飘飞万里身，走入众中无缚束。一岁两岁间，沿缘递歌哭。只有埋藏百岁人，每日看山犹不足。我行亦何意，忽在天南头。登高作重九，遂入番山幽。四山丹堊尽邱陇，壮者或是公与侯。能仁一寺在山罅，门前豁见江天秋。田畴蓊然稻三熟，甿户饱暖真无愁。何哉粤人好作乱？辄出扰我东南州。人之有才不自己，仍视风俗为刚柔。寻常圣与盗，截然如异才。藉令易置

之，何必如是哉！水土浸淫耳目染，敢作狂欺蹈深险。风之所至众趋之，飞蛾历历投凶焰。嗟哉谁是奸人雄！岂有大略烦诸公。眼前寂寞不可耐，使我哀吟空如中。

凭吊六君子，对六君子充满同情，再次批判康、梁，称他们是奸人雄，认为六君子是“风之所至众趋之，飞蛾历历投凶焰”。范伯子对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充分肯定，对六君子的献身充满同情，而又对康、梁进行严厉的批判，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是十分独到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一周年，范伯子与沈瑜庆在上海怀念被害的六君子之一林旭。范伯子悲痛至极，赠诗一首，题为《与沈爱沧兄念其女婿林瞰谷，而有去年今日之叹，爱沧亦泫然，诵此二十八字，以同余悲，遂赠一首》。诗中写道：

问我诗怀已泪零，去年今日更堪听。陆沈风雨桃花面，小照乾坤腐草萤。百不相谋成沆瀣，万无可说况零丁。侯官太保遗风在，聊与苍茫泣素馨。

林旭（1875—1898），字瞰谷，福建侯官人。光绪十九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参与新政，赏四品衔军机章京。政变被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有《晚翠轩诗集》。范伯子在《近代诸家诗评》中评论林旭说：“瞰谷纵不与六君子之难而永其年，亦将以诗人名世。”

林旭的妻子沈鹊（孟雅）是沈瑜庆的女儿，而沈母又是林则徐的女儿，所以诗中有“侯官太保遗风”之句，因为林则徐曾加太子太保衔。

又有《余至上海，晤敬如，适亦遭兄丧，泫然相吊，不遑问他事，徒见其索债者盈门，为解纷而已，已而流连至重九



稍复，感时论事，谋遣两家子同就西塾，登高遣哀作诗相慰喻，余次其韵》：

自古骚人易感秋，那知今日更无愁。云霞幻此无边壑，天地翻如不系舟。花鸟嫣然吾老矣，稻鱼足否子归休。余生莫奈怀忠孝，奴虏公侯不可求。

竟作诗人已可哀，催租例与兴俱来。壶中日月千年祚，云里金银万丈台。洒血且完前死事，搏心更拓后生才。同怀尔我今无让，投老藿盐亦壮哉。

两年以后，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又写有《八月十二夜乘车至港，念昔秋去沪，而今春返，皆无几时，世变遂已至极，感痛不可以言，诗以记候》：

急火炊梁梁不熟，大千糜烂一何神。可怜目断前星日，亦是身游太古晨。乡土终为覆巢卵，饔飧犹累倚闾人。凉风八月宵如昨，一往无由问屈伸。

国事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人民（包括他个人）也都成了覆巢之卵，饔飧难继，无法赡养双亲，真是令人伤心透了！

父命难违捐官 高堂苦心可悯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张謇状元及第。这一年，范伯子迫于父命，捐资为光禄寺署正，官阶是从六品。但这仅是一个虚衔，可以免除一点捐税劳役的负担，并无实职。

《南通县志》载：“謇成进士之年，当世即纳资为光禄寺署正。文忠与瑞安黄先生积午其论当世兹事一庄一谐，当世闻之，夷然不措意也。”

范伯子对待名利极其淡泊，光绪十七年三月，他在《与三弟范铠书》中说：“大人累书迫我捐官，命截留束修，凑集其事。我皆权词以对，现寄出两书中犹有此语。此皆不熟悉外间情形之故，且此刻亦乌暇及此耶？……我家此时从何处集此巨款，以千金捐中书哉？大凡我及父亲于名利两途皆迂缓不善谋，看是失却无穷机会，然又安知不培成几许元气？总之，照现局面，心安理得平平走去，于人世所享用之数，亦算中上矣，毋汲汲也。”但父命难违，结果还是捐了。他父亲也是想改变一下家庭的贫困命运，但从下面的事迹中又可看出其为人品德。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范钟、范铠考取进士。范钟去河南当知县官，范铠去山东当知县官。范钟兄弟赴任前，封翁亲书



《作吏十规》作为警戒：

今日儿辈初登仕版，束装就道，签分河南、山东为民父母矣，而家贫亲老，难言养志，实有毛义捧檄之欢。但吾七二衰年，不任驰驱，恒惧十世一经，至汝兄弟得以两县知用，此皆祖宗积德之余庆也。喜忧交集，顿兼之矣。喜者，喜汝兄弟得以成立；忧者，忧其造福少而造祸多也。然汝兄弟自幼至长，熟闻祖父遗训，必能借此造福，保养元气，则寒门百世可沿矣。戒之！慎之！今吾亲书作吏十规以示之，亦防微杜渐之苦心云耳。

——为民父母，不能培养元气以遗子孙，最可耻。

——依托权门，一旦失势，以至十目十手之指视，最可耻。

——地方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最可耻。

——宦游无窘于难，天道好还，此往彼来，最可耻。

——地方善政不能举，逢迎上官则恐后，最可耻。

——眼前百姓即儿孙，而任情敲扑，最可耻。

——小民无知，误蹈法网而问官不察，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最可耻。

——为民父母者，第一戒贪，贪则心昧，而书役借此挟制舞文，其祸可堪言哉？最可耻。

——天下事诚与伪二者而已，诚则无不明，而伪则立败，最可耻。

——作官须知进退，若老马恋栈，阿时殃民，必至身败名裂，辱及君亲，最可耻也。

封翁又写有勉励兄弟二人的对联：

治民犹水情无逆；
作吏能清意自慈。

自序：“吾家本儒素，今儿辈为民父母，特拟此十四字以勖之。”

封翁又有给范铠的诗说：“他时日日为民计，竹帛留名百世欢。”（转引自范铠《范季子文集》卷二《与友人书》）

但兄弟二人还未就职，他父亲就因病在通州去世，讣告又将他们召回。真是可悲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范伯子从广州经过上海回通州。几天后，他父亲范荫堂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有《未信斋稿》藏于家。范伯子因过于哀痛，后来竟得了肺病。

关于范荫堂的为人，周彦升《寿恺堂集》卷二十五《孝子范公诔》说：“公性好施，惠及孀独；方公既歿，有友来哭；谓岁之晏，公有所属；朱提四流，为饿者粥。公于是时，盎无余蓄；胡来多金，膏不自沃；无令人寒，宁衣无复；无令人饥，宁食无肉；善恐人知，友乃大服。”由此可见他的苦心孤诣。



范张联手创业 教育实业并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创办大生纱厂。

《啬翁自订年谱》：“三月，与两江总督新宁刘峴庄坤一议兴通州纱厂。先是南皮（按：指张之洞）以中日马关约有许日人内地设工厂语，谋自设厂，江南北苏州、通州各一，苏任陆凤石润庠，通任余，各设公司，集资提倡，此殆南皮于学会求实地进行之法。”

张謇这一年有《纪梦》文，文中写道：“范子肯堂，吾总角友也。清同光之际，余客于江宁，岁杪必归省，归则肯堂必来视余，信宿柳西草堂，谈两三昼夜而去。乙亥、丙子间，一日肯堂来，住草堂，晨起，忽笑谓余：‘子他日常有异！我昨见子于一至宏广之楼，服役皆少女，往来蹀躞。余怪其侈，诘焉。子曰：是皆木人，动转行止以机揆者。余益怪，审视果然。他日子岂有是乎？’及余营纺厂，开幕数月，肯堂至厂话旧，述此梦，相视而笑。中国纺织，女子事也。厂机一碇所出纱，当四五女子。四万碇则当女子十六七万人，日役十六七万人，宁非异者？”由此可见，张謇与范伯子，早就有了创办纺纱厂的理想了。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张謇的纱厂在南通首次

试机。

范伯子后来写有《题许黄竹独坐观书图》诗：“吾友张苍者，乡邦小试来。艰难谁得喻，镇定亦须才。孰信蚩氓意，真如蛮俗哀。凭君手中籍，重与辟蒿莱。”诗后自注：“季直创设通州棉纱公司，许其司籍之一。”范伯子认为张謇办厂，是为民“辟蒿莱”。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底，范伯子去淮安为葬父筹款，因为沈瑜庆当时主官淮扬道，又跟新任运使程仪洛商议修纂《盐法志》，可得三千酬金，但没有成功。

范伯子到淮安才两天，通州知州汪树堂就来电，聘请范伯子回通州担任东渐书院山长。原来是东渐书院原山长孙赞清（穆如）去世了，故请范伯子掌教东渐书院。东渐书院，同治七年（1686）知州梁悦馨创建于四甲坝通源镇东首。这是笔者的家乡，笔者从小即听老一辈讲，东渐书院办得极好，培养了许多人才，故而声名远扬。

同时，王梦湘来主持紫琅书院。紫琅书院是南通当时最大的书院。乾隆十年（1745），知州董权文倡建没有成功，直到乾隆三十一年知州沈雯请得巡抚拨田，又由当地乡绅赞助，才得以建成。光绪二十八年，以紫琅书院为校址，建立高等小学后，紫琅书院才废除。王梦湘与范伯子诗篇往来，成为莫逆之交。

当时，范伯子就写有《梦湘来主紫琅书院，余亦从淮上归主东渐，梦湘颇为我州主校，州试不即见，见其和潜之诗海南别后苦语填膺，聊以句先，兼呈我州主》：

许公席上三年别，地塌天旋有再遭。尔我饥寒真緼事，后先仓猝为劬劳。何期兀者来分鲁，得见髯翁再和陶。愁绪满膺言话隔，犹闻辛苦佐牛刀。

诗中抒写了能为教育事业而劬劳感到高兴的心情。他又在



《潜之见余倒韵诗，复顺和见示，而盛以文学教授之事相推，以百忙中再依韵奉答，并呈梦湘》写道：

故技终莫捐，教授若醇饮。

范伯子将从事教育工作当做“醇饮”，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热爱教育事业啊！他在《刘旭初之母寿序》中也谈到：“万品之差，皆源于质性而成于学，此学校之所以当兴而女教之所以尤汲汲也。”

范伯子对于当时新兴的教育体制是十分赞成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白振民推荐他儿子范况报考南洋公学特科班，他在《与三弟范铠书》中说：“南洋公学设特班，招中学已成之生，待之如师范之礼，但专学不给修耳。白振民已荐楔儿，此事大妙。”当时南洋公学新设的特班，课程有英文、政治、理财等，为以后保送经济特科作准备。蔡元培任特班总教习。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张謇筹办垦牧公司，招股二十二万。张謇竭力劝范伯子节省开支，尽量多多入股。范伯子借了五百金入五股，又虚挂五股，答应以后继续交钱。陈三立也听从范伯子的意见投入一百股。

八月，清朝廷命令各省在省城以及所属府州县筹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当年七月，即已颁行《学堂章程》，分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养学堂，大致采用日本学制。

这段时间，范伯子的教育工作特别繁忙。他在给三弟的信中说：“东渐卷如山积，又楼又病倒，学台按临在即，我每起即会客，有至天黑不休者……”

范伯子不仅对西方的学制极为赞同，对西方的学术也极其欣赏。他在《答桂生书》中说：“我之今日，乃独皇然于西学之合乎天理周乎人事，而视我向者之所为几不成其为

学，且其为道深博无涯涘，断断不尽于已译之书，而年老舌钝，不复能往而自求，则因以责之于吾子，望之于吾徒。如秦皇汉武之所谓三神山未能至而必欲甘心焉者，殊可笑也。”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南通千佛寺前殿被火烧掉。范伯子与张謇商谈筹建通州学堂事。二月，刘坤一邀请张謇商议办学的次序，张謇认为应先办师范与中小学，一些地方官都加以拦阻。张謇就与罗振玉、汤寿潜商量后，自立通州师范。其资金来源是大生纱厂六年以来的两万元利润再加上其他友人赞助的一万多元。

这期间，范伯子还曾去泰兴参观过泰兴小学堂。

四月一日，张謇垦牧总公司建筑开工。

范伯子与张謇在当时办学颇受地方保守落后的豪绅旧势力的阻拦与蓄意破坏。范伯子在《与三弟范铠书》中说：

“现在大事，则我欲截现存庚子一届宾兴之半四千五百千开办学堂，启告闾学，谓无人挠我也，而不意顾氏父子（按：指顾兰升、顾育李父子）公然鼓动数十百人与我为难。我恨其太鄙，立挟又楼与我先自承捐五百千作为我欲分大生厂之红，向季直借二千千，合此二千五百千，再向剑星不拘何项借拨二千五百千，有此五千千抵半宾兴，让彼辈发财而我于学堂得自主矣，无人能过我而问者矣，岂非快事！”

王锡韩《蜷学庐联话》也记载：“光绪辛丑，办学令下，肯堂先生与张季直殿撰谋所以创始者，拟将邑中旧有书院及乡会试宾兴存款移拨提用，作为开办经费，而先由先生启告邑人。邑人大噪，竟集矢先生，先生一日得匿名书盈寸。”

范伯子写有一诗，题为：“余以经营学堂启告乡人，谋所以肇始者，一日而得匿名书盈寸，纷晓所在成聚，皆集矢于余身，良用悲惋。梦湘山长乃以《独游军山》诗相示。余因感其地为先勋卿公明季逃禅之所，其说谓‘吾多年老寡妇，岂复向人，而一日不受吏，则徒苦吾民’，遂去之军山，与尧封



老人辈讲佛法焉。此通州所以保全至今也。先人不争世名而常为一乡受难，区区亦惟先志是从耳。爰即次韵述怀，以呈教于山长及州主。”诗中写道：

朝来火焰烧城红，真若事大天穹窿。岂知情怀冷如水，乃有避世王墙东。偶念登山足目举，往即旧约途宁穷。而我谋须众然否？那弗即事忧心冲。弥天海气蒸腾虹，披拂正赖高柯风。儒林无人日月蚀，何但大庇言成空。南山幽窅处，藏龙有深硿。仙人所植桂，散馥一丛丛。胡不饮泉涤毛骨，常使壮发如青葱。而忍将身堕尘雾，永与俗子争冥蒙。嗟君所涉最高顶，先祖放旷兹焉同。明都当时一再没，林下旧隐成痴聋。八十老翁客气尽，弗用民命贪天功。遂保兹方越十世，但见乐土天光融。我今实亦爱其类，恐遂茫昧千年终。圣皇忧勤日有诏，敬告海内毋雕虫。官师贤能眼如炬，奚以若辈犹昏瞳。欲偷天酒浑难得，莫把松容掩醉枫。（诗人自注：杨万里诗：“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学堂之纷晓，盖有若松枫之类。依韵成词，乃得善喻。小枫何足道？孤松为可怪耳！）

范伯子表示要继承先祖为一乡受难之志，坚决抵御一切阻挠与破坏，办好学堂，表达了范伯子热爱教育事业的情怀，并对保守豪绅及地方官僚提出严厉的责问。

五月十五日，范伯子与陈敬夫、李磐硕、张謇等在延寿阁聚餐会谈，规划小学校校的校址。

七月，通州师范学校动工兴建。《蒿翁自订年谱》卷下：“规定就千佛寺址而广之，于西南水中填增地四之一，建师范学校；采日本学校建筑法，自绘图度工为之。”

范伯子与张师江等建高等小学，并商量将盐义废仓作

为中学校，他在《与三弟范铠书》信中说：“又兄（按：指张师江，字又楼）病已豁然，出与吾共学堂事也。开办费大难，全州与我为敌。然事已小定，得开办费八千余金，年费三千余金，吾凝谋诸香缘，必于花布正捐中留支少许，事乃可放心。季直则独任私立师范学堂……与吾所为官绅合办之通州小学堂相足相成，而明定界限，各不相制。然师范学堂，我亦任出力也。”又说：“我请以东渐书院改为东渐小学堂，事归磐硕，则吾馆亦即推与之。梦湘紫琅馆其势亦当归吾，吾并不预计，此刻但任总理耳。”

范伯子竭尽全力创办教育，他的三弟范铠也曾有所论述，《上胡鼎臣方伯书》中说：“张殿撰（按：指张謇）志实业以兴民利，当世志教育以正人材，其勤心于其事也，皆极憔悴专一，多方以求济。推其诚之所到，惟孝子之奉病父始足相喻焉耳，然皆远于荣利而畏于昏浊。”

八月，范伯子专程去江宁，考察、询问有关办学的事。在明震席上，会见日本嘉纳治五郎，请教办小学校的事宜。江安道孙观察总办江南学堂，范伯子想要向他询问，正好碰上他去监试，未能见面，范伯子深感遗憾。李有棻请范伯子总理译书局的事，范因挂念州小学的事而未立即就任，直到年底才就任，但仍在紫琅掌教。

十二月二十七日，通州小学校破土，计划来春初十开工。

范伯子有与吴汝纶书，询问吴氏东游日本考察办学之成果，吴汝纶有回信，信中说：“来示乡邑学校齐民所有事，学子之初级，蒙意不然。齐民所有事学子之初级，乃西国所谓普通小学。吾国教法未定，教师难得，一时尚难遍立。若乃一县所立之小学校，岂得专教此等？《汉志》所云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以学年分大小，今西国所谓小学大学者也；所云诸侯岁贡少学之贤者于天子，学于大学，此以学地分大小，今吾所谓京城大学州县小学者也，不得



合并为一事。西国小学专教九岁以下之幼童，无一人不入学，故可曰齐民所有事学子之初级。州县虽小，百里之内必多能入大学之人，美国大学数十区者以此，岂得一县之大立一小学堂，仅教九岁以下之幼童哉？然则造育之道，京师乡县一而已。”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范伯子在通州就文昌宫设筹议学费公所，参与者李磐硕、张謇。范有诗，诗题是《筹议学费初集，余病困不能多言，卧听磐硕、季直二君谈，默然赞之》。诗中特别写道：“嗟兹巨事山难任，嗟彼苦心河水深。行行且无畏，事大不如心。”带病与会，百折不回，令人感动！

南京三江师范聘请范伯子当总教习，虽薪金很高，但仍被拒绝，三月二十一日，范伯子有《与夫人书》，信中说：“南京请我为三江师范总教习，大概二百金一月，却将吾总纂一席挪与伯严，此几都一无可却者，然我有几层必不可就。就此则通州事永废，一也。又学生易教，教习难教；三江所考取教员皆乌合之众，而将用为师范之师，仗总教习一年之陶熔，至开学之时而分派。我无仙法，何以成功，此必不可就者二也。再则，我与湖北党为反对，而魏午帅（按：指魏光燾）聘范明经为总教习，且煌煌见于《汉口日报》中，就此席，湖北党必将腾谤。盖三江学堂即其党首张之洞所为，张之宗旨主于以教习归总办节制，不立总教习之名，曾与管学争执，而管学大臣坚持不许者也。魏聘我必非张所喜，汉报不知而夸美焉。故我见几而虑远，必不就聘三也。有此三层，吾故决不劳扰此事，安心在家阅课建学堂，兼定编书条例。”

四月一日，在通州师范学校开校典礼上，范伯子演说建学宗旨。

范伯子的《通州小学堂宗旨》全文如下：

学堂何为而作耶？皇上惩甲午庚子之屡败，变法求强而决然行之者也。夫争强莫如以兵，强兵莫如以富，何为而必出于学？曰：此其先务也。兵且有兵学焉，富且有农工商之各学焉，自今无一事可以不学，此特其普通之初级耳。选学童而为之者，盖曰立国必资乎人才，而培才当始于子弟；立教必遍乎全国，而变国莫先于秀民也。凡为学堂之大纲有三：智育、体育、德育是也。一事也，人国妇孺之所知，而我之老宿不知。一名也，人国仆隶之所谙，而我之公卿不谙。虽欲开通全国，其道无由，此谓智弱。人皆廉信而好洁，我独贪诈而喜污，大而服官行军名实之间，小而日用道路之际，常被外人之耻笑，而曾不自知其所由然也，此谓德弱。人民之精神，国家之血脉也，人国合兵民文武为一，而我以好勇尚力为羞，勤惰之习分，坚脆之形成，不待临戎而胜负决矣，此谓体弱。皇上愤欲变此三弱者而转为强，则举天下之士农工商概纳之于学，然则遂用西法耶？非也！凡为智育者，智之事也；凡为德育者，仁之事也；凡为体育者，勇之事也。此中庸所谓三德也，而且有书数焉，智育类也；有礼乐焉，德育类也；有射御焉，体育类也。此孔子所谓六艺也。三德之所弥纶，六艺之所扩充，而一义行乎其中焉。一义非他，忠爱是也。去家庭之教育，受国家之教育，凡以为国家用也。修身人群，以讲求一群之公理，而后可以敌他人之大群，此在各国之立学莫不皆然，而况皇上含积年之痛，洞然于全国腐败之故，猝欲与人争而不可得，则不得不沉思一往望之于学堂者乎？是故学者非尽去其故以与万国求新不足称皇上之意，而苟不惟本之求而逐其末，忘乎内之痛而慕于外，则尽驱人适异国可耳，何贵乎有学



堂也。顾为学堂之条例则甚难矣!自中国外各国之人无不学者,约计其学年,则四五岁所居曰蒙学校,七岁至十三岁皆谓之小学校,而有寻常高等之分。十四岁至二十岁皆谓之中学校,而有寻常高等之分。过此则分科大学校终焉。人一千而上,居学校且二十年,而秩序厘然不可紊。今明诏所谓州县小学堂,盖人国十一二岁之高等小学校也,而寻常之阶级未经,并宜有十岁以前之事,顾其所选为文法较优之学童,此即不容以年限,而术之当改,知此者才十二三焉,猝语高深,既茫然有所未喻,概从浅易,复傲然自谓已知。且群经为圣哲之归,法宜至中学始为深语,而未免滋守旧者之疑。外国语亦专门之一,法宜待中学始议博通,而无以饫求新者之望,缘俗情之可否而迁就之,是谓苟且。苟且不可为也,度事理之行否而变通之,是谓权宜,权宜不可不慎也。州虽小,乃天下之积;学堂虽小,居众学之先,自我为之敢不重耶?是以警念皇上变法之苦心,推原圣人立教之本旨,务俾诸生开通良知,以受众美,毋若俗士矜惜旧习而塞新机。我亦数十年读书之人,曾无一二端为国之用,兹为可痛,岂容讳哉!勉竭愚诚,以定宗旨,且设为十目,于普通亦备专门,酌分数班,由寻常而至高等,但使进而能接大中学堂之程度,而退不失为蒙养学堂之楷模,斯已尔。

办学堂是光绪变法维新中极重要的一项。“百日维新”虽已失败,但办学堂不容全盘否定。范伯子与张謇抓住了这一契机,锲而不舍,在当时真是难能可贵!宗旨强调德、智、体三育从孔子时即已开始,这更堵塞住守旧者之口。这个宗旨既吸收了西学中先进的部分,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在当

时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范伯子赴江宁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任。这时,他身兼三职:既是通州小学堂校长,又是三江师范总教习,并领江楚译书局总纂。由于过分操劳,终于在冬至前一日病。他的三弟范铠在《上胡鼎臣方伯书》中写道:“当世,一江南廩贡生耳,徒以学行与桐城吴挚甫夙昔并名,为北方学者所信倚。尝居李文忠幕府任教诸子,未尝一侧于荐牍而颇负李党之名。归而主教于敝州,创州邑中小学堂,复主三江师范总教习,并领江楚译书局总纂,业尽心为之更良矣。”

范伯子在《与夫人书》中说:“夫人愁我发病,我恰以冬至前一日左半头复肿,天花板亦方肿,至四五分宽。熬煎一日,痛不可复忍,则坐起而哭。忽齿舌间觉咸水溢出,吐之乃齿缝之血水也。盖因哭一荡决而涨于破,痛即立减,居然吃饭夜如常,其病若失矣。吾病久,已习知状,虚阳上炎,血随气升,向坏齿一边奔突而出,此为确情。又吾脚痛往往在睡酣之后,日久体认,确系炭气充塞,养气不足之故,故或时昂头被外,调息久之,依然能睡,或即因睡已足而起,则半点钟后痛即渐忘矣。此全系肺家因由,不关他事。”由此可见范伯子病情已较重,还如此坚持工作,真使人肃然起敬。

十一月十六日,范伯子做东宴请三江学堂日籍教习,并发表演说。他在《与夫人书》中写道:“吾又有一乐事告夫人、弟者,日本十一人直蔑视学堂诸公,无一人上眼。吾甚悲之。吾病至初九全好,进堂三日,自十二至十六即日本过年假期。吾意总办必有宴会,至十四日寂然。吾乃约张会叔具帖请十六金陵春晚饭。至期,欣然皆来。吾入座时演说一番,其总教菊池真如暗室见赤日,喜形于面,敬谨演答,连翻译十四人皆肃立久之然后坐。其后一一与我问答,以至终席。各教员并多离座致殷勤者,以两总教有平行之身



分，而各人益加敬也。昨日开学，菊池遂向总办言范总教之可敬，三江独得人矣云云。总办但喜述而莫名其妙。此吾为国争体面之一事，夫人、弟闻之必欣欣也。”范伯子的爱国之情，跃然可见！

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范伯子整理好了自己的诗集。所以，现存《范伯子诗集》十九卷是他自己编的，且采用编年体，颇便于我们使用。

五月二十五日，张謇生日，置酒师范学校寿松堂，请范伯子参加生日宴。范伯子写有《五月二十五日为季直生日，叔俨来为置酒，召朋旧，因道畴曩，感成二诗并寄陈子琚》：

记否南山下，先春并马行。卅年为一世，双笑送平生。得闲还思旧，临觞尚有兄。开轩吾病减，山翠复纵横。

嬉戏各同味，中年道路分。子能达初志，吾尚抱空文。削迹论生事，长嘘念故群。陈生终健者，临老百分勤。

当时范伯子病情已较重，故在回忆三十多年的友情时颇有悲凉气息。

九月十四日，范伯子带病乘船去张謇家，十七日是张謇父亲逝世十周年忌日，范伯子致祭，瞻拜遗容，写有《润之世丈归道山十年，过拜遗容，感呈叔俨季直》诗：

行年二十嬉娱地，蔑觥柴车岁岁连。茧足更为贤母痛，疏才独受丈人怜。漂流蓬梗长千里，怅望松楸又十年。纵向遗容拼衰病，当时儿子亦华颠。

回忆他在少年时期到张家做客时受到张謇父母亲关爱的情景，但尾联想到自己的衰病，情绪仍然很低落。

十八日，范伯子回家时集句联赠给张謇：“学成师范，缙

绅归慕；独持风裁，声名自高。”充分赞扬张謇的事业有成，也体现了范伯子对张謇的厚望。

十二月初十，范伯子大吐血，逝世于上海医院，年仅五十一岁。陈三立诗《挽肯堂先生》自注说：“范先生病亟时，有劝其归者。先生曰：归死、客死等耳，奚为故乡、为道路乎？”显示了他是多么洒脱啊！灵柩返通后，张謇、刘桂馨、白作霖等为他经理丧事。

总之，范伯子与张謇联手创办实业与教育，成绩辉煌，影响深远。陈三立有《哭范肯堂》五古三首，其中一首写道：“通州弹丸耳，名以张范辈。张氏营实业，农商炫区内。范氏专教育，空拳办兹事。子当寝疾甚，喘吃惧失坠。弥缝挽天亡，辛勤扶土类。其精贯物变，下牖无穷世。颠飙扫万灵，姝姝垂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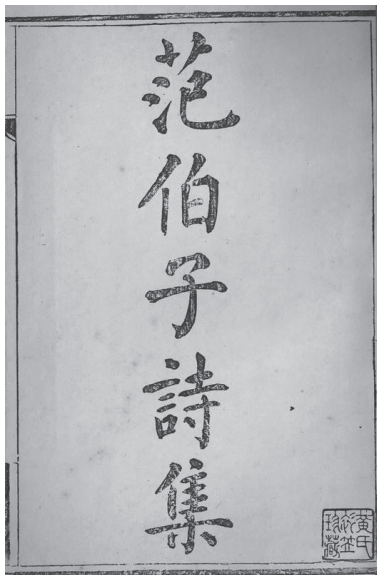


同光诗派中坚 纵横近代诗坛

古人所宝文章境，岂与小夫争俄顷。

对面相看泰华低，发声一奏雷霆静！

——《星涛席上叠韵奉诒兼待逊庵兄至》



光绪戊申刻本《范伯子诗集》书影

诗人宏视阔步，睥睨一切，显示了他纵横驰骋于近代诗坛的不可拘勒的豪迈气概！这绝非大言哗众、傲气骄人，而是诗人自信心十足的自然流露。钱仲联教授在《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一文中说：“到了同治光绪年代，以陈三立为首的同光派诗人，展开了宋诗运动，在江苏的一面旗帜是范当世。”又说：“当世诗雄才大笔，浩气盘旋，与其他同光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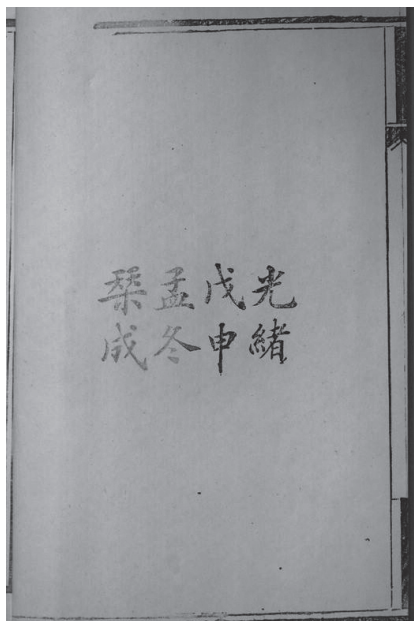
诗人以僻涩尖新取胜的不同。内容也比较能反映现实……近人论同光体诗，笼统地贬斥为形式主义文学，范当世的作品，正好有力地否定了这一不公平的论断。”事实胜于雄辩，范伯子是同光诗派的中坚，他的诗歌成就决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任谁也否定不了。

范伯子诗歌的深厚功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深厚的家学渊源。当然，也得力于他的广取博采，好学不倦：“初闻《艺概》于兴化刘融斋（熙载）先生，既受诗古文法于武昌张廉卿（裕钊）先生，而北游冀州则桐城吴挚父（汝纶）先生实为之主。从讨论既久，颇因窥见李、杜、韩、苏、黄之所以为诗，非夫世之所能尽为也。而于李诗独尝三复。”（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后又得桐城姚鼐五世孙女姚倚云为其继室。姚倚云颇有诗才，著有《蕴素轩诗集》，夫妻唱和，切磋诗艺，伯子颇得其助。姚倚云之弟姚永概，也是近代诗坛著名诗人，有《慎宜轩诗集》，其诗秀爽警炼，沉郁顿挫，语必生新，志在独造。姚永概不时与其姊夫范伯子讨论诗艺，互有影响。范伯子在《更为秉瀚题仲远先生〈比屋连吟图〉，依梅伯言同风二韵作四绝，呈其尊父心嘉司马》第四首中承认他的诗深受姚氏姐弟的影响：“桐城派与阳湖派，未见姚张有异同。我与心嘉成一笑，各从妇氏数门风。”

后来范伯子又因嫁女给江西陈氏，与同光派的魁首陈三立成了亲家，不断唱和、研讨，从而使范伯子的诗更上一层楼。

钱仲联在《近代诗三百首》中介绍曾国藩时说：“他是晚清诗坛宋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影响极大。理论上倡为‘机神说’，继承和发展了姚鼐提倡黄庭坚诗的主张，写作上与同时的郑珍以学习韩愈、黄庭坚为主，对同光以来范当世、陈三立等人的写作有影响。”

范伯子的老师吴汝纶评论他的诗说：“眼中不羁人，天赋实宏放。高步骋天衢，逸气凌苍莽。回翔翎鬣劲，决起风



光绪戊申刻本《范伯子诗集》书影

云壮”（《范君大作，弟侄皆有和章，老夫亦不能再嘿，勉成一首》），

“邂逅陶谢手，摇豪方竞爽”（《酬张采南兼呈肯堂》），“羔雁得范子，大音无细响。散声入混茫，譬挹西山爽。三年苦独唱，空结千岁想。”（《诸公倒用前韵要和勉答盛望》）吴汝纶还有“以为合李（白）、杜（甫）为一手”（《与荫堂封翁书》）

的评语。夏敬观在《读〈范伯子诗集〉竟题其

后》诗中说：“伯子平生龙鹤气，蜿蜒夭矫入篇中。能教天下翕然变，岂谓其文穷始工。齐楚大邦真不愧，同光诸士问谁雄？诗葩骚艳多疑义，犹及生前一折衷。”俞明震在《读范肯堂遗集怆然赋此》诗中说：“君诗大国土，未屑计边幅。精神在苍莽，万象生断续。放笔夺天机，育然龙象伏。”范诗“高步骋天衢”，“大音无细响”，具有龙鹤之气，具有泱泱大国的风度，像李白一样天马行空，像杜甫一样博大宏放，称他为同光诗派的中坚，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评论范伯子的诗说：“盘空硬语真能健，绪论能窥万物根。玩月诗篇成绝唱，苏黄至竟有渊源。”金弮《范肯堂先生事略》中也说：“世之称先生诗者，谓先生盖合东坡、山谷为一人也。”

的确，范伯子最崇拜的古代诗人是苏东坡。光绪九年

(1883)五月,范伯子的船经过湖北黄冈赤壁,有《过赤壁下》诗:“江水汤汤五千里,苏家发源我家收。东坡下游我上溯,慌忽遇之江中流。不遇此公一长啸,无人知我临高秋。公之精灵抱明月,照见我心无限愁。”后来在《题张氏墓图》中又写道:“昔者吾乘大江而下浮,至于武、黄之间,望子之故山而观于赤壁,诵昔人之遗文,独叹苏子瞻之在斯也,乃时时乘风雨渡江与王齐万、吴亮采之徒流连风景,往复不休……”《除夕诗狂自遣》诗又写道:“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道健,山谷比我多一炼。惟有参之放炼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吴(伟业)王(士禛)班。”由此可见,即使对于最崇拜的人,也只是通过学习吸取其优长之处,而绝不是依样画葫芦地去模仿。

光绪十九年八月中秋,范伯子有《与俞恪士书》。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内务大臣,清末任南京路矿学堂总办、甘肃提学使。为苦吟诗人,有《觚庵诗存》四卷。当时俞明震在京师,郁郁不得志,范伯子写了这封信并寄近作十四首去安慰他。因俞明震评论范伯子的诗时认为范“遁入苏黄一派”,因而范伯子辩论说:“恪士,凡事亦适可而止,善师吾意所贵乎文学者,岂不以自娱其身耶?吾诗其实无意于学人,出手类苏黄,亦所谓近焉者。然恪士愿吾取其所能而矫之,此亦极意自娱,何为而不可?故吾已深守此言矣。抑愿恪士守吾言者,无为尊唐薄宋,蹈明人之陋习。且彼明人,何尝不说到做到,何尝不有绝特过人处,而何以卒不逮苏黄诸君子耶?此道有焉:依人与自立不同,为己与为人之各别也。不但如此,文章有世代为之限,贤豪之兴,心气万古一源,皮色判别殊绝,五六百年间,薄近代之所为而力求复古者,未有不流于伪俗者也。此则恪士之所通知,恪士之所与吾辨,不在古近而在难易,吾岂不知?然亦恐一意求



难，其弊亦有时而近于复古，且‘遁入苏黄一派’六字，诚不能无病，吾不可以不辨。”特别强调诗歌创作应当独创，反对模拟，反对复古，反对明朝人尊唐薄宋的门户之见。

实际上，范伯子曾广泛地学习了李白、杜甫、韩愈、孟郊、苏轼、黄庭坚、曾国藩的诗歌，还旁及白居易、李商隐、陆龟蒙、欧阳修、陈师道、陆游、元好问、高启等。这仅从他的诗题即可见一斑。他有《戏题白香山诗集》《穷十宵之力读竟义山诗用外舅偶成韵》《拟陆鲁望〈渔具诗〉》《戏书欧公〈答梅圣俞莫饮酒〉诗后即效其体》《和叔节次韵陈后山〈秋怀〉十首》《书陆务观〈估客乐〉诗后》《夜读遗山诸作，复自检省乱来所为诗百余首，至涕不可收，愤慨书此》《中次高季迪张校理宅玩月》等诗。

即使是古代大文豪，他也不一味盲从。他在《戏书欧公〈答梅圣俞莫饮酒〉诗后即效其体》中写道：

莫谈道，谈道能令诗不好。君诗谈道甘如饴，
我甚味之无由嗤。惟其言语既诙诡，难复瞻顾如常时。
君不见，李白猖狂不自疑，语语金丹绿玉卮。
临路悲歌怀仲尼，君于其诞或笑之，无怪不能为若辞。
君谓圣俞莫作诗，但当饮酒无所知。又言为善将功施，
或使文章千载垂。文之于诗又何物，强生分别无乃痴。
朝朝酩酊求功善，万事峥嵘未得齐。我爱居士集，
绎彼删存思。还当一一求公疵，聊以弟子诤其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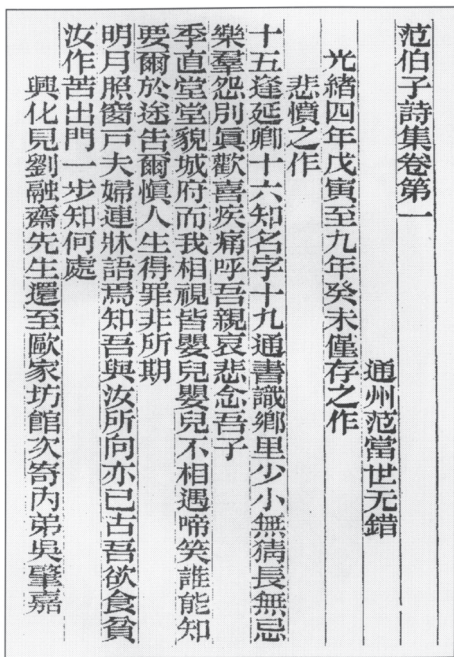
范伯子佩服欧阳修说理的诗，说他的《答圣俞莫饮酒》诗写得好。但认为这首诗言语诙诡，可能是另有所指。李白是语言最诙诡的诗人，他的《临路（终）歌》竟以孔子来自比，欧阳修可能要讥笑李白的荒诞，但写不出像李白那样诙诡的语言。范不同意欧阳修将诗与文硬加区别，其实诗文达意抒情的功用

是一致的。他认为“朝朝酩酊求功善”，会使“万事峥嵘未得齐”，所以也不同意欧阳修的观点，“还当一一求公疵，聊以弟子诤其师”，多么大胆，又是多么令人敬佩的行为！

夏敬观《忍古楼诗话》：“肯堂以文为诗，大都气盛言宜，如长江大河，一泻而下，滋蔓委曲，咸纳其间。”由云龙《定庵诗话》：“范伯子诗，如饥凤悲时，孤麟泣遇，至其力能扛鼎处，又如垓下项王，时歌徵羽。”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伯子穷儒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发为歌诗，力能扛鼎，震荡翕辟，沉郁悲壮。能合东坡之雄放与山谷之遒健为一手。吴中诗人，江弢叔后，未见其匹。”这些评论都显示了范伯子在近代诗坛上的巨大成就与突出地位。

范伯子自视很高，他在《连与松坡、寥博饮酒楼，谈吾师之道，致足乐也，而周晓芙招不至，寥博和吾各诗则尤美，吾乃再次一首，以酬寥博而通晓芙》中写道：

昔我提心
常在口，山有
泰山天北斗。
匪我大言惊愚
顽，也自朝山
拜斗还。烟迷
雾凄斗山失，
公然目我沙尘
间。言子执礼
非所望，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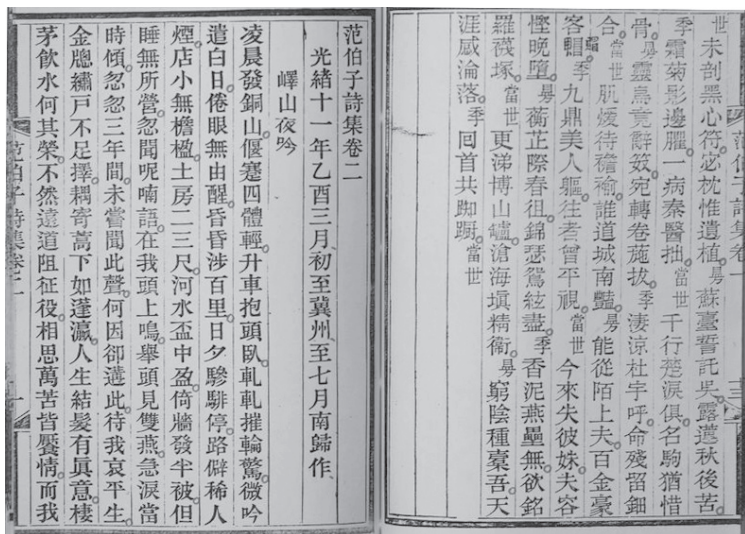
浙西徐氏校刻本《范伯子诗集》书影



奇文吾知赏。十年不见温州生，高人偃蹇不出城。谓我如今似黄九，睥睨不受私自荣。城外酒家大鱼美，卓午无人二三子。轩篷隔云窗户凉，飞盖迢迢半日喜。君不见南皮瓜李生悲酸，五官哀弦独自弹。文人会合古今惜，曷况吾道须人攀。吾言不为二子改，天有北斗山泰山。

范伯子表面上写的是朝泰山、拜北斗，可仔细品味，又何尝没有以泰山、北斗自居的意味？

范伯子在《过泰山下》这首著名的七律中写道：“生长海门狎江水，腹中泰岱亦峥嵘。空余揽辔雄心在，复此当前黛色横。蜿蜒痴龙怀宝睡，蹒跚病马踏砂行。嗟余即逝天高处，开阖云雷尚未惊。”其理想之高、胆色之壮、气势之豪，真令人瞠目惊叹！



光緒戊申刻本《范伯子詩集》書影

痛恨时局糜烂 关心民生疾苦

近代著名诗人金天翮说：“范肯堂贫穷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的确，范伯子诗集中，颇有愤慨时局、揭露弊端、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他曾自称：“万语纵横惟己在，十年亲切为时嗟。”（《戏题白香山诗集》）“细思我与国何干，惨痛能来切肺肝……竟与丧家为代哭，可怜真个泪阑干。”

（《夜读遗山诸作，复自检省乱来所为诗百余首，至涕不可收，愤慨书此》）他对于政局的糜烂感到痛心疾首，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八月十二夜乘车至港，念昔秋去沪而今春返，皆无几时，世变遂已至极，感痛不可以言，诗以记侯》诗中写道：

急火炊梁梁不熟，大千糜烂一何神。可怜目断
前星日，亦是身游太古晨。土乡终为覆巢卵，囊殍犹
累倚闾人。凉风八月宵如昨，一往无由问屈伸。

《西山靖庐吊伯严，悲思右铭姻伯，作〈伤秋〉五首，次韵杜甫〈伤春〉》，更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觊觎帝位、列强肆虐、瓜分中国的触目惊心的景象：



江海烽千里，京津寇万重。法教群强怒，邦崩万象离。帝已成奇货，军犹扰近畿。祸极生民日，冤归守土臣。

最后一首写得尤其沉痛：

麻衣相哭罢，余恨万千多。乍见邨中字，辽兴室内戈。望乌无止屋，叹凤有临河。惻惻履霜操，凄凄《薤露歌》。穷乡得蔬米，危堑倚松萝。不死且须惜，看看睡梦和！

范伯子还有一些影射时政的诗，通过曲折的隐喻、象征手法，把矛头直指专横跋扈、骄奢淫逸、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光绪三十年中秋月》：

噫余瘦削不成影，见汝盈盈在上头。一世闺人齐下拜，八方国实竞前投。移灯读曲行行怨，倚杖看云片片愁。病久可胜寒彻骨，颓然掩袂若为秋。

此诗表层意思是诗人慨叹自己病体瘦削，面对着一轮皎洁盈满的中秋皓月，想起世上妇女此刻都在拜月，家家供桌上陈列着八方鲜果，却引不起他的任何激情，无论是读曲还是看云，只觉得到处都充溢着一片愁怨，由于寒气彻骨，他只好颓然掩袂了。而深层的含义是以瘦削不成影、不胜寒气彻骨、只得颓然掩袂的衰病之身来比拟奄奄一息的中国，而那一轮盈盈在上，令闺人齐拜、八方供果的月亮，则是影射势焰熏天、作威作福、蠹国害民的慈禧太后。经过如此剖析，我们对颈联“移灯读曲行行怨，倚杖看云片片愁”两句所透发出来的浓重悲剧气氛也就能深刻理解了。由于此诗语语双关而又浑然不露，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所以当时范伯子的好友、诗坛领袖陈三立曾叹为“苏黄以来，

六百年无此奇矣”。

诗人对慈禧持如此严厉的批判态度，必然会对主张变法而遭幽禁的光绪皇帝表示深厚的同情。如：“可怜鹿马迷淒后，惨淡无言到圣仁。一昔惊闻诏罪己，万方流泪善归亲。”（《读皇上罪己诏》）“一马十牛愁未已，群鸦孤凤泣何将。”（《不信》）“游丝忽落三千丈，锦瑟真成五十弦。老寡可怜垂涕晚，大僚应记受恩偏。”（《果然》）所以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肯堂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后诗，感德宗（即光绪）幽囚而作者，多沉郁悲愤，驱迈苍凉之气，贯虹食昴之词，直欲抗韩、杜而攀《离骚》。”

而他的《书贾人语》一诗构思更加奇特：“去即去耳谁为贤？人如绿草生春田。镰刀割尽还须长，不闻但有今岁无来年。东家独患囊无钱，佣保杂作何有焉？请看朝廷没曾左，也有后相来联翩。我闻此语倪失色，从此昆仑泰华皆不坚。明朝便叱玉皇退，何能一帝专诸天。”通过一个商人的怪话来揭露满清的腐败。商人说，朝廷要杀就杀，哪管贤才不贤才。春田中的绿草，割后还能长，但要等到明年。主人只愁囊中无钱，心目中哪有佣保杂作！请看，朝廷上没有了曾国藩与左宗棠，后边接班的大臣不是排成了长队？我听到这话大惊失色，这样一来岂不是昆仑山和泰山都不坚固了？我明朝就要叱责玉皇，叫他退位，岂能让他如此专制？最后两句，不是明白地将矛头指向慈禧太后吗？范伯子极善于用这种诡奇的形式来表达他内心的愤恨。

诗人对于民生疾苦也非常关心，《苦雨并闻雹伤麦，四迭前韵示梦湘》诗写道：

去年恒雨亦恒晴，四野啼号梦已惊。正作麦秋仍有害，可怜萌庶欲无生。檐花惨落悬无影，陇树愁兼飞雹声。俯仰人天尽于邑，老儒何术论升平。



痛农民之所痛，急农民之所急，虽为一介老儒，并无一官半职，却为自己无术致太平而感到痛心疾首。这和杜甫、屈原等古代伟大诗人爱国爱民的感情正是一脉相承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底六月初，通州发生道光三十年之后最大的雨灾。大雨不断，江水猛涨，大片农田淹没，无数民房坍塌，范伯子家的王港之围也被冲毁。他在《久雨病困束潜之》诗中写道：“一雨十日屋被围，萍合褰外波浸扉。盆中金鱼受急溜，唼喋已若伤天机。我身非鱼作鱼伍，那弗头涔腹又痠……”

又有《已矣叹》诗写道：

吾室不足容徜徉，独特阶前五尺强。出门一步即路旁，送客迎人借作场。一雨十日城无隍，百河之水流滂滂。冲决户牖推排墙，汹涌直造庭中央。砖苔砌草俱沦亡，飞鱼跃入生鱼秧。虾游蛭走纷成行，痴蟆睨我情态狂。欲出无路来无航，弥望一片波洋洋。眠愁坐叹谁能当，有仆一家号乐康。远挈儿女来就粮，为言耕牛瘦欲尨。户有死狗鸡逃亡，行至中途屡仆僵。有友涉彼狼山冈，遂极百里东西望。但见两道平湖光，昔之绕山田万方。到今处处施船樯。噫嗟我闻仅如此，安得民情皆入耳。齷齪家居何足言，世乱民贫今已矣。

暴雨成灾的景象写得十分真切，范伯子由己及人，表现出关注民生的博大胸襟。他还在《与三弟范铠书》中说：“当雨风之时，我向空中窥看，其意色真狠毒，若果与清国为难者。全局如此，而我又奚足道耶？”

又如《养疴寓楼苦雨吟眺》：

客病艰难不可说，淫霖衰飒更堪听。楼居密密

连云黑，灯火萧萧向日青。歌哭万家声阒寂，飘摇独
树影伶俜。正愁风雨乾坤大，蚁穴侯王梦未醒！

其意象之萧条肃杀，感情之沉郁悲壮，声调之呜咽悒郁，跟杜甫晚年的《秋兴八首》《登高》等杰作，几乎毫无二致。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中指出，诗人“晚岁抑塞无俚，身世之感，家国之痛，悉发于诗，苦语高词，光气外溢，盖东野之穷者也。然天骨开张，盘空硬语，实得诸太白、昌黎、东野、东坡、山谷为多”。

张謇的振兴实业，只能使局部地区稍收实利，对腐败透顶的满清帝国而言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范伯子的末世沦落之感和怀才不遇之慨无处发泄，并一泄于诗。所以姚永概说：“范君起江海之交，太息悲伤，无所抒泄，一寓之于诗。其诗震荡开阔，变化无方。”陈衍说：“伯子识一时名公巨卿颇夥，徒以久不第，抑郁牢愁，诗境几于荆天棘地，不啻东野之诗囚也。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读之往往使人不欢。”陈衍指出范伯子诗风的劲健生涩、沉郁悲壮、凄怆怨愤是正确的，而抹煞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将他的诗全说成是发泄个人牢骚则是不正确的。即使从诗人那些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式的作品中，也不能得出如此之结论。如《人日和杜公追酬高蜀州诗，用其体韵》：

人间何日不兴作，何代无人怨沦落。把手杜
公《人日》篇，感激凄伤泪如昨。遥遥大历千年
来，人代相看已寥廓。宁我独无经世才，知若亦乏
匡时略。常将短札记经过，更把长篇娱寂寞。言
怀投契悲唐虞，坐想骅骝忆雕鹗。如今似我更无
论，汉中昭州无一存。刘表能谈周礼乐，赵佗不问
汉乾坤。朔风慄慄重阴覆，西海滔滔万溜奔。天意
宁嗟腐败士，旧游欲断公侯门。可怜世季生无赖，



要使饥驱道不尊。尺水涟漪复何有，涸余常此役
惊魂。

杜甫是古代诗人中具有匡时济世大志的典型代表，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常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诗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而如今范伯子偏说他“亦乏匡时略”，偏说他写诗仅仅为了“记经过”、“娱寂寞”，正言若反，反言若正，我们必须从反面去理解才能得其真髓。因此，联系前面所举各诗来看，此诗所抒泄的，正是范伯子怀才不遇、报国无路的悲愤，而不可能是一己之荣辱、个人之否泰。

外地风物再好 不如故乡清嘉

范伯子热爱家乡的情感，在诗歌中表现得很充分。
《次韵旭庄太守郊行十二首》之三写道：

炎方卑湿朔扬沙，客粤留燕镇忆家。试听吴趋
论山水，吾乡风土实清嘉。

诗人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经过比较，他强调说“吾乡风土实清嘉”。实事求是地说，范伯子时代的通州，五山与濠河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自然风光比起外地的名山秀水来，并没有太多特色。范伯子之所以如此说，正是热爱家乡感情的自然流露。

他在《水心亭宴集，赠徐积余太守，兼示陈筱山润生、季直、磐硕诸子》第二首中写道：

东南宴乐吾州最，一角河亭敞此筵。去日若烦
朋旧问，斯游难以画图传。关东范叔寒如此，城北
徐公美可怜。岂意张陈亦萧瑟，坦怀惟有酒如泉。

此诗写诗人与徐积余、张謇、陈润生等在水心亭宴乐的情景，虽然有点凄寒萧瑟，但整个情绪还是昂扬的。这从首句“东南



宴乐吾州最”与尾句“坦怀惟有酒如泉”中可以看出。

《东郊道中》则写出了家乡的美景：

碧涨回溪满，风芦对岸斜。群鱼嬉水鸟，深草
著秋花。日午人归犊，阴浓妇浣纱。愁闻积霖后，户
户有农嗟。

秋水满溪，碧波荡漾，两岸长满芦苇，在随风摆动。水中一群群鱼儿在自由地游泳，几只水鸟从空中陡然落下，长喙伸向水中，似跟鱼儿相戏。溪边的杂草上缀着各种颜色的小花。正当日午，牧童牵着牛犊放牧归来。浓浓的树荫下，妇女们在忙碌地浣纱。这本是多么优美谐和的农家乐啊！可是，“愁闻积霖后，户户有农嗟”，秋雨连绵，酿成水灾，农民们正在发愁叹气呢！这首诗中既饱含着诗人对家乡美景的热爱，又饱含着诗人对家乡受灾农民的同情。

再看《延卿将之广东，招同诸子集于其家，次〈何氏山林〉十首》之四：

覆瓦千梢竹，根墙四面花。屋庐巢翡翠，泥壁
草龙蛇。荷芰风长好，藤萝月正赊。怜君好文彩，未
改野人家。

虽为私家园林，却颇有野趣：“怜君好文彩，未改野人家。”而这组诗是次韵杜甫《何氏山林》组诗的，写得清丽整饬，深得杜诗神采。

再看《夜坐》：

好云停屋角，初月上浮图。坐听一声雁，庭空秋
有无。

从屋角仰望，秋空寥廓，白云悠然停在蓝天，月牙悬挂于宝塔尖顶。听到一声雁叫声后，天空显得更加高旷。多美的一幅

《初月雁鸣图》！其中蕴含着诗人对家乡的一片深情。

对于家乡的五山，诗人更是情有独钟，屡屡见之于吟咏。现略选数首，以见一斑。

《同州主及管榷诸公游山，因访余黄泥山读书处，感次壁间朱石甫韵》写道：

松有垂条柳有枝，各天生意不相知。岩峦寂静
能千载，裙屐风流又一时。膏野雨余农事急，澄江
风定估帆迟。如何逐物闲闲者，仍向空山泣鬓丝。

诗人青年时期曾避居于黄泥山清静之地读书，晚年重访当年读书处，怎能不感慨万千呢？看到当年友人朱石甫题在山壁上的诗，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便照原韵和了一首。诗人慨叹当时的友人大多分散，各不相知。江山永恒，人生短暂。诗人看到农民乘着雨后再在田间忙碌，江面上飘浮着迟迟航行的帆船。诗人慨叹自己一事无成，鬓发苍然对着空山哭泣。这是故乡的景物触动了诗人的情怀，才让他如此伤感。

基于这一点，即使在给友人写的题画诗中，他对黄泥山依然情深如昔。他在《题竹庵画》第二首中写道：

未有雄谈对文畅，聊将心迹语高闲。江流绕遍
黄泥麓，万石嵒嶽无片顽。

而《次韵旭庄登狼山》，则更显示了范伯子对故乡风物的情深似海：

乱世江山剩可怜，清游未欲妒君先。一番云起
藏峰出，八海潮来断港连。陇麦香风仍可饵，山茶
活水且同煎。兹方僻远浑无事，安得凭临万里天。

竟然妒忌友人比他先游狼山。诗中对云起峰出、潮来港连的景象赞不绝口。他要以麦陇香风当饵，用山中活水煎茶，登



临狼山最高点，凭栏临眺万里天。

《狼山观烧感赋》则写出了元宵节晚上农民用火把照田头祈田神降福的壮观景象：

元夜灯辉万万古，无端忽被时危阻。传闻野烧今宵多，重向狼山命俦侣。亦曰慰情聊胜无，不谓奇观在何许？白日已下天无光，荡荡乘高揽空宇。冥然一点两点出，忽然稀疏见三五。不能一瞬纷来如，泛滥崩奔骤如雨。火海分为无尽波，婉娈迎风颜色聚。直视又若星河翻，芒角摇摇煽残暑。恍其玉帝乘云观，已讶高天沉下土。自读庄生视下篇，便识坤乾无定处。翻腾变化人为之，万众齐心不可御。居高听下虽不闻，因风送声可知语。他人有菜小如钱，吾侬菜若筐之钜。蠹贼尽死人则肥，如此云云咒田祖。假令官长为娱嬉，岂能令彼一时举。正为灾祲动切身，各各然薪写心苦。遂令山中虻虱臣，浩然独叹生民主。一诏弥纶有万年，百姓身家不可侮。

此诗前半篇对狼山野烧的景象作了极其生动逼真的描写，在高潮出现时采用了博喻的手法：写野烧如暴雨奔骤，如火海荡波，如星河翻动。还用了极其夸张的手法：仿佛芒角摇摇在煽动着残暑，使玉帝乘云观看也感到十分惊讶，让庄周下视也感到乾坤在翻腾。下半篇写诗人的感受，其核心是“万众齐心不可御”与“百姓身家不可侮”两句。诗人认为，如果民众齐心，其力量是不可抵御的，老百姓是不可侮辱的。从观野烧能体会到这一点，由此可见范伯子的了不起！

而他在《与内子登狼山游宴，极乐，内子先有诗，而余次其韵》中所体现的则又完全是另一种心态：

世态更改年复年，山色向人无变迁。所以古之

倦游者，往往归结青山缘。嗟我蓬飘二十载，今来共尔东南天。越从戊子作重九，十年不履兹山巅。春初与人观野烧，冥从杂遘如流川。此间岂容尔我迹，辗转期待秧分田。山空人静杂花发，攀登一览心欢然。平时未知缺几许，及此方觉吾犹全。身之得闲贱亦好，饥饱在后何须钱？惟以佳人古难得，同时郭李云如仙。白头相守亦相喻，此乐未被旁人先。三千大千泡影置，当时如来岂不贤？四十年间随穷汉，惜无此趣能少延。如今与尔共生灭，在家何取忘家禅。一日看山未云少，百方清兴来连连。浮云已向空中失，落日犹在天边悬。临门一照长江水，人与山容皆静娟。

诗人慨叹自己在外飘泊了二十多年，宏愿落空，简直是“三千大千泡影置”，但他又庆幸娶到美丽多才的姚倚云，“白头相守亦相喻，此乐未被旁人先”，“如今与尔共生灭，在家何取忘家禅”，夫妇同游狼山，“临门一照长江水，人与山容皆静娟”。多么优美的情操！多么豁达的情怀！



诗境鲜明生动 诗思寄托遥深

范伯子的一部分诗，诗境鲜明生动，诗思寄托遥深。一类是写景诗，诗人能抓住所写景物的个性特征，着力刻画，使其形象鲜明，生动逼真，但又不是纯粹写景，而是具有深远的寄托。如《江心晚泊》：

江北江南路总非，江心一蝶背人飞。空波不长
浮萍草，夜色苍茫何处归。

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江心飞蝶图》啊！江心一只孤独的蝴蝶，背着舟中的人向远处飞去，在苍茫的暮色中越飞越远，渐渐地看不见了。可是，诗人忽然替这只蝴蝶担心起来，江心并不长浮萍草啊，何处是它的归宿呢？诗人不动声色地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余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读者不禁要问：诗中仅仅是写蝴蝶吗？当然不是。首句“江北江南路总非”便暗暗地透露了消息，这实际上是诗人在暗示自己无路可走，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归宿啊！尽管一点痕迹也未显露，但诗人彷徨无依的苦闷心情却跃然于纸上。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啊！

又如《隔溪山寺闻钟》：

上方禅悟夜铿钟，越石穿林似不同。更度溪流
带清淑，教人浮世万缘空。

读了这首诗，立刻使我们想起了杜甫的五律名篇《游龙门奉先寺》尾联“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表现手法何其相似！但实际上两人所悟并不相同：杜甫所悟是一切皆空，范伯子是借“教人浮世万缘空”来抒泄他在现实中怀才不遇、走投无路的苦闷。因为杜甫信佛，而范伯子并不信佛。

又如《清溪浅水徐舟》：

蔼蔼溪云澹若仙，循溪水鸟不飞烟。定须阅尽
风波后，回望江湖始可怜。

三、四两句是点睛之笔，人只有经历了无数风波之后，才能体会到祖国山河的可爱，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啊！

《中秋次韵高季迪张校理宅玩月》是范伯子著名的长篇之一，写于天津李鸿章幕时：

我来四换霜林蓝，魂梦已失江边岚。江月沉沉
山月小，今皆沦落无人探。浪说吐茵不宜逐，坐对
丞相车瓮髻。偷有此庐乐今夕，天与月我相濡涵。月
之团团定何物，疑非我与天能参。一片寒冰照人世，
却有功用无求贪。著向青天不可扫，朗若大字题空
嵌。所以贤愚各顶礼，岂有骂语闻沾喃。我之持持
定何物，语大足比书中蟾。当年亦欲舍此相，春山
夜雨萦苔瓮。固知早成定虚愿，不得绿发寻归庵。
郁蹙锦瘤要人采，百计不售成枯枿。平生思之但负
月，扪心愧对秋江潭。人间佳节复有几，沦失八九
钟阜南。身独何为入囚舍，翻覆自缚真如蚕。只能磊



落对天笑，老死寂寞吾何惭。焚香径下嫦娥拜，臣于万物靡所耽。朝吟莫吁有述作，书生例许为空谈。李彪设具范云啖，岂论明日无黄柑。天有雨风月有阙，惟独臣言无二三。祝拜而起妇亦拜，拜罢一笑千愁含。谓余披写既如此，孰为偃蹇停归骖。天寒海昏怒涛动，孤客坎壈真能堪。嗟子斯言吾岂昧，飞霰既集谁不谙。丈夫行止有尺寸，但惜玉貌非好男。长年与人共烟火，能无一日同苦甘。何况东兵大蠹手，曾不责我谋平戡。精台丈人亦无事，正用此际穷幽覃。劝君努力清光下，不惜沉醉宵酣酣。博得有情无智慧，岁与草木无边髡。

对于这首诗的寓意，孙建的《伯子先生年谱》中曾作过详细的剖析，今引用于下：

光绪二十年（1894）中秋，作《中秋次韵高季迪张校理宅玩月》诗，此诗全面表现了先生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里边有浓浓的乡思——“我来四换霜林蓝，魂梦已失江边岚”；有身不由己的喟叹——“身独何为入囚舍，翻覆自缚真如蚕”；有对周围环境的清醒认识——“天寒海昏怒涛动，孤客坎壈真能堪。嗟子斯言吾岂昧，飞霰既集谁不谙”；有对慈禧太后专权的厌恶——“月之团团定何物，疑非我与天能参。一片寒冰照人世，却有功用无求贪。著向青天不可扫，朗若大字题空嵌。所以贤愚各顶礼，岂有骂语闻沾喃”；也有对李鸿章知遇图报，不欲马上离之而去的表白——“丈夫行止有尺寸，但惜玉貌非好男。长年与人共烟火，能无一日同苦甘？何况东兵大蠹手，曾不责我谋平戡。”

再看《过焦山内人扶病眺望》：

斜阳冉冉天光好，积水洋洋树色酣。欲问山灵此何世，尚将晴翠扑江南。临江病眺莫伤怀，不死终能尔我来。放意存兹一片石，世间何物是楼台。

诗人扶病眺望焦山一带的风光，劝慰妻子不要为他的疾病伤怀，应放意欣赏，心胸极其旷达。

《至镇江晤丁星五及游氏子，信有江清之事》：

沿江居人走相惊，胡此浊浪朝来清？升高直视
殊殊曩，千里百里同一声。我初闻之苦不信，恐其
讐语随风生。岷山导江出三峡，直挟万派东南倾。
山田野岸受冲决，经过尽带泥沙行。淮汉大流迭来
汇，鱼鳖万派欢相争。溟然若此欲淘汰，神禹再出
功难成。守此硜硜百不领，诤晤二子斯言诚。上自芜
湖下京口，历历照眼波光明。有言江清圣人出，或主
变乱愁刀兵。沉思物理不可解，徒纵妖异资狐鸣。
不然清流祸国古无此，天其或者著象咨。我氓梦梦
万古杳无觉，独向江头涕泪横。

此诗对长江下游江水忽然变得澄清的怪异景象发出议论：古代就有江清出圣人的说法，可是圣人在哪里？如果说是清流祸国，难道老天爷为这一点著象警告？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清流祸国这种现象啊！清流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在晚清是指那些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纲纪的正直的官员。中法战争前后，清流繁衍为前后两辈。前清流以军机大臣李鸿章为首，后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光绪帝亲政后，他们以拥帝相标榜，称为帝党，以别于当权的后党。可误国的绝不是他们啊！那么，倒有可能是政治黑暗、世事纷



乱、出现刀兵的象征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要“独向江头涕泪横”了！由江水偶然变清这一自然现象，竟引发出这么多政治感慨，可见范诗的内容多么深广！

再看《落照》诗：

落照原能媲旭晖，车声人迹尽稀微。可怜步步
为深黑，始信苍茫有不归。

此诗为诗人临终前所作，以即将落山的太阳步步走向深黑喻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写得异常凄凉。

另一类是叙事诗，在叙述日常生活事件中抒发感慨，寓有深意。如《出门所遇多京师间道流落不堪之人，舟中连榻一人谈尤痛》：

径从海角扬帆过，谁肯纡回路几千。今日子身
流落者，多言间道死伤边。豺狼异域纷当户，鸾鹤中
朝尽化烟。草莽微臣百不晓，只知昨日是尧天。

此诗记叙了诗人曾在船上碰到的都是京师间道流落不堪之人，他听到了同舟有一个流落者的谈话内容，这个连榻的人说如今豺狼遍地，像鸾鹤一样的优秀人才惨遭杀戮，全都化为烟雾，可他并不知晓这种情形，因为昨天还是“尧天舜日”般的太平世界！在这平常的叙述中蕴含着多么深沉的愤慨啊！

再看《伯严卒哭，同行舟中有赠》：

怜君似我无根蒂，仍向江山泪眼开。云物徒供
一身老，干戈更杀百年哀。蓬风卷发垂垂尽，蜡炬烧
心寸寸灰。作述从容要三世，剩容泣导后生来。

此诗记载了他的亲家陈三立有一次在船上突然哭起来，这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但作为一位著名诗人，突然痛哭却又并不寻常，特别是诗中“蓬风卷发垂垂尽，蜡炬烧心寸寸

灰”两句，将诗人的极度悲愤心情抒泄无余！

《将抵镇江，念六月十五日过此，忽四月矣，感恨成诗》
写道：

悠悠道路几经年，忽尔惊心月四圆。皇古至今
哀痛日，寻常互市往来船。身兼傲惰真无地，语杂寒
饥更愧天。不敢凭栏向山咏，诗成还复拥衾眠。

此诗不仅慨叹日月不居、时光如流，更为自己一事无成、怀才
不遇感到无比痛心！

《适与季直论友，归读东野集，遂题其端》则写得更奇特：

昌黎下笔天光完，滋有意外呈毫端。东野琢句多
断残，湮郁不发埋心肝。以兹论文百不合，而彼二士
相波澜。惟恐人间有离析，欲把形影搓成团。张君昨
来适语我，交友异性非所患。有从天来入幽可，有非
梧竹栖不安。但取龙鸾合奏曲，勿与犬鸡同叫欢。我
言奏曲亦须异，仿佛列鼎调咸酸。刚克柔克有二道，
相成相反兹焉殫。郊亦滔滔挟愈势，愈有蠢蠢资郊
寒。不然一倡百声和，正使吾道愁孤单。

从题目可知，范伯子白天与张謇谈论交友之事，晚上回家读
了孟郊集后有所感悟而写了此诗。诗中说，韩愈与孟郊的诗
歌风格完全不同，要是讨论诗歌创作问题的话，他们肯定是
扞格不合的，但是他们的友谊却特别深厚，达到了“欲把
形影搓成团”的程度。张謇认为，性格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交
友，但应当品格高尚，不能庸俗不堪。范伯子则认为，交友
的双方志趣与性格应当有所不同，好比做菜调味需要咸与酸，
好比为人刚柔相济相克，事物相反才能相成，孟郊与韩愈诗
风可互补，如果一倡百和的话，那就显得十分枯燥了！从一
般的闲谈聊天，居然引发这么高深的一篇“交友论”来，真



令人感到惊讶！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范伯子）咏物之作，能别出手眼，超乎象外者，殊不多见。”

请看《吾所植荷既开尽而风雨频至，坐见其萎谢，慰别以诗》：

荷今折风雨，落落夫何叹。见汝清明日，孤根后土安。何由触冥性，心气忽奔澜。横游不得遂，直上多其端。冥冥一尺土，若若钻天难。迎风变青翠，向日成朱丹。开落一不吝，替萼宵转转。悬知此盆内，百孔能相贯。房房遍已实，根本又可餐。有生百虫附，来去无相干。吾哀独含愧，给水徒未干。滋渗任奴婢，隔望成朝欢。潇湘洞庭上，弥路花漫漫。传闻有司命，乃是神仙官。五更得月际，大士乘飞鸾。停云拂素袖，洒露当花冠。嗟兹一华植，岂有高灵看。哀哀楚骚子，抱石沉急湍。奇躯不得腐，化作荷根蟠。传为万万本，七窍心犹完。人间习不识，此是荷之端。君看本末在，岂肯为椒兰。埋藏弗复道，摧落终心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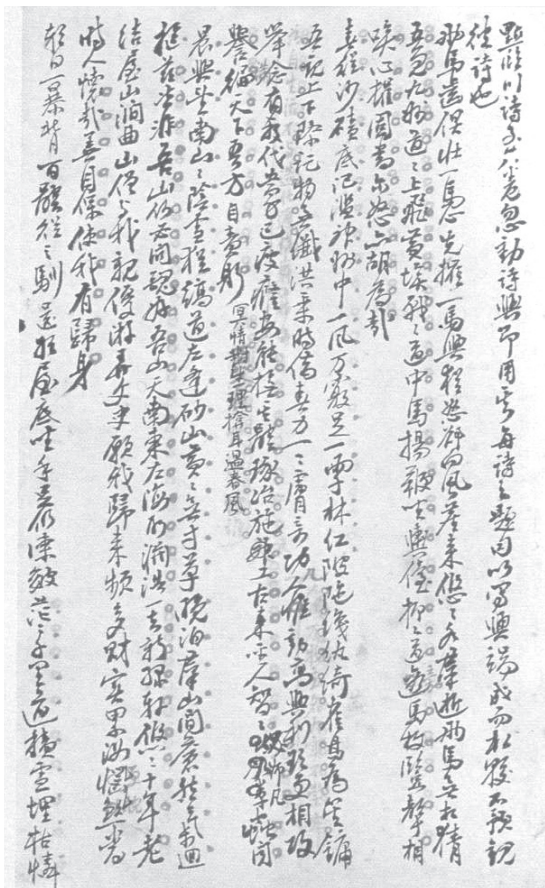
面对衰败的荷花，居然想象它是屈原的灵魂所化生，“君看本末在，岂肯为椒兰”，赞颂它始终芳洁不污，崇高完美。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评此诗“渊渊有古音”。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范伯子一首写猫的诗，竟由猫引发出人伦道德的大话题。请看《寒家畜二猫，盖母子也，并时乳子，辄移其所生置他处，而日来哺其母所生者，母坐视之以为常，数日矣，感而成诗，五叠前韵》这首诗：

孰谓猫知偎暖晴，朝来仆媪一时惊。阳春短短催相嬲，微命区区报所生。怪事流传几不信，至恩

沦浹亦无声。谁何异族能交乳，侈说当时马北平。

这简直像是一则寓言故事：老猫生下了一只猫，也已生下了小猫，但去乳哺自己的幼猫，却去乳哺老猫生下的幼猫。范伯子将这种怪现象提高到人伦的高度来评判，认为是“至恩沦浹亦无声”，予以高度赞扬。实际上是对人伦中的忤逆现象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范伯子诗稿



诗风精华内敛 令人回味无穷

范伯子的另一部分诗，精华内敛，妙处不能让读者一下就抓住，往往需要经过仔细品读，才能体会到回味无穷的诗意。

李猷《近代诗介》中说：“余年二十余时，居上海，丹徒吴眉孙师庠，曾以木刻范伯子诗四册，郑重赠余，且曰：‘子学诗，宜学范先生，勿为一览无余，或风花绮靡之作也。’余敬诺，而实不知范先生诗之佳处也。范先生诗黝然无光，但精华内敛，妙处实不易率尔知之。抗战时与先师杨云史先生同住香港，师曾告余昔年与范先生晋接之状，及所论作诗之法。盖范先生诗于经史植基深厚，故虽平凡之语，亦用字不同，诗虽不为雕饰，而其句法奥衍，回环曲折。着力处如拗钢铁，密栗处如琢古玉，且不假一二词藻，以增其色彩；亦不故作倔强，以示坚挺。总之，纯任自然，写其心中之意，毫无斧凿，天成苍劲之姿，即令老杜东坡，诵之亦当敛手。”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肯堂七律，硬语盘空，全得力于山谷……时贤学山谷，但得其清瘦之致，肯堂独得其莽苍之态，嗣响颇乏其人。”范伯子的七律，不仅硬语盘空，还潜气入深，精光内敛。

如《留别新绿轩》写道：

篮舆侧放山门下，我作山人尽一餐。芳树如闻啼鸟怨，残英犹恋去年看。百年香火崇碑在，四海烟涛一剑寒。莫复殷勤为后约，还山古有万千难。

新绿轩在黄泥山，是诗人青年时期的读书处，故而离别时心情相当复杂。首联是说，送他离去的篮舆已经停放在山门下面，作为山人，他在这里已是吃最后一餐饭了。一起笔即已充满难分难舍之情。颌联是说，面对着开满花朵的树木，仿佛听到连鸟儿都在哀怨地啼叫着，因为它们舍不得诗人的离去；面对满山残英，想到去年春花怒放时那灿烂的景象，仍十分留恋。颈联是说，黄泥山具有百年香火之盛，请看那高大的石碑不是矗立在那儿吗？可诗人这次离开新绿轩将四海为家，出没于烟涛之中。贾岛有《剑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诗充满怀才不遇的激愤，而范伯子在“一剑”后用了一个“寒”字，不仅十分含蓄地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激愤，也预示着前途的坎坷。尾联是说，不必与新绿轩留什么后约，从古以来想再还山都是十分困难的。这首诗的感情相当复杂：既留恋新绿轩，又希望到外面去闯荡一下，展一下身手，可又为前途的坎坷担心，充满怀才不遇的激愤，而诗的表面，又似乎仅仅是惜别。本诗的确体现了范诗精华内敛的特色。

又如《举足》：

举足能归归不得，恼人天气复晨昏。日光昼软来穿户，风力宵沉自打门。家弄近知黄菊好，婿乡空忆短篱存。不如海冻江河涸，雪地冰天得自温。

这首诗写于诗人在江西安福续娶姚倚云之后，是写给他岳父看的，这时诗人正在生病。首联是说，由于生病，一举足就能回归故乡却归不得，连天气都使人感到烦恼，早晨就昏昏然的。究



竟是天气使诗人烦恼呢，还是不能回故乡使诗人烦恼呢？诗中没有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颔联是说，中午，日光透过窗户照进室内，显得很柔和。这里用一个“软”字，很独特，很精彩。晚上，风猛烈地敲打着门扇，显得很沉重。这里用一个“沉”字，也很独特，很精彩。颈联是说，近来知道家乡的黄菊正在盛开（弄，里弄，指代家乡），可我只能空忆那里的矮篱罢了。尾联是说，这深秋季节太令人烦恼（暗指菊惹人愁，天气容许人归而不得归），还不如干脆是冰天雪地、江河海洋全都封冻干涸了，断绝我回乡的念头，我只要自我保暖（暗指自我安慰）就行了。请看，一首思念故乡的诗，竟写得如此曲折而深沉，如此精光内敛，真要令人叹为观止！

再看《次韵恪士并怀至父先生》诗：

世事又随春草换，隔年还是腐儒心。为周有此
迢迢梦，不禹何须寸寸阴。倚壁半檠孤照在，当门一
雨九河深。正令晓入平津阁，只向青天耐苦吟。

此诗首联是说，世事在年年不断地变化，而我那一颗儒家济世安民之心却始终没有变。“腐儒心”是谦虚的说法。颔联用了庄周化蝶、大禹治水的典故。意思是说，我只是像庄周梦化蝶那样，看透了人生，并不像大禹治水那样，珍惜光阴。颈联写眼前景：面对孤灯，倚壁凝思；当门观看，大雨滂沱。尾联写等到天明登上平津阁，将面对湛蓝的天空苦苦吟诗。首联写自己积极济世的宏愿，颔联写宏愿落空，心灰意冷，颈联、尾联通过写景与苦吟，暗示心中充满怀才不遇的愤懑。诗的底蕴，只有通过仔细品味才能体会得到。这正是范诗的独绝处。

气骨雄奇峻嶒 感情悲痛沉郁

范伯子一部分诗，气骨雄奇峻嶒，感情悲痛沉郁，而这种特色，在七古中表现得尤其充分。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

“肯堂七古，气骨峻嶒，直欲负山岳而趋。晚清学宋诸家，皆不能及……皆悲痛沉郁，此非真通古人消息者，不易办也。”

请看《余与晋卿往来数月，既尽读其诗歌、骈文、墨子之属，最后又得读其古文，益服其无所不能，携至保定视吾师，吾师叹嗟焉，七月，余将南还，晋卿别以诗，和之，得卅四韵》：

北方旧闻天下雄，涉河一览嗟哉空。平历万村草树寡，水居不钓山无茸。我行千里到此息，狂言诞语陵诸公。吴公授我秀才艺，云此属者邦之蒙。观吾井者乐吾乐，对此不得方南东。我诚斯言踞坐视，初睨忽眩惊我瞳。即换心肠测群腑，千灵百怪争鸿蒙。顾谓吴公曷嬉我，公笑谓我非我功。保阳魁人曰王氏，酣经饌籍光熊熊。要遮出刃拟其腹，乞膏溉此荒田中。彼号愿承一手烈，能辟造化开神工。君今所论固可伟，三年以昔皆常僮。顾谓在阶速具酒，即看二子尊前融。维时浴佛后一日，吴公



席上来忽忽。明朝就语信都院，为庄为诡十九同。示以卷诗最初咏，雕愁刻鬼如颓翁。琢成小文出幽怪，兰根僻夜鸣何虫。我闻经师日在矩，十步以外非所攻。咄哉章缝杂奇服，顾此裸壤忧心冲。险人如雷那可测，震出平地千家聋。高云沸沸尽龙气，俾蜃对嘘天不蒙。蜃隳其楼闭海市，夜走海底龙王宫。老龙但言我无术，汝弗幻者焉得穷。此间神物或如蚓，此物受戒新出笼。五千大藏用故少，吾族得之经纶丰。汝惟海产夜郎腹，乃今但可潜其踪。呜呼王君我与汝，今此斗角犹雌风。尹那娟娟女儿相，我亦悔过私扞胸。大道榛芜要徒众，圣人孤独贤人丛。长离一飞几千载，孔雀翼翼曦苍穹。泰山东面障东海，太行拥背排云峰。黄河如沟不足悼，南箕北斗夜夜通。会当与君戏原野，暂别几日胡殷衷。将酒酌君问君意，吾欲千年于此终。

王树楠(1852—1936)，字晋卿，号陶庐，河北新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官四川、甘肃知县，新疆布政使。曾任冀州信都书院山长。民国入清史馆任总纂十多年，晚年主讲奉天萃升书院。著书很多，共二十多种，汇成《陶庐丛刊》。范伯子执教于冀州时，跟他过从甚密。

这是一首评论对方作品的诗，极易犯枯燥评述的毛病。而范伯子却别出手眼，形象光怪陆离，气骨雄奇峻嶒，读后令人震惊。比如赞扬王氏的才华，竟然说，用刀剖开他的腹部，脂膏能够灌溉荒地。评述王氏才华令人惊讶，竟然说“险人如雷那可测，震出平地千家聋”。说他的作品如海市蜃楼，连龙王都十分震惊，说“此间神物或如蚓，此物受戒新出笼。五千大藏用故少，吾族得之经纶丰”。真是想落天外，豪气如山！

请看《天津问津书院姜坞先生主讲于此者八年，外舅重游其地，感欲为诗，乃约当世同用山谷武昌松风阁韵》诗：

有文支柱山与川，恍人有脊屋有椽。我立此语非徒然，眼下现有三千年。远矣周孔隔地天，手语目听交鸣弦。五德替代如奔泉，扫去碌碌留圣贤。此事担当在几筵，耿耿一发天宇悬。丈人家世留青毡，文字碧水流潺湲。从来不与时媚妍，姜坞先生此粥饘。百年乔木参风烟，公来再饮唐山泉。龙堂蛟室来眼前，吾今只可烂漫眠。梦里不须书绕缠，醒亦毋为世教牵，眼见地塌天回旋。

此诗是评述姜坞先生为人的。劈头就说他的文德可以支撑山川，好像人的脊柱、房屋的椽子。又将其比喻成周公与孔子，说他“手语目听交鸣弦”，“五德替代如奔泉”。评述他的诗文，则说“文字碧水流潺湲”。最后说，由于姜坞先生来主持问津书院，他不再担心教育问题，“眼见地塌天回旋”。其构思与用语异乎寻常。

再看《挚父先生来书劝乡试，欲以诗答，会连日用山谷韵，乃复效其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连缀二篇，因示叔节》：

爱惜君心畏君口，惯能移嵩消箕斗。君口哢哢不可关，吾心峢峢亦不还。岂有当年伐柯斧，舞我更置青云间。君道吾文百年上，但可欧心受君赏。自古人微各有情，平生不愿识都城。男儿尚能弃卿相，况我碌碌非辞荣。年增白发举场里，性命区区亦人子。岂不将心比父心，此但多忧少见喜。君不见世上迂生得饱难，有铗无门何处弹！相公厚我亦已足，更用举手将天攀。不必昏人簇迷网，正当开眼望湖山。

吾今欲闭谈天口，亦莫虚空打筋斗。四十真当生



死板，要从人海收身还。已读南华亦奚晦，可以容身雁木间。范子何为书十上，屠龙有技无人赏。此是吴公叹喟声，乃有息壤燕南城。平生知心百不闾，何独一第为吾荣。吾命穷薄堪一士，蓬叶子耶薜萝子。老与郊岛相娱嬉，此在风尘犹可喜。君不见赋有膏兰保命难，龚生至死为人弹。何哉吾党二三子，犹欲舍命穷跻攀。寄语东堂读书者，看取玉貌还青山。

吴汝纶劝范伯子参加科举考试，范不同意。这本是两首极普通的应酬诗，却写得雄奇豪健，机趣横生，既不得罪老师，又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同样的意思，对妻子表示时又是另一种直抒胸臆式的语调。请看《叠韵再示蕴素》：

相与蚩蚩皆为口，多至万钟少一斗。一饱以外皆可删，三时却有饥肠还。正及饱时役筋力，不得填躯沟壑间。吾观营营九衢上，总缘归博妻孥赏。人生一世岂无情，但当画界守坚城。堕地已分天一尺，涉及分外皆非荣。天津一角池台里，明月梅花有妻子。得钱归博亲堂欢，饌有嘉鱼妇翁喜。君不见昔病家园寸步难，手枕琴徽无力弹。胆落空阶秋叶响，返卧藤榻天难攀。岂意飞扬有今日，颇膺拙分主青山。

劈头就说，按照世俗的看法，追求荣华富贵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多至万钟少一斗。”其实，一饱以外，夫复何求？他的原则是：“人生一世岂无情，但当画界守坚城。堕地已分天一尺，涉及分外皆非荣。”现在我们在天津生活得很好，有收入可以赡养父母，体格也健壮起来，不再像以前在故乡时病体难移，无力弹琴，落叶惊魂，卧榻难攀了。诗似乎写得很平淡，但却掩不住怀才不遇的悲愤！

再看《喜松坡来再次一首》：

沮汝三年不去口，相逢那不五六斗。自顷闻君不得闲，偷人都门背道还。不知营营作何事，见说杀人都市间。又见秋曹讲堂上，赤文绿字恣深赏。一夕人影灯前横，乃是扁舟来故城。开口侈陈老父乐，斑衣绚烂真华荣。我有画扇君见否，貌一苍颜带童子。偷事老苏坡不知，追陪十日尤可喜。君不见世上英髦老即顽，悻悻古调知谁弹？惟独而翁及吾父，复乎高蹈不可攀。何不与尔从此永离散，各自采米买书归故山。

老朋友会面，不谈别的，只谈如何侍奉老父，让老父高兴。

“见说杀人都市间”，是用“曾参杀人”之典。《战国策·秦策二》：“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是说谣言可怕。诗的结尾范伯子想跟友人一起“各自采米买书归故山”去侍奉老父，仍然有怀才不遇的悲愤在内。

《太息一首再次韵》则用了较多典故：

我闻庶女沉冤不容口，乃有呼声摇天撼星斗。何哉章缝读书美少年，哀鸣矢志一往不可还。始知人生肺腑异，我乃醉梦三年间。思之思之吾不广，奚以吾言必可赏？事非至愚不可成，杞哭七日崩莒城。李斯不羞厕中鼠，那得身受秦家荣？谁家张冠移赠李，前日山呼拜天子。城南故人交致辞，乡闾亲旧劲色喜。君不见长安令，日月章台醉不还，驄马御史不敢弹。只用黄金作阶级，朱门廉陛非难攀。看汝康



衢老师老为客，一日见逐饥毙无归山。

先解释几个典故。“庶女沉冤”指春秋时齐国一民女含冤莫申，仰天呼号之事。“章缝”原是指古代衣冠的缝掖制作，后来借指雕章琢句的文士。“杞哭”，齐庄公四年，齐袭莒，杞梁战死，其妻迎丧于郊，哭甚哀，遇者挥涕，城为之崩。“厕中鼠”，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庶女沉冤，用“呼声摇天撼星斗”来夸张。文士失意，用“哀鸣矢志一往不可还”来描绘。“杞哭七日崩莒城”，强调悲痛之深。“李斯”两句，批判功名利欲之心太重。“谁家”七句，揭露富贵者的丑态：“只用黄金作阶级，朱门廉陛非难攀。”而结句则悲愤喷薄而出：“看汝康衢老师老为客，一日见逐饥毙无归山。”在雄奇挥洒的笔墨中，寄寓深沉的悲哀。

《二十三日即事再次一首，盖效山谷七篇终矣》中有“雷公半夜张馋口，攫我当门二酒斗。轰然一醉天河翻，驱走风云更不还”数句，写夜间大雷雨至，折龙王庙前旗杆斗，想象丰富，造语奇特，气势突兀不凡。

请看《学方老醉歌赠敬如且俾戏示爱沧公子》诗：

江风海雨天正昏，酒阑灯炆人无言。明星三五在云里，出没深夜孤光存。尔我何为共兹世，岂不欢然令可继？堕地辛酸有同异，百年强半为生计。苏季欲以东周兴，哀哀王赧今无势。康庄大第生荆榛，驺衍微言又谁契。我历人间径途百，自求饥冻非人迫。今我何从吁将伯，尔今犹是信陵客。岂忍妻孥入门责，问渠应有周身策。

开头四句，以风雨颠狂、天地昏黑的自然景象来烘托酒阑灯炮中诗人的凄苦形象，令人震惊。“尔我”四句，直抒胸臆，书生全为稻粱谋的可悲喷涌而出。“苏季”四句，运用苏秦与驺衍的典故，反衬自身的不幸。最后六句，自我解嘲，说“我历人间径途百，自求饥冻非人迫”，仿佛烦恼都是自找的，实际上这是皮里阳秋的手法，蕴含着更大的悲愤在内！

再看《星涛席上叠韵奉诒兼待逊庵兄至》诗：

酒边人是东西道，眼底欢娱未云好。要共迢迢千岁忧，才保区区百年老。结交始自青春时，握手相视皆男儿。半作落花天听命，一为飞絮风难持。汉阳独树春无恙，批根削迹穷诸相。世态传之阿堵中，逸情高出云天上。沈生才气如翻澜，等闲一顾应知难。把君气味逢人说，剖我心肠与众看。古人所宝文章境，岂与小夫竞俄顷。对面相看泰华低，发声一奏雷霆静。于今万象昏烟埃，曷不将身隐草莱。熬煎世事一樽酒，留待明朝旧雨来。

诗的前半篇写朋友之间的情谊，“逸情高出云天上”一句，以极度夸张的笔法强调了友谊的可贵，感情深厚，气势磅礴。后半篇是对友人与自己诗风的评价，“沈生才气如翻澜”是对友人诗风的称颂，其评价已很高；而“古人所宝文章境，岂与小夫竞俄顷。对面相看泰华低，发声一奏雷霆静”，则表达了诗人雄视当时诗坛的豪情壮志，可以说是豪气干云。可是，结尾四句，“于今万象昏烟埃，曷不将身隐草莱。熬煎世事一樽酒，留待明朝旧雨来”却说要隐居于草莱，以沉饮来消磨内心的痛苦，其感情的悲痛沉郁已达到顶点！

最后，再看《以保生厘东荐之伯谦》诗：

李白韩愈浪得名，子瞻山谷皆平平。不然嵒崎历



落如我者，焉得置之世上鸿毛轻。虽然时迁势亦异，依然同类相枯荣。籍湜駸駸人文府，秦晁往往句同赓。贫穷陆离亦有会，龙饥虎困风云生。可怜达者竟谁是，只有奇裴子食一城。天哀其亲俾得养，亦俾其友从呼庚。原尝死矣平津绝，群士从容饿莩成。何用千金买骏骨，真能一饭扬名声。吾乡如今有瑰宝，曩列高价子所评。种松十年冒霜雪，冻骨渐与寒山撑。吾虽半菽不独饱，忍能对作空肠鸣。会将质裘持送似，令就吾子天南征。贲吾诗骚与将去，还乞吾子持与诸家衡。（保生，伯谦尊人试通州所得士也。）

此诗是向友人推荐人才的，可是开篇却极力抒泄诗人自己心中的不平，“嵒崎历落如我者，焉得置之世上鸿毛轻”，由于政治腐败，造成“龙饥虎困风云生”。他对唐宋名家如李白、韩愈、张籍、皇甫湜、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都不放在眼中，说他们或是“浪得名”，或是“皆平平”。而诗的结尾处又说“贲吾诗骚与将去，还乞吾子持与诸家衡”，其自信心之足，其悲愤之深，可以想见。

总之，这一类诗，正如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中所说：“皆奇横无匹。其转接处，往往突兀峥嵘，不堕恒蹊。”

文传桐城衣钵 巍然自成一家

范伯子对曾国藩的为人和诗文极其敬佩。他在《故湖南巡抚义宁陈公墓志铭》中说：“自吾束发读书，慕思曾文正公之为人，而愿睹当时之亲炙者。”他在《读曾文正道光乙未岁暮杂感诗，慨然毕次，其韵十首》第一首中写道：“作者天人去不还，世间余我小偷闲。怀风黯黯青灯字，负雪巍巍白山。贫贱几何身亦老，文章无用臭相关。凉凉后死君知否，六十年光指顾间。”可见他对曾氏仰慕之深。

而曾国藩则仰慕和学习桐城学派，他在《复陈右铭太守书》中认为“自唐以后善学韩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

范伯子与张謇都拜张裕钊与吴汝纶为师。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濂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64）举人，授内阁中书。一生曾主持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地书院，造就了很多人才。通训诂学，善书，工古文，为明清一大家。有《濂亭文集》。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亦作至父），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宾。光绪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著有《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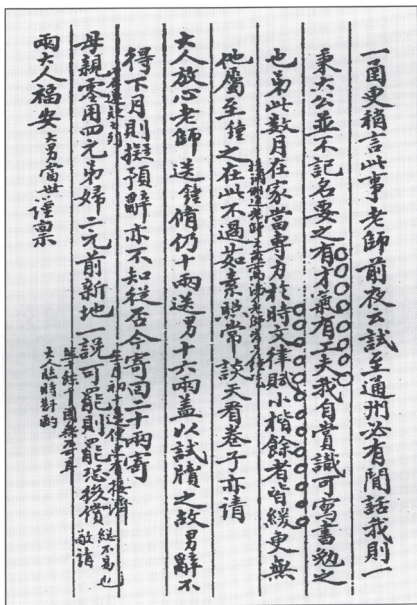


游丛录》。于经史子集多有点评，为桐城派后期主要作家。有《桐城吴先生全书》。

张裕钊是“曾门四弟子”之一。《清史稿张裕钊传》载：“曾国藩阅卷赏其文……裕钊私自喜。已而国藩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国藩既成大功，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以治文为事。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

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谓裕钊及吴汝纶也。”范伯子既然以吴汝纶、张裕钊为师，实际上间接学到曾国藩的文法与桐城派的文法。徐昂《〈范伯子文集〉后序》则谓：“桐城文章，源于望溪，海峰嗣之，迄姬传而大昌。门弟子流衍，江苏最盛，江西、广西、湖南弗能逮也。先师范伯子先生治诗古文辞，始师张濂卿，既得吴冀州上下其议论，造诣由是大进。后婿于姚氏，益得规惜抱之遗绪。故夫异之、伯言而后，江苏传古文者，当巨擘先生焉。”

金强《范肯堂先生事略》也说：“国朝以古文推正宗者金曰桐城三家。惜抱既逝，石甫姚按察、桴甫吴京卿继起，而通州范肯堂先生亦以古文鸣于时。先生后游武昌，受业于濂卿张学博。学博固得桐城之传者。又交于桴甫，继娶于姚，即



范伯子手迹

按察之孙，永朴仲实、永概叔节之女兄也。师友渊源，学书益懋。先生自谓谨守桐城家法，然其为文独得雄直气，纵横出没，随笔所如，无不深合理道，固不局局然于桐城绳度也。”

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范伯子”名下说：“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受古语法相从最久，于《史记》、韩文、杜诗尤三致意。其为文创意造言皆绝奇，非凡俗所有，恢谲怪玮，不可测量，辞气昌盛不可御。自言谨守桐城义法。诗才尤雄健，震荡开合，变化无方。”

如范伯子的《送彭芾亭之官安庆序》：

今天下秀才多矣，博褐败屨，囊数寸之管，听鼓于有司之门，旅进而旅退者，肩相摩趾相错也；今天下令长亦多矣，敝车羸马，手数寸之版，听鼓于大吏之门，旅进而旅退者，肩相摩趾相错也。盖自军兴以来，朝廷取人较宽，登进亦较滥，其后乃为天下之所积轻，然则虽有甚瑰奇俊伟之才，何由而自见耶？曰狃于时，迫于势，为众人之所为，虽稍稍见长而不可恃；众人之所不为，而毅然无所回惑，并力而求之。及其至也，未有不为天下所共见者也。是说也，昔者吾与王大令欣甫尝交相勉焉。今年春，游浦口军中，留五日，与乐平彭君芾亭谈极欢。秋八月，再至浦，则彭君已入都见于天子，以知县需次安徽，朋友各以言赠行，而亦以命当世。自彭君为秀才，固已有声矣，得地而君之，吾知其闻必远也。独今也往，大吏尚未有知彭君者，意者为众人之所为不足以见彭君之才乎？彭君亦坚其所自命者而已。吾与彭君交不过旬日，而有平生之欢，辄复为斯言。他日者幸复相见，握手极乐，更相与道之。

文后有范伯子按语：“此最初见赏于吾师者，评以为气格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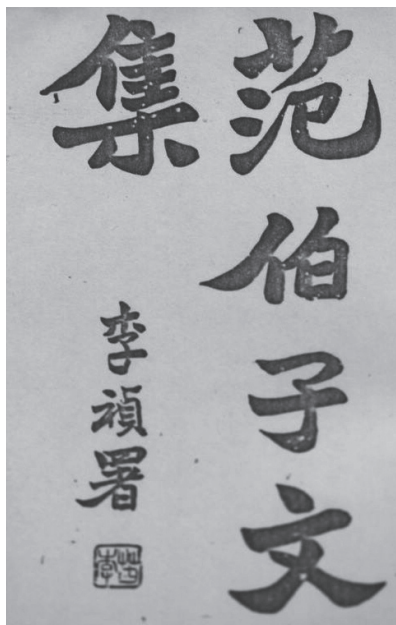
近昌黎，乃并其意量肖之，可谓豪杰之士矣。然此乃病于浦口军中拥被呻吟时率口所为，后来在冀州求文稍艰，翻置此等以为不足道，由今审录，正不忘吾师之言。”

韩愈的送人序，往往借题发挥，从不就事论事，如《送许郢州序》论述京官与地方官的矛盾。范伯子此序，送人赴任而论述当时选拔人才之利弊，正是韩愈的笔法，并且气格也接近韩愈，所以深得老师赞赏。其实，此文雅洁、明健，更符合桐城派的要求。

范伯子直接谈论为文之法文章，则明确地表述了他的文学观。请看《与蔡燕生论文第一书》：

迭承状甚慰，承以暇日即发兄所选姚选读之，

尤所望也。三年学政，一瞬便过，不足以把玩，而钱财入弟之手，又必不能归来作富人，惟于此事多尽一日心，即多置一分产耳。积学多年，不患无意，辄辕万里，不患无题。苟意有所动，便放胆为之。为之之道，第一求意雅不求字雅，则所见若某某君之病去矣。布帛菽粟，平实说来，不必矫揉造作，以求波峭，则所见若某某君之病又去矣。二者



民国年间木刻本《范伯子文集》书影

本非吾弟所甚爱，而但恐持之不坚，持之既坚而多读多作，必有气机大顺之时。气机顺而变化兴焉，变化之妙则非愚兄之本领所能尽知，试为弟悬构数语；则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砢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叠，而随手包裹，不碍于奔放；著字数百，而旁见侧出之虚影不啻数千；空明澄澈，而万怪惶惑于其间。此皆可遇而不可求。熟于古人之文境，可以先机影射而四远为之罗，亦不能知其必获否也。所尤难者，在乎骂詈王侯将相而敬慎不渝，与下辈粗解文字纵情牢骚者，判若天壤。文章虽极诙嘲，而定有一种渊穆气象，望而知为儒人之盛业，与杂家小说不同。此则所谓胸襟不至豪杰，不足谈古文；德器不类圣贤，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吾弟高明之资，去前两病易，而慎此为尤难，故首戒焉。珍重不宣。

桐城派强调“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提倡“言有物”，“言有序”，“修辞立其诚”，“行乎自然”。“积学多年，不患无意，辘轳万里，不患无题”就是“言有物”；“布帛菽粟，平实说来，不必矫揉造作，以求波峭”就是“行乎自然”；“为之之道，第一求意雅不求字雅”就是“言有序”，“言有序”的具体要求是指文从字顺、清通严整、雅洁明健。至于“含蓄不露”、“空明澄澈”、“旁见侧出”、“渊穆气象”等要求，无一不与桐城派理论相符合。由此可见范伯子与桐城派相契之深。

再看《课乡子弟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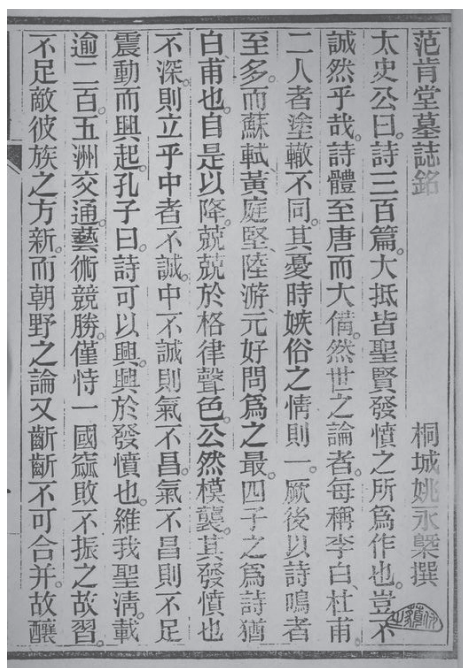
盖闻人莫不有志焉，困而不能自遂者何也？欲发愤而无此具，辛苦而自得之，而亦不能尽合于世也。夫学之不可以已，而友教匡助之为赖也所从来尚矣。邦之达人长者，咸以不才游学于外，多历年所，



宜有所得，而乡党后起之秀，足不出闾巷，无从得与天下贤豪君子，考德问业，稽合同异，心窃忧之。用诏当世，苟有所得，义不可不分而饷诸人；虽无所得，苟有所见，非夫人人意中之所有，犹且归而述诸人，此非当世所敢辞也。当世盖窃闻之矣，学所以学为文，《语》《孟》六经，莫非文也。文之盛者不可以猝为，由其近者通之，变而为《庄》《骚》，博而为《史》《汉》，泛滥淫溢而为《选》，狷洁自喜而为八家，八家往而经义兴焉。今人以次毕诸经而即为举业，是犹地天之不可以接，而高明卓见之士文语周秦，诗称汉魏，厌薄近古文字以为无足观焉者，余又以为非是也。凡文无远近，皆豪杰之士乘于运会而为之，学者务观其通，弗徂于近，亦弗务为高远，只自拔于流俗以同归于雅正而已。且为学岂不贵乎有用，而学无所谓经济也，识时务耳。不达于当时之务，不能窥古人之迹，其不学犹可也，若既充然有以自负，而谬为一切之论，以概无穷之变，释褐而仕，病国家矣。君子之道，不谈非分之事，而有通人之识，读书咏歌，进退优裕，余以是愿有同志焉，约所当循诵之书，如前所谓《庄》《骚》《史》《汉》《文选》，八家者，而流览则取其所最古者。西人文虽近俚，而格致家言有足观焉，不可废也。兵革未息，闾里骚然，父老勤苦，资我弦诵，未宜负之。每岁四课，课各六七题，为之必四五焉。要取于有心得而后止，无苟备也。谨约。

在这篇乡约中，范伯子认为阅读范围要广，六经，《庄子》《楚辞》《史记》《汉书》《昭明文选》与唐宋八大家文，甚至于西方的文章，都应当阅读。学习贵在有用，读书应有心得，那种贵古贱今的看法是不足取的。“凡文无远近，皆豪

杰之士乘于运会而为之，学者务观其通，弗徇于近，亦弗务为高远，只自拔于流俗以同归于雅正而已。”这里有的看法已超出桐城派的范围，更可看出范伯子的卓异之处，对于桐城派他绝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有所扬弃，能巍然自成一家。



光緒戊申刻本《范伯子詩集》書影



交际应酬文中 深藏至理名言

在《范伯子文集》十二卷中，收有很多交际应酬的文章，如墓志铭、祝寿文、送人序等。但这些交际应酬的文章中，往往深藏着至理名言。

范伯子写了不少祝寿文，在这类文章中，如上特色尤其显著。在《桐城吴先生尺牍》卷一，载有吴汝纶给范伯子的一封信，对范伯子的《武昌张先生七十寿言》推崇备至：“大作濂亭寿文，实为奇作，所谓陪客与主人全不相涉，有如时文家所谓无情搭者。文乃错综变化，尽成妙谛，诡譎多端。此由才气纵横，体格雄富，用能因方为珪，遇圆成璧。令我俯首至地，纵欲以文寿濂，读此不得不焚弃笔砚，佩服！佩服！”

范伯子给姚倚云的信中也谈到此事：“文之道莫大乎自然，而莫妙于沉隐。无错中年到此，则‘天下文章其在通州乎’，此亦至父所云也……至父本函询寿期，言必当作一文，由吾寄襄阳，后见此文，乃不复作，且夸大其说云：‘此作真可谓神奇，直当比方欧公而上之，非千年以内之物。曾公及濂老最工之作乃不过如斯，安得不令我焚弃笔砚耶？’至父非妄言者，吾故高兴录一通示蕴素，亦以见吾精神之雄。”

请看《武昌张先生七十寿言》：

当世比以病体稍差，而来为合肥相国教其子，盖不与吾师通问者既二年有余。相国闻其去江汉书院而还武昌，又或传其在襄阳。八月，弟钟书来，乃得所以居鹿门之状，且曰：“先生今年七十矣，久不见兄文。兄病已者，则趣为一文以为寿，其可乎？”同时朱曼君自旅顺来书，则言通政黄先生寿登六十，子不可无言，吾亦以钟语告之，而曼君曰：“相国七十在明年正月，是亦必有吾子文者，三者孰先作矣？”夫为寿于知我爱我教诲我之人，则常辞举无所用，而独宜深道其所愿乐者，时乎其豫一晒以为欢。吾覲功业福泽如相国，乃犹不免顾恤莫齿，私忧独叹，时时若为当世通其所拂郁即又不能举其辞然者。然则穷老羁旅如吾师所为，其愈有何乐之足道。而通政之在京邸也，不得已而去其官，或传其典质为食，而归无一橡之依，此亦不为可愿。且以当世之一身，乃至不能稍自强力与诸生角艺，求一第以为荣，而退又不能殚精竭思，日月著述，独纷然腾驾其虚美之说，一旦而求亲媚者三人焉，此何为者哉？天地之道，老者退而壮者代，吾年非不壮也，吾所代者何与？人各以所愿为者期我，而不知我乃神销气馁，至欲一世不关于人事，而独与所知己者长言，以谓一关于人事，则无日而不忧，而人情一不相知，则同官共学而邈不相收，此亦天下之至惨也。以余所识天下之长者，乃独有相国、通政及先生三人，而相国与通政之为人斯邈不相知矣。往时通政建言乃拳拳焉，惟相国之务去，此岂能知相国者。六七年以来，朝廷所易置封疆大吏不为不多，求多一相国而不可得，则吾不知其忧悲叹愤又当何如。相国不以人论之为嫌，顾若通政之愚不可及，则亦未



必尽知之，惟以今天下言路之塞，惜此诸公而叹滔滔者之靡届而已。夫不可奈何而义不能去，此其所处又难于通政。由是言之，去就之间，哀乐之情，以吾私独校此三人者，其为先生不犹愈乎？何者？彼其所求者易给，而其所为乃天下之所贱简，独可偷为一身之娱，而无所庸其得失者也。当世之为弟子，百不逮其师，独于此乎斤斤，斯亦可谓不肖。要其言于今日之献寿为宜，且以视曼君与吾弟，毋戚戚于先生之遭也。

吴汝纶佩服范伯子笔法灵活多变，说他的这篇祝寿文以李鸿章、黄体芳为陪衬，主要写张裕钊。但我们如果仔细体味这篇文章，固然对于教育家张裕钊的“穷老羈旅”遭遇十分同情，但更为突出的是要抒发“人情一不相知，则同官共学而邈不相收，此亦天下之至惨也”的道理。

又如《贺苏生先生七十寿言》：

世之敝也，朝士大夫相率不能以有所为，则若举国空无人焉者。其实以文论，以行考，不得谓其间绝无人，而吾徒二三人者，不得遂贤于天下也。夫士之超出一世而莫可逮焉者，盖如此其不易也。然则尚何由而进乎古耶？是又不然。古犹夫今耳，今人不能自比于古人，不敢以今人之所为上与古人衡议得失，此其间无识与夫专己而自圣者同。苟为不欲专己自圣而自觉其无以甚异于今人，又颇时时折衷于古人而求其是，而量其身之可以安，如之何而可也？曰：“德者恒其德，业者恒其业，不苟于荣利，不骛于声华，如是而已矣。”吾少读《论语》，即尝论孔子之时，其不得又见所谓圣人焉固也，何以并善人而无之？盖风俗之衰，由来非一世也。又怪善

人之道，疑不逮君子之所为，何以孔子推而上之，至与圣人同为绝迹？且等类而同降，则亦若似乎君子易得而有恒难求，此不可解也。由今思之，所谓君子者纯乎人也，可以学而能也；所谓善人者纯乎天也，不可以学而致也。夫子能使及吾门者为君子，而不能使天下为善人，善人之道衰，则《诗》《书》六艺之功固有所不及，而天下之放失不可治者日益多，此其所以重有慨焉，非徒曰爱之而已也。吾得所以处吾友贺松坡父子者，松坡则可谓君子者也，而其父苏生先生则可谓善人者也。善人之道奈何？不苟于荣利，不鹜于声华，德者恒其德，业者恒其业，终其身浑然泊然，不知世所营营者谓何，则亦不论其生于何世而莫能定以为衰世之人者也。令今之君子而皆有善人之风，则何至牵于不可为之世，苟然于其名位禄秩，辄业以从之，贬德以趋之，不隆不污，坐令国事与本身之图，冥然同归于尽乎？材而不达者少，仕而能退者稀，岂但国无人，亦恐野无士耳。嗟夫！此吾之所以欲退松坡而尊其父者，乃欲其廓然于今此所业未为世之所绝稀，而进用其父之道以终其身，则其去古人也不远也。当世往与松坡并为吴冀州教其州人，因事过拜，其母夫人命之坐，而松坡立于旁，则指谓当世曰：“是儿非得名师益友之约束，亦终不底于成。”因论为学之甘苦数十百言。退而请其年于松坡，则知为继母，尤以为难。比吾再婚于姚，常述以告吾妻，欲以为式，而每欲书其语以寿松坡之亲。及今年夏，而苏生先生用校官考满，往返过天津，侍之两旬，尽得其道，则向所欲书之语又不足深为长者陈。乃推论季世人才之所以不昌，与夫善人君子之升降以为松坡勛，而即以乐其



两亲之心，亦以明吾之区区愿学而莫能保其终者，
则以事事不及吾大人之恒，为可愧赧也。

此文主要论述了君子与善人的区别：“所谓君子者纯乎人也，可以学而能也；所谓善人者纯乎天也，不可以学而致也。”并认为贺松坡是君子，他的父亲贺苏生是善人。“善人之道奈何？不苟于荣利，不骛于声华，德者恒其德，业者恒其业，终其身浑然泊然，不知世所营营者谓何，则亦不论其生于何世而莫能定以为衰世之人者也。”祝寿文没有一点世俗的套话，专从寿星的道德品行着眼，的确是高人一等。

再看《冒伯棠六十寿序》：

自余出而试童子，则与如皋人士相接，若伯棠者，吾尝兄事之。冒之先曰巢民先生，与吾先人十山公同时以文采相尚，称邦国间二百年弗衰。余自幼而乐闻之，故私心尤亲伯棠，以为冒亦至今存也。县人三年中必四至州，伯棠挈其徒友及身自与试，则吾必旬日过其寓庐，从言笑为乐。其后吾辞学官而出游，而伯棠亦举于乡，乃间别二十年不复相见。去年冬，得见于州，则伯棠之子与吾子并补学官弟子第一。吾好誉其子，而伯棠犹譴诃其子之文，更用此相讥嘲以为笑乐，然其意兴各不如初矣。今年春，伯棠来吾家，告余以年且六十，而问余所以寿之者。余始愕然，已而寻其年则良是，因益叹流光之易过，而少壮之未能以一瞬，太息久之。然我以为若伯棠者，亦且无憾于其将老也。吾尝言之矣，内保其家，外淑其乡，古之贤哲，未有过此者。且夫世变愈大，则成功愈难，士大夫虽欲出其死力以与时争，终不能有裨补于世；或不胜其激烈之行，以蹈危而陷害，此犹其上之上者。自余文学声誉之众，虑无不

临难而变节，半途而丧志，外拥其所既得以涂饰耳目，而内苟焉以取随俗之富贵。不幸而败，必有猥贱之行，为一世观笑；幸而不至于败，彼其气已薄而性已漓，亦不足以长养其子孙而感乎其乡里。以余二十年所见，四方达人长者，爱之而不信，观之而不洽于心者，亡虑皆以此也。嗟乎！此巢民先生与吾先人之所为，所以逮今思之而卒未有以易焉者也。夫名愈高则身愈危，二公之初，亦几不免于世祸，然其卒也，竟能以贞悔自全，乡人徒艳其文采耳。抑其孝弟敦睦之行，父老传之，有不可诬者，斯足则也。余既好乐二公之所为，而身自惴惴焉避名逃利之不暇，则伯棠毋谓我有远图也。吾且乐推伯棠之为人，在不显不晦之间，不营于财，亦足以自给，有文以昌其徒，有德以貽其子，丈夫不得为于世者若此，亦庶几其可矣，何多求哉？何多求哉？请以为寿。

这篇祝寿文虽然与上一篇写法不同，用了较多的篇幅写诗人与冒伯棠的交往，但重点则在冒伯棠的不慕名利，内保其家，外淑其乡，并进而批判那些追名逐利者，“自余文学声誉之众，虑无不临难而变节，半途而丧志，外拥其所既得以涂饰耳目，而内苟焉以取随俗之富贵。不幸而败，必有猥贱之行，为一世观笑；幸而不至于败，彼其气已薄而性已漓，亦不足以长养其子孙而感乎其乡里”。

再看他给地方长官写的祝寿文《汪剑星刺史寿序》：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之吉，为我州牧汪君五十览揆之辰。于是君任通州九年矣，每年是日，州之父兄子弟愿乐君者皆欲进而为君寿，君则时其丰穰无事而亦或听客之所为，相从饮酒为乐。独至今年而北方乱久不定，两宫幸山陕，君惄然不安于心，诚我邦人士



毋言举觴，邦人士曰：“夫临觴而不举者，君之谊也。欲君之贵寿而致祝于君身，此我民之私，君之所不能禁也。惟是君之才任公卿，而充吾愿乐之意，则遂欲其究极年岁而永永与吾民相依，此于颂体为不宜，子宿于文者，亦有说以处此乎？”当世曰：“有。盖太史公悯汉吏之酷，称述子产、孙叔敖之治行以讥切当时，而循吏之名以立。及孝宣帝起閭閻，知民所疾苦，谓官数变易则下不得安，故二千石有治理著闻者，辄玺书劝勉，增秩赐金，或至关内侯，而公卿即由此选焉。汉之循良，于斯为盛，然自班孟坚所称王成、黄霸之属，已不免有伪饰增加冀蒙显赏者矣。由斯而降，与于斯选者代无几人，而诚否且不可知。何者？上者不能无以喜怒爱憎去取人，而士大夫希世进用之心虽贤知不免，治道万端而莫罄，惟久于其任为最难也。明一代循吏，首推况钟，钟知苏州至十九年之多。听辕门鼓吹送女者曰：‘吾来时，此女方乳耳。’故钟之利于民，则吾知其诚利于民也。今安得有十九年之知府耶？方我君之初来，则亦不自意其能如斯久也，日汲汲然进州人而讨之，筑五坝，祛百年之患，清保甲，选士而分属焉。通官民之阂，穷僻远之奸，兴复至圣庙堂之雅乐，月肆而时习之，豪宗巨商为不利于吾民者抗而复之。自城隍以至公廨无不修，自教养大政以至官医义渡无不为，故君甫来三数年间，有明旦日昃之勤，及是而兴作亦稍稀矣。君岂惰于昔日哉？此乃君之化成而行洽，与我民相安于无事时也。北方靡烂，江表宴然，而通州尤号为极治，大府臚君嘉绩上之朝，仍乞天子弗召，奖勉留治，如汉宣帝时。故吾人之幸蒙兹休，则出于上者之赐也。君亦爱恋兹土，无欲去之心。吾尝与君勘沿江之沙，经行林木庵藹中，童

稚拍手而歌盈路，吾笑谓君得一州而理，如家人父子之相爱，虽平世犹甘乐之矣。君虽巽辞不胜，顾未尝不深颺吾言也。然则遂充吾意祝君之恒久于此，如明之况君，幸也！国乱平而时复康，则自今以往且岁岁为君寿焉，宁非古之所谓吉祥善事者耶？而君岂有不乐闻者耶？”我父兄子弟皆曰然，遂书以进。

作为一州的最高长官，汪剑星担任通州知州已经九年，“北方靡烂，江表宴然，而通州尤号为极治”，“吾尝与君勘沿江之沙，经行林木庵藹中，童稚拍手而歌盈路，吾笑谓君得一州而理，如家人父子之相爱”，可见这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地方官。于是，范伯子此文便重点论述了“久于其任”之可贵，举汉宣帝曾赏赐有治绩的地方官为例，又举明代当了十九年苏州知州的况钟为例来鼓励他。为地方官写祝寿文，不阿谀奉承，而以当好清官的标准来要求他，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最后，再看《顾晴谷先生七十寿序》：

昔项氏有“富贵还乡”之说，天下诮之为其忽王霸之大略而徇匹夫乡土之见也。及至疏广受父子相随出关，则翕然称之无异辞，以为士大夫进退之节应如此也。吾尝独味项氏之所谓“衣锦夜行”，乃深得人心之同然，而其理为不可易，非独帝王卿相也。设有天帝神佛于此，而居之不知谁何之地，则凡民亦仰而视之曰：“此为天帝而已矣！此为神佛而已矣！”其所以得至于此莫从而喻之也。人自少而壮，各习于其乡，出而游仕四方，则乡之人耳属焉，比其反而目属焉。观其所得，各道其夙昔以为乐也，出其所有与亲戚交游共享之，则甘苦益足以相喻，而生人之愉快未有能遇焉者也。疏氏之问金余几，



取宣圣主之恩为诸老供具，曷尝不与项氏同指哉？顾以知足知止类有道者之言，为史氏所称美耳。然虽至于后世，而韩愈氏之送杨巨源，犹艳述曩时都门之供张，而比方杨侯以重其事，岂非晚近士大夫苟得无耻，求为去禄利而还其乡，亦绝无而仅有者乎？关中盖从古帝王之都，而士大夫禄利之所从出也。近古以来，天下之大势乃改而日趋于东南，帝者不复以关陕为意。及至甘陕分疆而封圻益削，于行省中反号为贫弱，游仕者亦弗忻焉。然独至今上皇帝二十六年庚子乘輿西狩，奉慈辇以行，诏以陕西为行在所，旬月之间，百度草创，文学侍从才辩之臣十不一二至，而陕西吏士之能者，乃人人思有以自见，江、浙、闽、广之从京师走还或名隶陕西而不得往者，莫不道上海称贷以去，惟恐后时。于斯时也，乃独有挟冠时之文魁伦之才，掉头而不顾，诤关吏而东其轺者，岂不异与？则我年丈顾晴谷先生其人也。先生之甫之陕也，在岁丙戌先子六十之年。先生为先子称祝而后行，当世则亦为先生祝，曰：“愿宦成早归，留其有余之精神与小子戏也。”及岁甲午，先生在醴泉登寿六十，当世则为文以寄，引狂简之思以速其归，而莫敢为先生必。及是而先生之去也凡十有四年，而竟来归，相与道曩言以为笑乐。观其饮啖游咏之际，信乎其有余也。先生归两年而当世病作，或至累月不得相过往，而时闻先生之独游。人之盛衰无常，盖自昔而有之矣。顾每过先生，则启我、未航两同年必为我设精具，留与先生共语，为竟日之欢，此疏氏子所未尝有也。吾独怪先生之在陕西与为文学契好者，若今署两江总督满洲午桥中丞公，及今陕西布政使樊君云门、江安督粮道胡

君研孫，茲三人者，皆頗奏功能于行在，渥荷慈眷于翱翔于數年之中，令先生稍留而與之共事，其所當得豈與彼什百君子驟躐一兩階者同乎哉？而先生竟不留，則吾不知諸君之送之也，亦有東都門之嘆息否耶？而先生亦可謂之急流勇退者非耶？先生既毅然決然去紛華而歸寂寞，又不必與彼三人者共游，而獨喜與不才相晤對，窺其意量之間，豈但前此項氏之說本不足為先生言，即疏氏所云云，又烏足以盡其美哉？今歲甲辰，先生與其配孫夫人并登七十，州人謀以十月之吉為先生舉觴，屬其辭于當世。當世維先生之福祿康豫凡今孺子所能言，而德人之身無美不臻，觀者亦遂有見淺見深之別，故頗陳諸義以稱諸為壽者之意。而先生之覽斯文也，亦將怡然而盡一觴，別與當世有微契也夫。

顧曾烜（字晴谷）在陝西做地方官時卓有名聲，當大官的又特別重視他的詩文，但晚年時他却辭官回歸通州故里。范伯子這篇祝壽文，從項羽的“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的典故說起，一般古代讀書人都批評項羽這一言行，而范伯子則肯定了這一言行中蘊含着的對故鄉人的熱愛之情，從而贊頌顧晴谷晚年拋棄名利而歸故鄉的高風亮節。

總之，范伯子的應酬文章，也很少有庸俗的世相，而是蘊含着不少至理名言，值得我們三復其味。



附录:

杰出的教育家与女诗人姚倚云

姚倚云，字蕴素，是桐城文派创始人姚鼐的第五世侄孙女。生于同治二年（1863），卒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享年八十一岁。著有《蕴素轩诗集》十二卷、《沧海归来集》十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姚倚云出任南通公立女子学校校长。《南通县图志》卷九《教育志》：“光绪三十二年，（张）簪、（张）謇、陈启谦、徐联蓉筹设公立女子学校，以启谦旧宅为校舍，延当世妇姚为校长。”《蕴素轩诗集》卷八有诗题：“丙午年，退、嵩二公兴女学，于兹九载，自惭学浅，无补于教育。”姚倚云在给范铠的信中说：“去年伯严、恪士诸公举嫂充当南京女教长，以哥哥大事未毕，辞谢。今又为乡里季直诸公聘为本地女教长兼教习，力辞以不堪其任，而诸公以嫂如不就则女学不成，此事乃系于嫂一人之成败，万不可辞，只得暂应，如有贤于嫂者即以自代。”顾公毅《〈蕴素轩诗集〉序》中说：“先生（按：指姚倚云）谓女教系家国者至巨，尝推原二南之化，著论于校十年概览之中。以其忠厚悱恻之意播之于诗，而更浹之于校之人也。校风乃独以质静闻。校有事，往往询及公毅，大者必欲得一言，如是者迄十年之久。公毅主县教育会事，又延先生长妇女宣讲

会，会尝数百人，先生随机立说，听者为之意消。民国八年先生以长皖校去，女师范校以为校终不可无先生也，先生亦弗忍固辞，遂归授经义。先生之言曰：‘女子教育，贵能观于今而慎所当取，尤贵能鉴于古而知所当守。其为讲义，则犹是旨。’一讲既终，群弟子罔不悦服而退，盖其忠厚悱惻足以致之。”

民国八年（1919），姚倚云应安徽女子职业学校之聘出任校长。民国二十二年，为了庆祝她七十岁寿辰，受业女弟子罗玉衡、侄孙女范北强等印行姚夫人之《蕴素轩诗集》（十一卷附词一卷）。抗日战争爆发后，姚倚云曾去马塘避难，回通州后，当过红十字会会长。

姚倚云不仅是杰出的女教育家，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真如凤毛麟角，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诗才横溢，从小就酷爱诗歌，一生吟唱不辍。顾公毅《〈蕴素轩诗集〉序》中说：

“秋初……先生正曝书于庭，检一小册示公毅，上署《蕴素轩少时诗稿》。稿蝇头小楷。谛视之，先生之手笔也，而评者为吴冀州，就所识年月考之，则已越四十年。墨迹如新，粲然夺目……冀州于其《送别二兄》‘黄鹂紫燕舞春风，水碧山青绕江树。长天杳杳看归鸿，短梦依依闻杜宇’句评曰：‘顿开异境，飘洒不群，吾家梅村恐尚未到此。’于《初秋闲理小园寄仲兄》‘蝉噪高林际，蚓鸣砌草根。秋风穿牖冷，疏雨扑帘繁。庭树纷残叶，壁苔长细痕’句评曰：‘如此方谓之情景交融。’于《中秋月夜怀二兄三弟》‘秋露凝花坠，凉风掠袖生。徘徊良夜永，游骑杂歌声’句评曰：‘韵味悠永。’《雪夜忆仲兄》‘佳日宜人增怅望，严寒萧瑟倍思乡’句评曰：‘逸气横生。’《送三弟之江阴》‘儒生任穷达，励志追先哲。独念川途劳，勉慎风尘劣’句评曰：‘纵横如志。’《三弟以诗来索和答之》诗凡八章，章各有评。曰：‘一往情深，言情之善则也。’曰：‘疏宕。’曰：‘奇幻不可思议。’曰：‘琅琅有



声。’曰：‘沉痛。’曰：‘韵态天成，不事雕琢。’曰：‘此篇气势尤为奇纵。’曰：‘情韵深美。’而于卷端大书特书，曰：‘风格高秀，体裁澹雅。绝无闺阁之态。固由毓德名家，濡染有源，亦是天挺瑰姿，非复寻常所有也。’公毅披览再四，无任景慕。昔闻冀州评伯子先生诗，谓为海内无对。于先生诗，评又若此。其力任为介宜矣。先生之诗，老而益工。所历既艰苦，一视乎义命而安之。故其为言极舒迟澹泊之致，世更有冀州其人，不知作何赞叹也。”

徐昂《范姚太夫人家传》评述说：“伯子先生以穷诸生游四方，篇什传诵，声闻溢公卿，而漠于势利，不营生产，门以内屡空，太夫人质簪珥，不闻于夫子。自所天丧徂，迄今四十年，太夫人秉持礼法，力守清苦，代夫子之职而终前室之志，慈爱下及于孙曾，至衰老卧病，寄托吟咏，不怨不尤，以正其命，其于令妻贤母之道尽且久矣。而其生平复推其所怀，施之女子教育，旁逮他郡，冀蒙其教者异日为令妻为贤母，以相引翼。呜呼！世道陵夷极矣！国不可以无礼义廉耻。礼义廉耻之维系于人心者不可以无学，学必有所承，而后能知所守。太夫人之有造于范氏且有造于乡邑者，盖得名门家学之渊源，而蔚为巾帼耆英，其涵濡诗礼教泽岂偶然也耶！”

姚倚云的道德情怀，热心教育、淡泊名利的思想品质都表现在诗歌中。她与范伯子新婚以后，有《呈夫子》诗：

岁次在己丑，其时乃孟春。万物吐宿秀，草木刚怀新。结褵事君子，于归赋良辰。同心欣静好，燕婉媿繁蕣。富贵安所重，儒术惟可珍。文章增纸价，诗书未全贫。林泉堪养志，穷达任曲伸。贤者固乐道，超然遂天真。闻述先世德，始知堂上仁。清族传盛泽，孝弟昆季淳。陋质虽不敏，焉敢惮劳辛？老亲择士艰，十年得斯人。岂惜丝萝弱，千里缔婚姻。

足慰生平意，冰雪谊相亲。少君躬出汲，良妻自荷薪。续史承优召，解围对嘉宾。懿行去以远，文采留经纶。东风展群芳，日暖名花香。青青窗前柳，蔼蔼春山光。暝烟横翠岫，庭际余残阳。官阁一凭栏，归鸟凌虚翔。纤月破黄昏，寒辉绕曲廊。疏星悬树杪，幽院起苍凉。静观生意满，美景皆词章。瞬息将三旬，何时见高堂。无违在夙夜，勉力侍姑嫜。欲穿望云心，迢迢川路长。失恃惭妇德，思之诚恐惶。书此聊自勖，勿作俚辞忘。

可见姚倚云对自己的婚姻极为满意，“富贵安所重，儒术惟可珍。文章增纸价，诗书未全贫。林泉堪养志，穷达任曲伸”。她找到了理想的、志同道合的另一半，她认为儒道与文章的价值最高，设想将来能与丈夫一起安贫乐道，徜徉林泉，连袂吟唱，这是何等惬意的人生！

范伯子去世后，她的亲家（女婿之父）陈三立要送垦荒田给她，被坚决拒绝；通州长官送膳养银给她，被用来办学。徐昂《范姚太夫人家传》中说：“越十年，而先生没于沪。婿父陈伯严入吊，赙垦牧田券，坚辞。陈挥泪去。已而王州尊致膳养银，太夫人曰：‘伯子有弟，未亡人且有子，如之何其纳之？无已，其以此兴女学乎？’繇是与邑绅创公立女学校，张退庵老人僦吕家巷为校址，三年成迹炳然。张啬公复易珠媚园建女子师范校，聘太夫人为之长，历十有五年，校誉冠乡国。岁己未，姨侄方时简主政安徽实业，恳长女子职业学校，应之，周甲后，退啬二公复延之女校讲授《四书》，学子由由然如婴儿之得亲慈母也。”

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范伯子在去安福续婚的途中写有《入滩河易舟闻舟，人言往月安福使人迎探状，惭恐弥甚，心神益焦，辄复为诗十九韵》诗，诗中说：“顺康元老



家，乾嘉大儒系。道咸名公孙，同光诗人子。蔼蔼敦诗媛，持以配当世。”从中可看出范伯子对桐城姚氏的仰慕之情。而到了安福，还未过门的姚倚云竟写了一首长达三十多韵的诗给范伯子，表示婚后要回南通侍奉他双亲。范伯子很激动，写了《成婚有日，内子为诗三十韵，以道其相与为善之意与其迫欲侍舅姑之忱，余亦作三十韵答之》。“虽然悼尔才，岂不恋尔德”是这首诗的关键的两句，写出了范伯子当时面对着这位德才兼备的女子时的心情，他已经十分具体地感受到了婚后甜美幸福的生活了：“与子今偕潜，静言抚琴瑟。琴瑟鸣悒悒，寒水流汨汨。服芬亦为君，与子花间逸。”

新婚以后，的确是琴瑟谐和，频频联唱。详见本书《续娶名门才女 夫妇连袂唱和》一章，兹不赘述。

范伯子在天津李鸿章幕府时，姚倚云写有一首怀念他的长诗《夫子去岁孟冬复来甥馆，以欧公四十韵作诗相赠，历陈病中艰苦，雄文健句，字字酸辛，倚云览之涕下，不能和也，开岁随夫子归谒舅姑，而夫子橐笔北游，以应李相之聘，秋杪吾又随伯兄归宁，舟中小暇，追述别后情辞，次其元韵，语质无华，不自知其美恶，聊寄津门，一破客中之闷，亦因以道舅姑隐衷云》：

忆昨送君时，风光正春日。别离那可论，此心良忽忽。虽有千万言，心悲不能出。深恐扰君思，回肠忍泪没。自君远行役，承欢双亲膝。龟勉敢惮劳，夙夜怀慄慄。初来未尽谙，儿女相辅弼。慚惶提斯心，安得往时逸。风月非无趣，每每看令失。时或有佳致，十不能得一。感念高堂慈，遇事必宽恤。有时怜其长，命之和新律。亦欲博清欢，苦思真咄咄。流光何迅速，夏去秋风疾。相思惟自知，乌能向人述？忽得桐城书，青山已卜吉。览之涕交流，岂敢望

归必。老人竟领头，许其返蓬荜。又得津门书，周旋语意密。极论劬劳恩，去日若鞭挞。汝心苟不从，遣恨当斧钺。故尔辞两亲，脱身不用乞。在道感君怀，反复视君笔。忧思安能已？徒有泪横溢。君诚不自聊，尚恐吾心郁。何以报深情，珍重为君匹。倦极入幽梦，相见在仿佛。忽为晨钟醒，劳生待谁嫉。茫茫大块中，尔我定何物。好留泡影嬉，只待白头毕。从兄复登舟，亦任风涛爬。万里若乘槎，苍茫近太乙。云际山迢迢，枫林秋瑟瑟。寒沙群雁噉，荒渚幽虫唧。皓月一周天，片帆抵宫室。悲喜涕重闾，亲情绕诸侄。旧日闺阁中，妆台尽散佚。芙蓉尚含苞，丹橘犹结实。依依我亲傍，留连复惕息。聊慰罔极恩，寸心终自劾。且复爱年华，新妆待君帟。翱翔好致身，憔悴嗟吾质。不然陶翟耳，吾岂慕高佚。堂上七十年，人情三百绂。

诗从当时离别的场面写起，说当时为了免于引起你更大的悲哀，我是“回肠忍泪没”；接着写自己如何在双亲前承欢，如何辅弼他前妻留下的儿女，并说到范的父亲如何叫自己和诗，如何以宽大的心胸同意自己回桐城侍奉父亲；最后写到自己在回桐城的舟中思念范伯子的情景：“倦极入幽梦，相见在仿佛。忽为晨钟醒，劳生待谁嫉。茫茫大块中，尔我定何物。好留泡影嬉，只待白头毕。”娓娓叙来，如像当面在诉衷肠，极恳切，极缠绵，极悲哀，极真挚。

以后，夫妇二人，或异地相思，或当面唱和，几无虚日。因数量太多，兹不赘述，如读者感兴趣，可以翻阅《范伯子诗集》和《蕴素轩诗集》。

范伯子前妻生有一女，名孝嫦，姚倚云对她十分关心，胜过自己亲生的。在天津三年，带在身边，精心培养教育，呵



护备至。后来孝嫦嫁给江西义宁陈衡恪，临嫁，姚倚云写了《遣嫁孝嫦书以勖之》：

百两霞轩奏乐音，将迎之子洞房深。慎承巾栉
人间事，抱痛荒邱泉下心。辽海三年吾愧训，楚江
一别汝悲忧。临歧忍却千行泪，洒向冰天独苦吟。

双星朗照鹊巢枝，大雅毋忘夙夜思。不负丝罗
真有托，但期家室盍相宜。重堂爱日留长乐，孤艇寒
江怨别离。光景又随年事去，欲归风雪为迟疑。

第一首首联写陈家以隆重的礼节来迎娶。颔联希望孝嫦嫁过去以后善待丈夫，以安慰去世的母亲泉下之心。颈联写在天津三年自己对孝嫦关心教育还不够，从此一别你将对我十分相思。尾联说，临分手时我强忍住满眶泪水，今后只能在冰天雪地里挥泪苦吟了。

第二首首联希望孝嫦在新婚以后不要忘了自己这里对孝嫦的日夜思念。颔联祝福她婚后家庭幸福美满。颈联是说，眼前是孤艇送别，十分凄凉；不久将堂上承欢，其乐融融。尾联是设想到将来孝嫦回娘家的情景，仿佛风雪都为之迟疑了。这两首诗写得真切深挚，令人难忘！

姚倚云担任女子师范校长多年，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对此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她在《丙午年，退菴二公召兴女学于兹九载，自惭学浅无补于教育，所幸前后诸生不乏美材，今以老病乞休，差慰归欤之志，再叠前韵以写余怀》中写道：

闲踏青郊逸兴生，芳春花鸟动归情。但期桃李
均成实，莫遣桑榆殉薄名。

姚倚云在退休时又写有《质言留别诸生》：

碧树阴翳长，春去夏复至。琴歌杂书声，孜孜勤苦意。忆昔十年前，壶教伤幽秘。鄙人负微知，此责焉忍避？那揣新识浅，承乏权造次。教育吾邑敢？提倡姑初试。不得道大光，勉强发真粹。训练惭不敏，学术诚抱愧。英英玉树姿，自是后来器。君子默自修，宗旨向道义。所以言行间，渊冰惟恐坠。小人怀嗜欲，私心期干利。道德之蠹贼，蝇营务朋比。义利之分途，坚贞唯尚志。女子赋天职，功在家政备。须知国之兴，实始家之治。圣贤立明训，千秋不能易。良规万世师，遇事善引譬。文藻固可珍，大节犹当识。国学学之源，经史必心醉。所业贵有恒，功成慎一簣。实此少年时，学行毋暴弃。嗟余乏黠才，但以愚诚致。殷殷感诸君，服从见真挚。怡然无闲言，情好敦古谊。幸造后起材，足以为吾嗣。可以乞自休，老病不余畀。努力各自勉，莫洒临歧泪。岂不苦相恋，学诵愁汝蹶。临别馈勸辞，聊为诸生志。

勉励诸生，首要的是注重品德修养，注重人生大节，其次是读好经史著作，因为经史为“国文学之源”。在学习态度上，应有恒心，决不能一曝十寒。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番话亦不失为金玉良言啊！

对于创办女校、振兴女业，姚倚云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这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上也可大书一笔。请看《舒畹荪黄庐隐二女士创办女子兴业社，举余为名誉社长，辞不获，赋二绝以勉之》：

豪迈英姿舒与黄，振兴女业勇提倡。须知教育相关处，分付君家仔细量。

自古前贤畏后生，但期来日胜于今。有恒譬彼春源草，滋长虽微日渐增。



姚倚云的词也写得情景交融，清新优美，韵味浓郁。如她跟随范伯子在天津李鸿章幕中时所写的《踏莎行·津门雪夜同外子作》：

月色欹斜，雪光掩映。庭前飒飒寒风劲，良宵
旅馆对梅花，与君共卜来年庆。 冻竹无声，彤云
漾影。青灯动壁间题咏，呼童沽酒破寒颜，围炉笑
乐三更竞。

上片写自己与丈夫在一个雪光月色极美的夜晚，面对着飒飒寒风共同欣赏着窗前的梅花，预卜明年将获得好运。下片写在冻竹参差、彤云倒影的优美背景下，夫妇围炉饮酒、连袂吟诗直到三更天的欢乐情景。读来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又如《蝶恋花·春日郊行柬师曾》：

二月春郊风似剪，晴日苍茫，光照苔痕浅。嫩
柳初舒烟尚敛，差差碧水纹如篆。 隐约青山明
黛岫，草没长堤，漫踏芳尘软。冰艳梅开香满苑，
清辉斜映春云展。

这首词是诗人春天在郊外散步时看到秀丽如画的春景，便写下来当作信件寄给她的女婿陈师曾的。岳母与女婿联唱，这本身就是文坛一段佳话。首句是从初唐著名诗人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化来的，但她将“细叶”变成了“嫩柳初舒烟尚敛”，初春的柳条如烟似雾，更耐人吟咏。而此词的上片还写到“苔痕”与“水纹”：

“苔痕”著一“浅”字，将初春的青苔写活了；“水纹”像篆书，也将水纹写活了。诗人的观察多么细致，运笔多么精到啊。下片写青山翠岫，芳草长堤，梅香满苑，春云舒展，令人赏心悦目。如此描写春景，诗人的喜悦心情便充溢其间，几欲扑面而来了！

姚倚云的咏事词作也写得很精彩。现举《浣溪沙》：

逝水光阴一瞥中，去年今日醉颜红，飞花如絮舞回风。
驱车来听弦歌美，年华虽异喜情同，岁寒始识后凋松。

姚倚云当女子师范校长时，有一次与同人一起欢度除夕之夜，有感而作此词。上片写除夕之夜，大雪纷飞，同人们都喝得醉颜酡红，她感到光阴似水，去年今日，此情此景仿佛仍在目前。下片写今年除夕，又来喝酒听歌，喜悦的心情与去年相同。末句以议论句收束：“岁寒始识后凋松”，以后凋松的凌霜傲雪精神来勉励同人，显得语重心长，颇有余味。

让笔者深感惋惜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诗人与教育家，《南通市志》“人物”栏中居然没有收入。可能有人认为她是安徽桐城人，不是南通人。殊不知她嫁到范家以后在南通生活了五十多年，而又为南通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范曾.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马亚中,陈国安校点.范伯子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张謇研究中心主编.张謇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范伯子诗集.光绪戊申刻本.

范伯子文集.民国芳洲精舍校刊本.

跋

今年伏天比较凉爽，于是抓紧写作，想让书稿早日完成，谁知未能如愿。立秋以后，“秋老虎”来临，因时间紧迫，只得挥汗力书，终于于9月1日完成。总算松了一口气。

《杰出的女诗人与教育家姚倚云》本来独立成篇，后来考虑到放在《范伯子评传》中更能使其“珠联璧合”，故作为附录，附于书后。

完成此作，了却了笔者多年来的一桩心愿，故填词一首，以表余情：

沁园春

范氏世家，承继诗文，酝藉风流。看濠河百亩，烟波荡漾，孕育诗情，名冠通州。菱荷风细，蒹葭烟淡，家园风光在心头。范伯子，声名贯南北，挥斥方遒。

虽云日月如流，却留下诗文超千首。纵官居极品，何似诗坛，自由漫步，犹胜庄周。姚氏倚云，真贤内助，以濡相沫共划舟。东风里，看人间谁似，如此悠悠！

2010年9月于汗马斋

自序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笔者已心仪范伯子，想为他撰一评传。因为范伯子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流的诗人，而且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与安徽桐城姚氏诗文世家、江西义宁陈氏诗文世家联姻，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使诗文质量臻于至境，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所少见的。再加上笔者是南通人，热爱家乡这一块热土，又一生从事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深感为乡土诗人写点东西也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但这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一则由于当时教学任务与政务活动较为繁重，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来；二则由于我手头仅有光绪版《范伯子诗集》复印本与民国芳洲精舍校刊本《范伯子文集》复印本，又抽不出时间到市图书馆去查找其他资料，资料不全。此事便耽搁了下来。

现在，我早已退休了，时间相当充裕。再加上范曾先生所编《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7月出版，资料相当齐全，为我写作此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刘钺君又能将此书借给我将近一年，使我能有充分的时间阅览。同时，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也为我出版此书提供了方便。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我又怎能不竭尽全力写作此书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呢？



《颜氏家训·养生篇》说：“学若牛毛，成如麟角。”人的一生学习的东西很多，却只能收获一小束，又怎能不珍惜时间加倍努力呢？

书虽写成，但由于学术素养的限制和研究的不够深入细致，定有不足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范当世（1854—1905），初名铸，字铜士、无错，号肯堂、伯子。江苏通州人。早年与弟范钟、范铠齐名，号称“通州三范”。曾九次参加科举考试而落第，三十五岁后便绝意科举。曾在李鸿章幕执教。光绪二十年（1894），迫于父命，曾捐资为光禄寺署正，官阶是从六品，但这是一个虚衔，只可以免除一点捐税劳役的负担，并无实职。晚年执教于通州东渐书院，后又担任江宁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实际上，他一生布衣，贫病交加，到处漂泊。光绪三十年年底（阴历十二月初十，阳历是1905年1月15日），范伯子因肺病吐血，于上海医院逝世。他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对南通教育颇有贡献。他又倾全力写作诗文，有《范伯子诗集》十九卷，《范伯子文集》十二卷。他不仅是清末同光派诗歌的主将之一，还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重要继承者。

兹据范伯子《〈通州范氏诗钞〉序》和范曾《家翁诗序》（载《子愚诗抄》），将其世系表列于下（旁支略去），以清眉目：

[宋]范仲淹（希文）—纯仁（尧夫）……[明]盛甫—均用—廷镇—秉深—禹迹（九州）—介石（希颜）—应龙（云从）—凤翼（异羽，有《勋卿诗集》）—[清]国祿（汝受，有《十山楼稿》）—遇（濂夫，有《一陶园存今诗选》）—梦熊（君宰）—兆虞（韶亭）—崇简（完初，有《懒牛诗抄》）—持信（静斋）—如松—伯子（名当世，字无错，号肯堂，有《范伯子诗集》）—罕（彦殊，有《蜗牛舍诗》）—[当代]子愚（有《子愚诗抄》）—曾（当代著名画家）。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 炎

委 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目 录

道统文统并传 家世突出优异	1
为母分忧买卖 从师交友勤学	7
城北坐馆教书 谒见著名学者	10
范吴伉俪情深 悲切悼念难忘	26
三年冀州执教 培养无数英才	31
续娶名门才女 夫妇连袂唱和	45
执教李相之幕 宾主关系和谐	65
联姻江西陈氏 共同切磋诗文	75
通州三生结交 生死情谊永存	86
支持变法新政 痛悼遇难英烈	99
父命难违捐官 高堂苦心可悯	103
范张联手创业 教育实业并举	106
同光诗派中坚 纵横近代诗坛	118
痛恨时局糜烂 关心民生疾苦	125
外地风物再好 不如故乡清嘉	131



诗境鲜明生动 诗思寄托遥深	136
诗风精华内敛 令人回味无穷	144
气骨雄奇峻嶒 感情悲痛沉郁	147
文传桐城衣钵 巍然自成一家	155
交际应酬文中 深藏至理名言	162
附录：杰出的教育家与女诗人姚倚云	172
参考文献	182
跋	183



范伯子像



姚倚云像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市级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点。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作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伯子 / 姜光斗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2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81137-621-0

I. ①范… II. ①姜… III. ①范当世（1854～1905）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561号

书 名	范伯子
著 者	姜光斗
责任编辑	史创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48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621-0
定 价	17.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